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季刊)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主管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单位：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4—1496/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671—6949
地 址：广州市三元里大道99号
邮 码：510400
电 话：(020) 26297022、26297033
电子邮箱：2001xb@126.com
出版日期：2020年10月18日
设计排版：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印刷单位：广州市天河彩佳印刷厂
定 价：12.00元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 李 心

主 任 吴显标

副主任 鲁开垠 肖 莉 潘 清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邓爱霞 叶 华 冯颖红

肖 莉 吴显标 张 山

林少红 郑 锋 戚志恒

鲁开垠 潘 清

主 编 肖 莉

编辑部

主 任 张 山

副主任 谭建军

目录 CONTENTS

●2020年 ●第4期 ●总第81期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科学体系初探 孙霄汉 (05)
习近平教育扶贫思想在广东的实践 师春苗 (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的理论特色 郝佳婧 (16)

“中国战疫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笔谈)

- 全国战“疫”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之提升 周兴樑 等 (21)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

- 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生成逻辑 曾丹凤 (35)
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文献综述 张林鸿 廖富超 (40)
新时代宋庆龄事业的传承与创新探讨 谢德阶 (47)

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 我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性和未来展望 林少红 (51)
国家治理语境下增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的几点思考 齐春雷 陈茜茜 (57)

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 乡村治理视阈下农村基督教问题研究 王娜娜 (62)

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交流渠道,本刊现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不再另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非公有制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中小企业成长悖论与人力资源投入的创新绩效研究 刘玉芽 (68)

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研究

增强青年国家认同的国际经验及反思 谢素军 孙慧 (75)

华侨博物馆在侨务工作中的作用研究 亓延坤 (81)

知识分子工作研究

新时代做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选择及思考 杨光 陶杰 (85)

中华文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视阈下城市精神培育路径研究

——以佛山市为例 陈燕霞 (90)

浅谈礼仪文化的当代价值 王燕 (96)

一家之言

论抗疫大考对我国国家治理的检验 曾宇青 (99)

国家治理现代化: 问题、对策 吴玉英 (103)

学员在线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路径探析 毕亚林 (109)

Main Contents

Xi Jinping's Discussion on Scientific System of Socialist Social Construction	Sun Xiaohan (5)
Practi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n Guangdong	Shi Chunmiao (10)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Cultural Vie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Hao Jiajing (16)
National War on COVID-19 and Enhance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ohesion	Zhou Xingliang etc. (21)
On Generation Logic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 Important 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United Front Work	Zeng Danfeng (35)
Review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United Front Serving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Zhang Linhong and Liao Fuchao (40)
Discussion 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Soong Ching Ling's Career in New Era	Xie Dejie (47)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Its Future Prospect	Lin Shaohong (51)
Some Thoughts on Enhancing Ability of Democratic Parties to Participate in and Discuss Politics in Contex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Qi Chunlei and Chen Qianqian (57)
Researching on Rural Christianity from Perspective of Rural Governance	Wang Nana (62)
Becoming Bigger or Stronger? Growth Paradoxes of SMES Studying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Human Resources Investment	Liu Yuya (68)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Reflections on Strengthening Young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Xie Sujun and Sun Hui (75)
Studying on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Museums i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Qi Yankun (81)
Path Choice and Think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Non-Party Intellectual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New Era	Yang Guang and Tao Jie (85)
Study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City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Urban Theory	Chen Yanxia (90)
On Contemporary Value of Etiquette Culture	Wang Yan (96)
On Test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in China Fighting against Epidemic	Zeng Yuqing (99)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Wu Yuying (103)
Exploring Path on New Social Stratum Personage Serv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New Era	Bi Yalin (109)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科学体系初探

孙霄汉

(东莞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83)

摘要: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内容丰富, 思想深邃, 其理论框架可概括为: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宗旨论, 坚持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社会建设原则论, 坚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价值标准论, 坚持体制改革创新的社会建设动力论, 坚持不断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重点论, 以结构合理、安全有序、和谐共享为基本要求的社会建设目标论等。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建设; 科学体系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05-05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上, 立足于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问题进行了诸多创新性论述, 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立意高远, 内容丰富, 思想深邃, 本文试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根本宗旨、实践原则、价值标准、推进动力、重点领域、目标要求等方面, 分析其理论框架和科学体系。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宗旨论

社会建设宗旨论所要回答的是社会建设“为什么人”“依靠谁来建设”“结果谁来检验”等根本性问题。社会建设的宗旨决定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向、方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和宗旨,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以服务人民为社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针对社会建设为什么人的问题, 习近平指出: “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①。他多次强调, 社会治理要以人为本, 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

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从而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他把社会建设宗旨与执政党的性质的关系有机结合起来进行了阐述: “全党必须牢记, 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②

2. 以人民群众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

在社会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上, 习近平遵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明确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依靠和主体力量, 强调创新社会治理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 尊重人民的权利地位、激发人民的主体意识、凝聚人民的治理智慧。他指出, “一切治理活动, 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拜人民为师”^③; 他曾强调, 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要经过人民群众讨论决定。

3. 以人民满意为社会建设的根本标准

社会建设的成效如何, 以什么尺度检验, 谁来检验, 这是个重大政治问题, 也是个实践原则问题。习近平认为,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随时随刻倾

收稿日期: 2020-06-24

作者简介: 孙霄汉 (1964—), 男, 汉族, 湖北监利市人, 东莞市社会主义学院科研科科长、教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治理等。

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以建设充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为归依;不论是和谐社会、平安社会、信用社会,还是健康社会、法治社会、幸福社会,归根究底,都是人民主导的社会。”“检验我们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④

总之,社会建设与治理,必须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一切接受人民检验,这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的社会建设的根本宗旨。

二、坚持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社会建设原则论

社会建设的原则是社会建设实践活动的重要准绳。针对社会建设的原则,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进行了集中阐述:“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⑤这一论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应当遵循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等基本的实践原则。

坚守底线,就是要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习近平曾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发生旧社会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现代公共管理理论认为,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强调“政府是为弱势群体而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建设是相互匹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但竞争只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根本目的,要守住社会底线,防止出现两极分化,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

突出重点,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社会建设中的“短板”,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心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完善制度,就是要着力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制度体系。这一原则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我国社会建设的制度缺失提出来的。经过40

年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制度不断完善,但社会领域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加快构建我国社会领域的制度将是新时代改革的重要一域。

引导预期,强调的是社会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事情接着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注重实效。不能贪大求洋,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最终失信于民。同时,要引导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信念。习近平指出:“一勤天下无难事”,并身体力行,号召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三、坚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价值标准论

社会建设既有实践准则,又要有价值标准,社会建设价值标准对社会建设过程和方向起着文化与精神引领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确立为标志,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被明确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价值标准。习近平对践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价值标准也进行了丰富阐述。

1. 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价值的根本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保障,也是社会主义平等、公正的制度基础。只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公正。习近平曾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既要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避免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让所有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

2. 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公平的法治性要求

习近平特别重视通过法治来保障社会公平,反复强调要实现“三个公平”:即规则公平,实现规

则面前一视同仁；机会公平，实现人人都有机会，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权利公平，实现公民基本权利一律平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3.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不断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由

自由是对纪律、共同规则遵守前提下的行为自律，是合法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个历史范畴，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强调只有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快速发展，物质文化精神产品不断丰富，才能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实现更充分的自由。

四、坚持体制改革创新的社会建设动力论

在社会建设的动力方面，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改革是动力”的重要思想，并把这一思想拓展到社会建设领域。相关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深化体制改革创新是推动社会建设的关键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国经济不断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相当长一个时段里，我国社会领域的改革相对比较被动、滞后。社会建设制度不健全、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也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建设根本性因素。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要不断创新社会建设与治理体制，为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就与进步，最根本的就是紧紧抓住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这个“牛鼻子”。对此，习近平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⑥；“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⑦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体制的目标模式

2011年初胡锦涛曾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上提出了我国社会管理的格局。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结合我国社会领域的形势，回应社会关切，明确提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建设体制模式。十八大报告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社会建设认识的深化，也明确了社会建设与治理的改革与创新目标。

党委领导，就是要发挥党委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社会建设体制的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优势。政府负责，这是对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社会建设责任主体的明确。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责任是提供公共产品，重点是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协同强调的是，社会建设必须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形成合力。公众参与，要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建设与治理中的参与作用，有序引导和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能力，把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法治保障，强调的是把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贯穿于社会建设与改革的全过程。

3.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重治标、轻治本，重“管制”、轻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强调社会建设要摒弃传统的“管制”思维，坚持贯彻“治理”理念。对此，习近平曾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坚持系统治理方式，要求在发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时，积极调动社会各方参与，从政府包揽向政府负责、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坚持依法治理，要求社会建设与管理从片面强调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坚持综合治理，就是要从单一的行政手段向包括思想教育、文化引导、道德教化、法规约束等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坚持源头治理，要求遵循社会治理的规律，坚持问题导向，分析矛盾原因，从根本上解决矛盾、防微杜渐。

4. 健全社会治理机制

相对体制而言，机制是技术层面的制度，健全的社会治理机制是社会政策制度效能的保障。在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方面，习近平提出要构建一系列机制，包括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社会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突发事件监测预警机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习近平还就社会治理的一些重要环节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城乡社区

治理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优势等。这些也都是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也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针对性。

五、坚持不断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重点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社会建设的重点指向民生。进入新时代,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习近平对改善民生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系统阐述,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创新性思想。

1. 增进民生福祉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之策

社会治理以和谐、善治为要求。习近平认为,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实现和谐、善治,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他强调,要“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问题,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⑧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为了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归根究底就是一项民心工程。赢得了民心,社会和谐、善治就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2. 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社会建设与治理工作千头万绪,并与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建设发展密不可分,有序推进社会建设必须找到有效工作“抓手”。对此,习近平认为,“要重点加强基本公共服务”。^⑨“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社会进步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基本公共服务属于“纯公共产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首先要把老百姓最关心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就业、分配、社会保障等事情办好。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教育事业作为民族复兴的基础性工程置于优先发展位置;要把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着力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健全公共医疗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房住不炒”,建立中国特色的住房保障制度。这些创新性思想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和新时代改革的政策指引。

3. 拓展民生建设的内涵

基本民生之“基本”是相对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基本民生的内容拓展和标准提升是必然趋势。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就把基本民生向幼儿教育、扶弱助残等领域拓展。同时,习近平还强调,要致力于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全面提升国民身体健康素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打赢蓝天保卫战,等等。在习近平社会建设论述中民生范畴,已不再局限于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收入分配,而是扩展到扶贫帮困、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

六、以结构合理、安全有序、和谐共享为基本要求的社会建设目标论

社会建设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在广义上又是涵覆多个方面的大系统,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的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目标是相统一的。习近平社会建设目标重要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结构合理。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社会建设与治理的重要维度,社会有机体的有序运行和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有合理均衡的结构。对此,习近平强调,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一个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居民收入结构;要构建均衡发展的空间结构,推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要注重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并领导不适时地调整了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等。

2. 运行安全

社会运行如何保证安全平稳有序,习近平结合当今时代特点和国情进行了深刻思考和阐述,突出体现在其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创新思想。他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⑩

“总体安全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一是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侧重讲外部安全或对外安全，总体安全观则强调既要重视外部安全，又要重视内部安全。二是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特别是要注意防范和应对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等新型安全形态。三是统筹“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要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四是统筹“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国家发展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的条件。五是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安全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的安全必须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关于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3. 和谐共享

“一个好的目标，既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⑪。从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到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美丽一起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并写入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对社会建设认识的重要深化，也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定位。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就提出了包括共享在内的新发展理念。共享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逻辑，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社会特质。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国梦，应当使中国人民“人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中国梦是国家振兴和人民共享之梦。这是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和和谐共享目标的生动诠释。

总体看，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其创新体现在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宽广、体系更完整、目标更

明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及相关重要思想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治理改革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注释：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3。
- ②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10:44。
-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9:22。
- ④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9.22。
- ⑤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10:44。
- ⑥ 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加强和创新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人民日报，2014.3.6。
- ⑦ 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7.25。
- ⑧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4:222-223。
-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11。
-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170。
- ⑪ 同上第130页。

参考文献

- [1] 谢志强等. 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新要求[J]. 理论视野, 2018(3).
- [2] 韩喜平, 巩瑞波. 习近平社会建设战略思想的鲜明特征[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7(10).
- [3] 魏礼群. 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8(04).
- [4] 郭强, 杨胜荣. 习近平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创新与精神实质[J]. 东岳论丛, 2017(07).
- [5] 郭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02).
- [6] 何绍辉. 习近平社会建设思想: 主体构成及价值取向[J]. 毛泽东研究, 2016(04).
- [7] 刘爱军, 段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善民生与创新社会治理[J]. 理论探讨, 2018(01).

【责任编辑：张山】

广东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扶贫工作重要记述的实践

师春苗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广东 广州 510623)

摘要: 习近平高度重视教育扶贫的战略地位, 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教育扶贫模式。广东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扶贫工作主要论述, 把实施教育文化扶贫工程作为实施脱贫攻坚八项工程之一, 展开了一系列教育扶贫实践活动, 夯实教育脱贫根基, 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加强贫困地区师资队伍建设,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文章希冀通过梳理广东教育扶贫的地方实践, 为广东乃至全国进一步开展教育扶贫, 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借鉴。

关键词: 习近平; 教育扶贫; 广东; 实践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10-06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教育,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一直强调教育扶贫的先导地位和基础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将“发展教育脱贫”作为五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 并对教育扶贫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扶贫攻坚的基本遵循。广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 深入推动教育扶贫工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习近平教育扶贫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 教育扶贫的战略地位

教育扶贫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是“扶教育之贫”, 同时还包含着“依靠教育扶贫”。^[1] 教育扶贫既是扶贫的重要目标和内容, 也是实施扶贫开发的重要手段和路径, 对于扶贫开发有着基础性、先导性和根本性作用。

1.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教育是促进阶层流动、消除个体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2015 年 11 月, 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指出: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

之策。贫困地区教育事业是管长远的, 必须下大力气抓好。扶贫既要富口袋, 也要富脑袋”^[2] 2017 年 1 月, 习近平春节前夕在河北张家口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 再次指出, “要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 确保贫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 具备就业创业能力, 切断贫困代际传递”。^[3] 可见, 要改变贫困人口的阶层固化, 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 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发展教育。

2. 教育扶贫是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扶贫, 消除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在教育资源享有上的不平等, 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 补齐教育短板, 既是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一环, 也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和重要内容。习近平非常重视教育扶贫和教育公平。他指出: “抓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大计, 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4]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5] 为了促进教育资源均等化, “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 特别是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

收稿日期: 2020-07-20

作者简介: 师春苗 (1976—), 女, 河南洛阳人,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处副处长,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改革开放时期广东地方党史研究。

保障贫困地区办学经费，健全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6]

3. 教育扶贫是调动贫困群众内发动力的根本方法。脱贫攻坚作为一项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既要整合外力，也要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才能避免出现“干部干，群众看”“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不良局面。习近平指出，“脱贫攻坚，群众动力是基础。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关系，培育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意识，培养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技能，组织、引导、支持贫困群众用自己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7]

（二）教育扶贫的模式：精准扶贫。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针对我国扶贫脱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精准扶贫”的重大战略决策，教育扶贫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必须遵循这一总体要求，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

1. 扶持谁：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我国贫困地区特别不仅仅是资源贫乏，自然条件恶劣，更是技术和人力资源的缺失，教育扶贫必须精确识别需要帮扶人群。习近平指出：“精准扶贫，关键的关键是要把扶贫对象摸清搞准，把家底盘清，这是前提……贵州省威宁县迤那镇在实践中总结出了‘四看法’：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就是通过看农户受教育程度和在校生现状等，估算其发展潜力和教育支出”。各地要在深入调查、精准识别的基础上构建科学动态的数据库，为教育扶贫奠定良好的基础。

2. 谁来扶：精准确定责任主体，是精准扶贫的保障。精准扶贫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涉及面广，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教育扶贫体系。一要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和政府的主导地位，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二要广泛动员社会各方

面力量，形成强大的社会扶贫合力。要构建一种“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8]“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引导社会扶贫重心下移，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9]

3. 怎么扶：精准实施扶贫方式，是精准扶贫的关键。教育扶贫不能一刀切，要根据“贫根”，对症下药，精准施策，方可确保帮扶效果。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扶贫政策从设计到落实都要更加人性化、更加精细化，让贫困家庭孩子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0]具体而言，把教育扶贫对象聚焦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上，针对不同教育阶段和教育类型的贫困人口提出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精准教育扶贫措施。《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明确规定：对建档立卡学龄前儿童，确保都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对建档立卡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确保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义务教育；对建档立卡高中阶段适龄人口，确保都能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对建档立卡高等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建档立卡学龄后人口，提供适应就业创业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

（三）教育扶贫的重要领域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教育扶贫的着力点在哪里？习近平多次要注重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这正是教育扶贫具体措施的重要领域和主要内容。

1. 高度重视发展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普及教育覆盖、推进教育发展最基本的内容，一直是我国政府教育扶贫的工作重点，对于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切断代际贫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强调：“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下一代要过上好生活，首先要有文化，这样将来他们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义务教育一定要搞好，让孩子们受到好的教育，不要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11]十八大以来，为了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在“两免一补”的基础上，逐渐施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改

善计划”“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行动”“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以及“农村校长助力工程”等，更加关注贫困地区教育条件的改善，为贫困地区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尤其值得说明的是，习近平把加强贫困地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2015年4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提出了大力提升乡村教师待遇等一系列措施，为新时代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对脱贫致富的重要作用。开展职业教育，让贫困人口子女学到一门技术，对于提高就业创业能力，进而实现脱贫致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意义。2014年6月，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12] 2015年11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是管长远的，必须下大气力抓好。脱贫攻坚期内，职业教育培训要重点做好。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能接受职业教育，掌握一技之长，能就业，这一户脱贫就有希望了。”根据中央指示，从2015年底，国务院扶贫办将职业教育培训纳入“十三五时期”十项精准扶贫工程，逐步加大实施力度。

二、广东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扶贫有着极大的创新性和实践性，对于新时代坚决打赢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东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制定或完善了一系列教育扶贫的政策措施，先后下发《关于新时期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意见》《贯彻落实〈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实施方案》，把实施教育文化扶贫工程作为实施脱贫攻坚八项工程之一，展开了丰富多样的教育扶贫实践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进一步夯实教育脱贫根基，加快完善学前教育资源建设，提升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广东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以提升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乡村地区教育质量为重点，着力补齐基础教育发展短板。一是加快发展学前教育，扶持欠发达地区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出台《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省学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制定实施三个广东省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大力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统筹学前教育资金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强贫困地区乡镇中心幼儿园和村级幼儿园建设，保证贫困地区每个乡镇至少办好一所公办中心幼儿园。到2018年，广东省学前教育毛入园率112.46%，全省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占比达75.83%以上。^[13] 佛山市和广州市番禺区入选国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二是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办学水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09年广东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正式启动。2011年，省政府将“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列入“十项民生实事”，安排112亿元予以重点推进。2013年后，广东将贯彻落实“全面改薄”工作与教育“创强争先”、推进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创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到2016年底，广东所有县（市、区）全部接受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的督导评估认定，达到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校际间均衡系数标准，成为全国第六个实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全覆盖的省份。全省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校园校舍建设开工率、竣工率，设施设备采购完成率均位居全国第二。^[14] 三是积极推动教育信息化工程，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制定推动《广东省教育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解决粤东西北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基础性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优质均衡发展。2017年，教育宽带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全省各级各类学校网络带接

入率达100%，全省中小学基本实现“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不断普及和深化。全省多媒体教学进普通课室比例达91%。学习空间“人人通”取得进展，全省超过61%的教师学生开通网络学习空间。完成广东省100万名中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目标。^[15]

（二）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广泛开展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教育脱贫能力。职业教育在教育脱贫工作中是见效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扶贫方式。拥有全国规模最大职业教育的广东，推进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对接，推进职业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倾斜。《广东省贯彻落实〈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实施方案》《广东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都对职业院校服务脱贫攻坚进行了部署。实践中，广东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协作计划和技能脱贫千校行动，支持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到珠三角地区或其他经济较发达地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在享受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政策的基础上，对其实行生活费补助政策，帮助这些学生完成学业，实现就业；加大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和贫困户教育培训工程实施力度，引导企业扶贫和职业教育相结合，鼓励职业院校面向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开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比如开展“粤菜师傅工程”和“南粤家政工程”等，通过培养和培训，提升贫困人群技能，助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另外，广东还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到2018年，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下同）完成招生29.72万人，在校生86.73万人；全省高等职业院校完成招生29.53万人，在校生82.99万人；招生规模占全日制普通本专科总数的半壁江山。^[16]

（三）加强贫困地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贫困地区教师队伍素质。教师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贫困地区师资队伍建设是实现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教师队伍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作用，先后印发《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实施办法》《关于全面实施“强师工程”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的

实施意见》《广东省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岗位津贴的实施方案》《广东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法（2015-2020年）》等一系列文件，加大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力度。具体而言，一是保障贫困地区教师工资福利待遇。省财政每年安排奖补资金对粤东西北给予补助，切实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两相当”，进一步完善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学校教师生活补助政策，突出差别化补助，重点向边远山区和艰苦地区倾斜，将政策实施对象从义务教育学校和完全中学扩大到公办普通高中和公办幼儿园在编在岗教职工，2018年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学校教师岗位津贴标准提高到每月1000元的标准发放。二是大力推进实施“强师工程”，加大城乡教师交流培训。实施“优质师资资源下乡行动计划”，每年安排省级名校长、名教师和“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省级培养对象、特级教师到欠发达地区农村学校巡回讲学和指导，提升农村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三是加强对欠发达地区支教力度，建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的对口帮扶关系，并纳入对口帮扶整体规划。四是加强对乡村教师培养培训，认真落实国家和广东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建立省级示范、市县为主的乡村教师、校（园）长培养培训支持服务体系，每年为乡村地区培训一批幼儿园、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的骨干教师、紧缺学科教师和校（园）长。五是实施“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政策。对自愿到欠发达地区农村中小学任教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每年给予6000元退费，本科生退4年，专科生退3年。广东着力改革体制，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

（四）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教育扶贫。教育脱贫攻坚是一场任务艰巨的战役，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广东努力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教育扶贫。各级政府发挥扶贫主体作用，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教育扶贫力度。各民主党派、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扶贫教育脱贫。比如，2018年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帮扶云南怒江特困地区教育工作，成立“广东民盟烛光学校”，捐赠490余万元；

民建广东省委员会资助贫困学生 3811 人, 资助金额 508 万元;^[17] 民进广东省委员会围绕粤东西北脱贫攻坚, 开展“百位名师结对培养合作”项目; 台盟广东省委员会整合广州市优质教育资源, 在各帮扶地点推行“智力扶贫”。广东民营企业也积极投身教育慈善捐赠事业, 设立教育基金, 开办扶贫学校, 直接捐款捐物等等, 涌现了不少明星慈善家。据胡瑞慈善榜单显示, 2017 年, 捐赠额前十名的广东民营企业家中, 捐赠投入到教育、扶贫、社会公益领域的分别有 8 位、3 位、5 位, 2018 年为 4 位、6 位、3 位。广东民企企业碧桂园集团就是教育扶贫的典型代表。碧桂园集团创始人杨国强热心教育扶贫, 从 1997 年致力教育扶贫, 因创新的教育扶贫理念和卓有成效的实践, 于 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 被授予“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杨国强先后创办三所纯慈善、全免费的学校, 设立教育助学基金, 开启了教育扶贫领域“政社互动”帮扶的范本。碧桂园集团只是广东教育扶贫的一个典型代表, 还有很多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扶贫。

三、广东教育扶贫的几点启示

(一) 教育扶贫必须坚持精准扶贫, 实现模式多样化。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亮点和精髓,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贫有百样, 困有千种, 教育扶贫必须模式多样, 才能真正做到精准性和多样性的统一。2016 年 12 月,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的通知》中, 将“精准”理念正式运用到教育扶贫当中, 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 2017 年 7 月, 广东制定《贯彻落实〈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实施方案》, 对广东教育脱贫的总体要求、任务措施、实施步骤、组织保障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明确详细的部署, 明确了教育扶贫的重点地区和重点对象,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贫困人口制定了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精准教育扶贫措施,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教育精准扶贫经历了从教育普及到精细化资源配置, 由关注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权利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目标转变。^[18] 今后, 教育扶贫要立足优化结构、提升质量、提高效益等方面, 因地制宜, 循序渐进, 转型升级, 更好地发挥教育的代际脱贫作用。

(二) 大力发展教育信息化, 努力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教育信息化是促进教育公平,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习近平在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中指出, “中国坚持不懈推进教育信息化, 努力以信息化为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我们将通过教育信息化, 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19] 因地制宜扶持贫困地区大力发展教育信息化, 让信息化成为贫困人群的教育脱贫助推器。目前, 落后地区学校信息化发展仍有很大不足, 与城市地区仍有很大差距, 要进一步加大信息化在教育扶贫的作用和建设: 要加大投入, 积极探索创新以信息化引领贫困地区教育跨越发展的有效模式; 要改进管理, 着力提升教育信息化设备的利用率和使用效果; 要高度重视融合应用, 促进信息化手段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持续推动优质资源“班班通”和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

(三) 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合力, 形成良性扶贫机制。教育脱贫攻坚是一场任务艰巨的战役, 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政府是教育的主导者和主办者, 理应为全体国民接受良好的教育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是我国政府的庄严承诺, 也是脱贫攻坚必须完成的任务和实现的目标; 社会组织、公益机构、志愿行动等是扶贫开发的重要力量, 要充分调动和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公益性社团、企业、个人等参与教育扶贫工作。目前, 精准教育扶贫要求制度设计中过于突出和聚焦政府自身的功能, 对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 特别是教育贫困人群自身的政策引导和政策鼓励不足。^[20] 广东毗邻港澳, 有扶贫济困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 曾涌现出一大批像陈香梅、伍舜德、马兰芳伉俪, 曾宪梓、田家炳、李嘉诚、霍英东^[21] 等热心广东教育事业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 也曾涌现出杨国强、许家印等一批民营企业家, 他们捐资助学, 对广东教育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为广东教育扶贫的重要力量。

今后，要继续创新扶贫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合力，更好地推动教育扶贫。

参考文献

- [1] 刘军豪, 许锋华. 教育扶贫: 从“扶教育之贫”到“依靠教育扶贫”[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 2016(02).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83-86.
- [3]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河北张家口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EB/OL](2017-01-2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24/c_1120377384.html.
- [4]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4-12-11).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211/c70731-26191909.html>.
- [5] 习近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N]. 人民日报, 2016-09-10.
- [6] 习近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N]. 人民日报, 2016-09-10.
-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143.
-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99—100.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N]. 人民日报, 2016-03-18.
- [10] 本书编写组.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40-43.
- [11] 习近平.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EB/OL].(2015-12-01).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1201/c83855-27877446.html?winzoom=1>.
- [12] 习近平. 习近平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N]. 人民日报, 2014-06-24.
- [13] 广东年鉴编辑委员会. 广东年鉴2019[M]. 广州: 广东年鉴社, 2019: 273—274.
- [14] 广东年鉴编辑委员会. 广东年鉴2017[M]. 广州: 广东年鉴社, 2017: 290.
- [15] 广东年鉴编辑委员会. 广东年鉴2018[M]. 广州: 广东年鉴社, 2018: 276.
- [16] 广东年鉴编辑委员会. 广东年鉴2019[M]. 广州: 广东年鉴社, 2019: 275—276.
- [17] 广东年鉴编辑委员会. 广东年鉴2019[M]. 广州: 广东年鉴社, 2019: 78—79.
- [18] 刘航、刘海民. 教育精准扶贫: 时代循迹、对象确认与主要对策[J]. 中国教育学报, 2018(04).
- [19] 习近平. 习近平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N]. 人民日报, 2015-05-24.
- [20] 司树杰, 王文静, 李兴洲. 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97.
- [21] 《广东省志》编辑委员会. 广东省志(1979—2000)侨务卷 外事与港澳事务卷[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14: 193—194.

【责任编辑：张山】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的理论特色

郝佳婧

(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主要从文化的属性、文化的来源、文化的发展、文化的方向、文化的空间等方面着眼, 展现出了鲜明的理论特色。具体而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将政治高度与人本维度相统一、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相统一、历史维度与现实向度相统一、问题维度与目标维度相统一、民族角度与世界向度相统一, 彰显出了鲜明的理论特色。

关键词: 习近平;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16-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所有中华儿女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以及道德规范的汇聚与凝结, 能够为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方向引领的作用。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紧密结合我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境遇的前提下, 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诸多新要求、新部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将政治高度、人本维度、理论深度、实践广度、历史维度、现实向度、问题维度、目标维度、民族角度、世界向度有机统一、深度融合, 在文化的属性、文化的来源、文化的发展、文化的方向、文化的空间等方面展开, 都充分体现了其显著的理论特色。

一、文化的属性: 政治高度与人本维度相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将政治高度与人本维度相统一。其“政治高度”表现在,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顶层设计, 注重文化对社会建设其他方面的反作用; “人本维度”则表现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主体, 为促进全人类的全面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

(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的政治高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的政治高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着重强调了文化建设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所展现出的推动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二是强调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政治立场”, 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 直接体现了其鲜明的政治立场。三是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导向”, 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定方向、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道: “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什么? 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核心价值观, 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2]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明确了核心价值观建设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 更加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导向”。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蕴含浓厚的政治意蕴, 以文化促进政治, 将文化与政治相融合, 彰显了其政治高度。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并不是一味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牢牢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收稿日期: 2020-06-25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优化问题研究”(SJGSM2017001); 东北林业大学教育教学重点项目“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研究”(DGYZD2017-01)

作者简介: 郝佳婧(1994—), 女, 黑龙江佳木斯人, 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基本方略，做到了政治高度与人本维度的统一。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人本维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人本维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是统一的。“民富”才能“国强”，而“民富”不光是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人民精神生活的充实和精神世界的丰富。同样，“国强”的内涵也不局限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生态文明、科技创新、国防有力，还要实现文化繁荣，为我国推进其他各项事业提供精神动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样的要求以“人”为落脚点，鲜明地展现出了其人本维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谋求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远大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表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在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守好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也会危及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牢牢握在手中，是为了国家安全，也是为了国民安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学说，是具有高度科学性的学说，是具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全人类解放作用的学说，也是立党立国必须牢牢坚持、一以贯之的学说。在文化建设领域，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南，体现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政治高度与人本维度的高度统一。

二、文化的来源：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相统一

将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重要特色之一。理论的“深”，表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与中国共产

党的文化建设经验为理论基础，在文化建设实践上注重理论的作用；实践的“广”，表现在其理论渊源同样源于实践，而作为一种先进性、科学性的理论又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起到指导作用。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理论深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理论之“深”，不仅体现在其内容的广博上，还体现在其具有牢固的理论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建设经验在根本上源自于宏阔的实践。其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为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认为，实践是文化的直接来源，而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与人关系密切。在本质上，文化即是“人化的”；在功能上，文化对个体有塑造作用、对社会具有整合、凝聚的作用，是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发展上，文化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又有着相对独立性；在目标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相契合，文化发展、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不断促进直至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列宁认为阶级社会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务必充分认识到文化对于国民、社会、国家、民族的重要作用，必须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加强文化建设，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以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建设的经验为直接经验来源。中国共产党人在岁月的洗礼下，在文化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表现为理论，在根本上来源于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有益经验，包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根植实践、加强理论武装、坚持依靠群众等，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理论奠基。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实践广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的实践广度,在实践路径上有着重要表现。其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从根本上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也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完善体系。需要看到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的理论与实践不是机械分离的,而是有机统一的,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的兼顾贯穿其各个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在实践中得以诞生,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反之又指导着实践。其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理论建设,要求以加强理论武装为主要抓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积极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基本架构,以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为牵头动力,将理论积极应用于实践。其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的是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在蕴含着理论意涵的同时也包含着实践路径。譬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在文化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建设、传统文化的发展、在网络空间以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上着力等,都是从现实的角度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从根本方向、价值取向、基本导向、历史转向、现实指向和世界走向等多个向度考量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彰显出了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相结合的鲜明理论特色。

三、文化的发展:历史维度与现实向度相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历史维度与现实向度相统一特征。其“历史维度”主要表现在对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方面;其“现实维度”表现在传承、弘扬、发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和方式上,也表现在对我国发展现实境遇的考量上。

(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的历史维度

其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要求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时间上源远流长、内容上博大精深,其价值依然需要当代人加深挖掘,弘扬其新时代的价值。要不忘本来,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还要面向未来、放眼将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其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要求不断进行文化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不日新者必日退’……努力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4]文化绵延千年,展现出其历史传承性。作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更需要历久弥新、开拓创新。“继承”体现的是历史维度,“创新”体现的是现实维度,创新需要以继承为基础,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依托,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行创新,将历史与现实统一起来,依托历史,把握现实、服务现实,体现了将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的结合。其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要求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合成词,由“文化”和“自信”两个词语组成。“文化”是人在实践中产生的思想认识、道德观念等精神活动及产品的总和,包含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而“自信”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文化自信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本民族文化所产生的认同感、荣誉感与自豪感等。而文化自信所依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优秀文化资源,是我们培育和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

(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的现实向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对我国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作出了深入考量,顺应时代的潮流与趋势,必然要在互联网技术上着眼。日前,网络通讯技术得到了广泛使用,网民数量庞大,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技术(5G)日趋成熟并逐渐投入使用。网民规模的不断加大和互联网普及率的持续提高,也要求我们积极进行网络治理,利用网络弘扬正能量,打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谁轻视互联网,谁就会被时代所抛弃。”^[5]明确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必须利用好互联网的现实要求。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有之义，而依托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将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相统一的理论特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将网络作为现实指向，要求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直面许多问题因网而生、因网而增的现实。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借网而进”，理直气壮唱响主旋律，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问题要“借网而化”，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的现实维度，还体现在文化对经济与政治的引领作用上。如果说经济是“骨骼”那么文化就是“血脉”，先进性质的文化能够为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方向保证、精神动力以及智力支持。

四、文化的方向：问题维度与目标维度相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环境考验，需要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其“问题维度”的表现；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明确的目标追求，是其“目标导向”的展现。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的问题维度

我国在完全解决了“挨打”问题、基本解决了“挨饿”问题之后，面临着失语的“挨骂”问题。我们“挨的骂”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国际社会的敌对势力企图对我国进行“颜色革命”，肆意抹黑我国的社会制度、抹黑我国的国家形象，大肆宣扬“普世价值”“西方中心论”等，对我国的主流价值观造成冲击。他们在国际社会肆意散播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歪曲历史，对我国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并对我国进行“颜色革命”，以求潜移默化地分裂我国，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做出过这样的一番论述：“国际舆论格局是西强我弱，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

论，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这个问题要下大气力加以解决。”^[6]二是国内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尤其在网络上频繁出现不当、甚至政治反动言论。国内还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社会思潮。在文化的建设和宣传上，还存在着创新意识不强、力度不够、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如何在国际上化解西方国家及其附庸国对我国的歧视与批评，如何在国内解决多样性社会思潮涌现、无视甚至背离主流价值观，质疑甚至否定我国基本制度的问题呢？面对这些问题需要冷静思考、客观分析，坚持自我反思、自我批评，明确问题出自哪里、原因是什么、如何去解决，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所坚持的问题导向。之所以会挨骂，是因为我们对话语权还没有牢牢掌握，我们的文化自信还不够坚定，我们的主流价值观还有继续弘扬和培植的空间，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和民族自信心还需要增强。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对于这些现实问题高度重视，展现出了其问题维度。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的目标维度

除了问题维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还遵循了鲜明的目标导向，即目标维度。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目标的指引，也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认识。一方面，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我们要向着如期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迈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期许涉及到多方面，其中也包含了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并且这种需要在趋势上是动态的、日益增长的，这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就必然蕴含了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要义。“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7]而如期建成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要“文明”又要“国强”，都需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断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源自国内的挨骂问题、提升

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也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源自国际的“挨骂”。不断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是有效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路径,有益于我国在国际社会树立负责任、勇担当的良好国际形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个目标;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问题,也必须努力达到目标。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凸显出了问题维度与目标维度相结合的理论特色。

五、文化的空间:民族角度与世界向度相统一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也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展现出了民族角度与世界向度相统一的鲜明理论特色。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民族角度

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精神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精神动力。其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的内容展现出显著的民族性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突出优势。文化已经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拥有优秀文化资源的中华民族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中屹立不倒。在内容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鲜明的人文精神、突出的价值理念等,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重要目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要求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从国家内部角度着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求发挥好文化事业的公益服务性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体现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的民族性。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的世界向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的世界向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华文化辉煌灿烂却不孤芳自赏,有着突出的优越性却不故步自封,而是积极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将民族文化世界发展趋势相结合,形成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我们“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8]中华民族是善于学习的民族,是乐于交流互鉴的民族。我国的文化宝库是继承前人、借鉴他人的结果,既从先人那里继承思想精华,也在他人那里汲取文化因子。中华文明的发展需要交流互鉴,世界文化多样性、丰富性也离不开中华文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的体现。文明互鉴的文化理念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治理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要求发展中华文化,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得清”“看得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切实把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搞好,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迈进。”^[9]中华文化文化要实现发展,需要积极地“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传播中国声音、切实讲好中国故事、牢固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同时,坚守中华立场需要以更广阔视野、更广博的胸襟接纳西方文化,坚守民族性,尊重世界性,守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同样是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体现。

参考文献:

- [1][2][6][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7, 204,197,167, 199.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2.
- [4][5]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6.
- [7]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0.

【责任编辑:张山】

“中国战疫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笔谈

编者按：2020 年新春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蔓延全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临严重的威胁。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超强的凝聚力，掀起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战疫风暴，赢得了战疫的首战大胜。为反映中国战疫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之间的内在关系，激励各行各业和各族人民进一步凝心聚力去争取抗疫斗争的新胜利，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联合举行以“中国战疫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为主题的笔谈会，本刊在 2020 年第三、四期分别优选刊发部分成果。

关键词：中华民族；凝聚力；疫情防控；笔谈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6 (2020) 04-0021-14

全国战“疫”与中华民族凝聚力之提升

周兴樑

(中山大学教授)

中华民族是我国 56 个民族的统称。其民族凝聚力，是指我国各个民族、不同政党和全体民众所产生形成的内向聚合力，及外向吸引力。今年新春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市爆发与肆虐，并向全国各地迅速蔓延扩展。它严重威胁广大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伤害与阻碍着社会经济之发展。这场疫情之来袭，对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个严峻的考验，也为它的进一步提升和强化提供了机遇。

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疫情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之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蔓延势头；1 月 27 日，李克强总理亲临武汉视察疫情防控工作，及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护人员。随着党中央、国务院一声令下，一场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即在武汉及全国各地打响了，经过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战“疫”，我国第一阶段的防控工作已获得巨大胜利：武汉在“封城”76 天后，于 4 月 8 日零时解封了！各省市之“战疫”也捷报频传。全国卫健委之统计称，

截止 8 月 16 日，据全国 31 个省市区和新疆建设兵团报告：现共有确诊病人 612 例，疑似病人 4 例。这与美国、巴西及印度等，目前每天之新增的感染者仍以数万人计、疫情处于失控状态，简直有天壤之别。中国前段战“疫”之伟大胜利，来自党中央的英明坚强领导，及中华民族凝聚力之进一步提升；同时这也彰显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认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战“疫”过程中之进一步提升，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间的政治亲和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共是执政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致公、九三、台盟八个民主党派是在中共领导下参政议政。在此次武汉疫情发生后，中央之战“疫”令一下，共产党人固一马当先逆行抗疫，各个民主党派也积极动员党员参与战斗——仅援鄂的民主党派医护人员就有 800 多人。各党派之白衣战士并肩携手，成为抗疫的一支中坚力量。（二）全国医疗卫生界的

医护人员，团结一心、协同抗疫，筑起了一道道防控疫情蔓延扩散的肉体长城。我国疫情爆发之初，武汉市和湖北省是疫区。全国卫健委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科学地组建与调度一支支疾控队伍支援武汉和湖北抗疫，从除夕夜上海首支医疗队抵汉后，到3月8日时全国已有346支医疗队，计4.26万白衣天使抵达湖北抗疫；他们来自解放军及全国19个省市区的各级医院，在武汉战“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留守各省市区的医护工作者，则本着守土有责、担责与负责的精神，奋战在本地的抗疫第

一线。（三）全国的各族人民群众，不分民族，不分职业与信仰，不分年龄和性别，都坚信恪守“防控疫情是责任”，而形成了万众齐心的战“疫”聚合力。于是，城乡所有的小区、村庄都设立监测站，检测来往行人的体温；广大民众皆宅居家中，做到不走亲访友，不听传谣言，及坚持多通风、勤洗手，出门一定戴口罩。这是一场十多亿民众人人参与、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抗疫人民战争！以上这些，彰显出了中华民族空前强大的战“疫”之民族凝聚力。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国家动员

邓双全，陈联俊

（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教授）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指《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的达到Ⅱ级及以上严重程度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突发紧急事件。2020年1月以来，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席卷全国。“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国家动员是国家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员、资金、物资等各类资源的征集和利用的行为总和。影响国家动员能力的因素较多，从硬件要素看，主要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科研水平、创新能力、基础设施等；从软件要素看，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核心价值、外交政策、领导体制、历史文化、民族特质、大众舆论等。国家动员的战略目标主要集中在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开展重大社会活动等方面。政治制度是

国家动员能力的重要因素，它使国家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能够迅速组织人员、获取资金、调配物资、形成广泛而坚定的凝聚力，“在关键问题上取得全国万众一心的支持”，从而“塑造国内共识，以便支撑国家基本政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制度优势愈发凸显出来。中国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中国共产党能够第一时间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应对风险挑战的巨大动力，迅速组织协调人力、物力、财力及其他相关资源，成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强大政治保障。国家从不同方面凝聚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和制度力量，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出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成为保证战胜疫情的内在动力。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务院发布并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成为在公共卫生事件爆发过程中应急创制的典范。国务院组建应急管理部，将国家其他13个部门的应急管理、生产监督、减灾救灾等职能进行深度整合，更好地统筹、协调、征集和利用物

资储备和应急力量，组建应急救助体系，指导推进应对突发事件各项事务，充分体现了政府部门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发挥的资源整合的关键作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资源整合、后勤资源整合、数据资源整合等方面都有巨大进步。中国政府坚持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医务人员、社区人员担当作为，扎实工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

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优势和国家动员能力，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良好形象。当然，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也存在工作人员素质不高、统筹协调不力、机构配置不完善、舆情防控不到位等问题，需要不断研究改进。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一项系统过程，要从理念更新、顶层设计、应急机制、舆论引导等方面提升国家动员的治理效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抗疫大考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凝练

解丽霞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果”和“重大战略成果”，既充分彰显了强大的中国力量、伟大的中国精神和罕见的中国效率，又孕育并诞生了伟大的“抗疫精神”，为打赢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必将以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成为伟大民族精神的滋养。

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奋斗精神。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既有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能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又有各位党员的闻令而动、英勇向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斗争态度。同时，广大医务人员义无反顾，成为火线上的中流砥柱，全力以赴救治患者。还有向着疫区挺近的最美逆行者，用实际行动让世人读懂了“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难关头豁得出来”的迎难而上的顽强斗

志，生动地诠释了“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战胜疫情的自强不息的乐观态度。

同心同德、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这是中国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真理，也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秉性。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既有中央的协调调度又有地方的各尽其责、既有军队的闻令而动又有大批企业的主动请缨、既有城市社区工作者的严格排查又有乡村村民的辛勤值守。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全国人民秉持同心同德、众志成城的精神，以实际行动和强大合力不断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

顾全大局、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华民族历来有家国情怀的传统，每当遇到艰难险阻和

面临紧要关头，总能以国家命运、民族利益为重，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舍己为公、共克时艰。为顾全大局，武汉人民以果敢的决断勇气、无畏的牺牲精神，自我隔离、自我封闭，以实际行动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展现了识大体、顾大局的英雄形象。局部的奉献和牺牲换来了全局的安稳和有序，这是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也是舍己为公的奉献和牺牲，更是战胜疫情的硬核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党和人民感谢武汉人民”！

迎难而上、共克时艰的担当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担当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中的内在基因，是在代际相传中鼓舞和激励无数仁人志士砥砺前行的强大硬核力量。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广大人民群众以超越个人的集体意识，用生命和行动展现了尽职尽责和担当奉献精神。同时，中国及时主动通报信息、分享抗疫经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有序开展防疫物资出口、开展国际科研交流合作等方式，为全球抗疫合作注入了力量，体现了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社会并肩作战、共克时艰的大国担当。

从医护人员的崇高精神品德看我们民族 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左双文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2020年1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袭击武汉，随之蔓延到湖北全省并波及到全国。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新冠肺炎染病人数已达2500多万人，疫情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中国，疫情发生后，经过一个短时间的混乱，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批医护人员、警察到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对口支援，人数达到数万人，这估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从这些医护人员调集的情况看，在地域上，有北、上、广一线城市的顶级医疗专家，包括好几位院士、解放军医疗机构的少将，也有全国各地最边远的一些省区的县级医疗机构的医生护士；从年龄上看，有钟南山等七、八十岁的老专家，有张文宏等年富力强的中年专家，也有20岁左右的年轻医护人员。他们很多人克服了各种家庭和个人的困难，义无反顾，冒着完全不可预测的生命危险，奔赴抗击瘟疫

的第一线，真的是可歌可泣，令人敬佩。

而且值得肯定和格外庆幸的是，他们从最初的缺乏经验、茫然失措中很快总结掌握了这个可怕的疫病的治疗和防护的基本知识，以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成功挽救了大批的患者，包括一些危重患者，绝大多数的赴援人员都安然无恙，胜利凯旋。在危难时刻，充分展现了我国的绝大多数医务工作者的崇高品德和良好的职业素养，他们身上，确实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的最值得弘扬的一面，他们是新时代全社会最值得尊重、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很伟大的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平时由于一些医患纠纷，受到各种伤害，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当然，在风暴的中心，在武汉市和湖北省，当地的医护人员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牺牲。如何建立健全公共卫生防御体系和公共卫生危机就对措

施，是这次疫情给我们提出的重大任务。。

另外，在抗疫期间，有个别地方卫健委、医院的个别领导，抗疫工作不认真、不积极，敷衍了事，专业水平低下，甚至超等级地占有一线救援工作人

员的特殊补贴，克扣他们的待遇，这些人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理，这是严重影响国民和单位员工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问题，必须得到果断及时的处理，树立正气，打击妖风邪气。

疫情中武汉民间志愿者群体所展示的民族凝聚力

何方耀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志愿者（Volunteer）的数量和表现是一个民族素质的重要体现，而在武汉因为疫情而封城的八十多天时间里，志愿者们们的惊艳表现刷新了人们的认识，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民族在巨大空难面前所展示的民族凝聚力。

一、志愿者展示了新时代的国民素质

2020年1月23日，武汉下达了封城的命令，一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就此按下了暂停键，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巴士、地铁、轮渡等所有公共交通停止运营，所有人员、车辆禁止进出武汉，但城内的一千多万人的生活还得继续，于是，封城带来了平时无法遇到的困难，特别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甚至上下班都成了问题。于是从快递小哥、出租车师傅、私家车主、小店老板到一般市民纷纷以微信群的方式组建起各种志愿者团体，或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或搬运急需的抗疫物资，或接送逆行回归武汉的医生，或者冒险运送病人。这样的组织从少数人的发起到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他们承担起了按下暂停键后所产生的各种非常任务。正如一

篇报道所说的那样，“谁也说不清，在武汉，像王昌（志愿者）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共享着同一个名字——‘摆渡人’。”正是这些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被媒体聚焦的无数的“摆渡人”帮助武汉渡过了艰难的新冠抗疫之河。他们无需政府组织，无需任何回报，稍稍地来，稍稍地去，解决了问题便无声无息地散去。没有鲜花相迎，没有掌声相送，却处处彰显了新世纪中国公民的素质和精神，展示了我们这个民族新时代的风貌和凝聚力。

二、志愿者展示了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担当精神

这批不图名、不图利，不需要组织、不需要动员自发组织起来为抗疫服务的“摆渡人”之所以要冒着生命危险（据报道的确有很多志愿者被感染）为武汉市民、特别是为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服务，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这座城市、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当灾难袭来时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挺身而出。无数武汉本地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他们之所以不顾危险地冲进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凶

险之地，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种主人翁意识和担当精神，而这种主人翁意识和担当精神正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和动力。

三、志愿者展示了大爱之心和家国情怀

民族凝聚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对这个民族的爱和家国情怀。而这次抗疫活动中志愿者所展示的正是这种大爱之心和家国情怀。例如在武汉封城之后有一批十堰籍的武汉医护人员已经回到老家十堰市与家人团聚欢度春节，但听到武汉的同事投入抗疫战役之后，他们自动建起微信群，准备组织起来逆行返回武汉，但担心抵达武汉后没有交通工具运送他们到工作单位，得知这一消息后武汉志愿者迅

速组织了15辆私家车和一辆大巴与他们对接，深夜在高速路口将连夜赶来的医护人员接往各自所在的医院。逆行的医护人员和深夜接送的志愿者共同谱写了一曲家国情怀的协奏曲。

今年的这场疫情来势之猛和波及面之广可以说史无前例，中国虽然已基本控制住了危机，但整个世界仍在疫情阴影的笼罩之下，这场疫情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难以估量。而在这场改变历史进程的灾难面前，这批志愿者的冒险逆行，这批“摆渡人”的生死去就，也将在我们民族的生命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将为我们这个历史悠久民族的凝聚力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开出一条希望之路。

当代大学生视角下的中国战“疫” 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殷丽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让所有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大学生们也不例外。笔者通过组织13个教学班进行主题为“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网络讨论和作业批改，真切地感受到当代大学生通过这次中国战“疫”，加深了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理解与认识，立志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体验疫情防控，深化了中华民族吸引力的理解。疫情初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为了这个“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基层干部和广大党员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面落实联防联

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力求各项责任落地；广大医护人员冲锋在前，留下“最美逆行者”的身影，他们昼夜无休，救死扶伤，迎难而上，坚守一线；无数的志愿者坚守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协助各基层组织进行核查、测体温、登记信息、卫生消杀、送防疫物资等；广大群众自觉遵守各项规定和要求，全民居家，自觉落实隔离要求；媒体充分发挥舆论的宣传作用，努力将最新的防疫资讯及时传达给全国人民；危难时刻，祖国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海外学子，克服困难，寄去健康包，使海外学子感受到来自祖国的关怀和温暖。

感受中国力量，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向心力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共中央启动一级响

应，各级政府立即行动，农村和社区几天立即封锁控制，商场和工厂立即停业，疫情扩散的渠道迅速被阻断；对于患者的救治，中央制定严密的治疗方案，将“集中收治”和“床位扩容”相结合，构建由“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构成的分级分类分流救治体系来区分轻重症患者；全国迅速聚集一切力量参与抗疫，企业生产线提前复工复产，不舍昼夜生产防疫物资、建设抗疫医院，仅仅十天时间，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座千余床位的医院便竣工。中国在自身防疫任务艰巨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援助，毫无保留地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分享防疫经验和研究成果，积极开展防疫合作。

参与社会实践，强化了对中华民族亲和力的意识。面对疫情，大学生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他们首先响应国家号召，做好基本的防护

工作，安心宅家读书学习。不信谣，不传谣，利用互联网实时了解疫情相关信息，关注国内外疫情动向，向身边人传播正确信息；积极参与社区或乡村服务，在家督促家人遵守防疫的相关规定，在外做防疫工作的志愿者，为防疫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结合自己的师范专业，参加学校组织的“牵手助学，共抗疫情”云教育志愿服务活动，为医护人员子女提供“一对一”的线上学业辅导与服务。

通过体验、感受和参与这场中国战“疫”，当代大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了中国国情，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中国精神，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表示要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到自身的成长过程之中，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中国战“疫”看中华民族的亲和力

刘娟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中华民族的亲和力，是中国赢得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成果的一大成因。透视年初以降中国战“疫”的大潮，中华民族确曾展示了蔚为大观的超强亲和力，而且，其极其生动和丰富的表现，也足以引发人们深化对中华民族亲和力的再认识。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由中华民族的吸引力、向心力和亲和力共同构成，其中的亲和力，最早被诠释为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亲和力量。诚然，这一诠释持之有据，言之有理，但是对照在战“疫”大潮中展现的亲和力，则显现出片面化和平面化的不足。实际上，在战疫大潮中展现的亲和力，不仅显现于各兄弟民族之间，凸显于各社会群体之中，而且更为生动鲜活地反映在各社会成员的具体行为之上。从逻辑上看，中华

民族亲和力的终极载体只能是个体的社会成员，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在“纵”的方面形成由高到低排列并且承载亲和力的社会各阶层，从“横”的方面呈现并且同样承载亲和力的众多社会群体。至于“纵”“横”的同通之处，则在于二者同属承载中华民族亲和力的主体，只不过是组合的形式不同而已。因此，笔者以为，与其将中华民族的亲和力诠释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亲和力量，莫如求本探源，将之概括为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量，如果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看，也可以视之为公民之间的亲和力量。

为说明问题，不妨从纵横两个方面约略解析武汉战疫中出现的两则故事。

1月27日，素以亲民作风见称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 亲临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 亲切看望和慰问不幸染疾的新冠肺炎患者、奋战在战役一线的医护人员, 以及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者等广大群众, 释放出令人暖心的亲和力。值得注意的是, 从中国社会阶层分析的视角看, 他所释放的亲和力是国家顶层的社会管理者, 亦即总理本人及其所代表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 向全社会释放的亲和力, 因而必然要引发社会各阶层强烈而积极的反响。因为, 民族国家的顶层管理者, 代表着最各阶层人民的根本利益, 居有引领各阶层亲和力发展的核心地位, 其所表达的“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亲民理念、实施的为新冠患者提供免费治疗等举措, 具有难以估量的感召力。因此, 在中国战疫的大潮中, 包括弱势群体和俗称的蓝领、粉领、白领、金领在内的社会各阶层, 均尽其所能地释放出了各自的亲和力, 以至于全社会出现了上

行下效、各阶层亲和力相互激荡、良性互动的局面。由此足见国家顶层社会管理者的亲和举措是何等的重要。

武汉快递小哥汪勇提供的则是抗疫志愿者的故事。他和他组织的团队着力为医务人员纾困解难的事迹, 可以从其“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和“全球青年抗疫榜样”两项荣誉中得到反映。透过汪勇的个案, 我们有必要注目全国各地无处不在的志愿者。他们或许对自身所处的阶层地位不甚了然, 却不能不明了自身所在的家庭、社区、行业、单位、组织、群体、民族乃至政党。他们何以能不约而同、殊途同归地在战疫大潮中贡献绵力, 展示爱心, 使受患者感受到暖暖的亲和力? 答案只有一个, 即以“和”为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使然。如是, 则可以断言,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和”文化, 是广大中华儿女释放和增强民族亲和力的动力源泉。

论中国特色的抗疫模式

黄红生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副主任)

最先提出“中国特色抗疫模式”, 应该追溯到世界卫生组织赴中国考察专家组负责人布鲁斯·艾尔沃德, 他于今年3月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 首先提出“中国抗疫模式可以复制”(人民网, 2020年3月7日)。考察抗击新冠疫情在内的新中国抗灾史, 可以发现, 防治吸血虫病时, 毛泽东最先提出“领导+专家+群众”中国模式, 他又在“鞍钢宪法”中, 提出诸如“两参一改三结合”, 成为中国特色的抗疫模式理论来源。

当今各国抗疫方式不尽相同, 大体有: (1) 领导+专家+群众三位一体中国模式; (2) 精准管理韩国模式; (3) 资源不足伊朗模式; (4) 群

体免疫英国模式等。

从主体视角审视中国抗击新冠疫情, 党中央采取果断的决策, 专家应用科学精准治疗, 全民参与联防联控……三者结合起来, 自然形成领导+专家+群众三位一体抗疫模式。

首先,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发挥抗疫组织效能的根本保证。遭遇新冠疫情, 习近平多次重要发表讲话, 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等思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就变成物质力量。从武汉封城、湖北决战到整合资源, 驰援湖北; 从全民免费治疗到医院应收尽收; 从搭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到组建方舱医院等等, 充分体现总书记的

英明领导，彰显“两个中心”思想的魅力和中国共产党快速应对危机的组织处理能力。不久，中国就取得抗疫的伟大胜利。

其次，专家精准施治是防治病毒的技术支撑。以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陈薇等大国医为代表医护专家团体，面对危险，逆风而动。钟院士亲赴武汉调研，金口直断“新冠病毒人传人”；张伯礼以中药配方，治疗大批病人；陈薇第一个启功疫苗项目，夺得先机；李兰娟、张文宏等众多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奋战一线，全面防疫，精准施治，谱写了新时代“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抗疫英雄赞歌。

最后，人民群众联防联控是防止病毒输入扩散的强大网络。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抗疫的强大力量。全民参与，联防联控，如同打开无数张网，让病毒无空可钻。一旦发生零星疫情，预防机制马上响应，对疑似病人核酸检测，对接触人员进行健康观察，对病例进行隔离治疗，把疫情控制在萌芽

状态。南沙建立“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综合指挥中心，运用“小网格、大服务、一支队伍管到底”，形成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综合防疫网络体系。佛山祖庙把支部建在小区，物业主任任支部副书记，确保党对抗疫工作的绝对领导。病毒无情，人民有情，组织群众，发挥群众智慧，能战胜一切危机……

根据新加坡 Blackbox Research 发布的“民众对政府抗疫满意度的调查报告，中国大陆民众对政府抗疫的满意度最高。”（人民日报，2020-5-8）人民满意具有强大凝聚力，有人学习，有人攻击，有人提出“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实际上，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拯救就蛰伏在抗疫经验借鉴之中，古罗马哲人塞涅卡说：“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同一棵树上的树叶，同一座花园里的花朵。”多一条中国特色的防疫经验，世界就少一份盲目，多拯救一条生命，这就是本文“文以载道”的初衷。

从疫情防控看中国力量的不竭来源

郭勇

（佛山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经过全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展现了强大的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来源于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调集全国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最大程度提高了检测率、治愈率，最大程度降低了感染率、病亡率，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与某些西方国家实行所谓“全民免疫”形成

强烈反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党心民心高度统一，这是中国力量最根本的奥秘所在。

中国力量来源于我国独特的制度优势。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党中央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迅速形成了抗击疫情强大合力，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再次震惊世界。与此同时，疫情还在一些国家大肆蔓延，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这次疫情防控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

治优势、制度优势，这是中国力量的制度保障。

中国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磅礴伟力。这次疫情防控是最接近“战时”的一次全民抗战。人民战争靠人民，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抗击疫情的号召，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发挥了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义无反顾、日夜奋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坚守岗位、日夜值守；广大志愿者等真诚奉献、不辞辛劳；广大企业捐款捐物，履行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在大战大考面前，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地与党和政府站在一起，这是中国力量的根本底色。

中国力量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积累的发展基础。疫情发生后，党中央明确举全国之力支援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迅速开设火神山、雷神山集中收治医院，以19个省份包市对口支援，组织29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330多支医疗队、416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在最短的时间以最有效的方式构建了全国一盘棋的防控格局。这考验的是我国人力组织、物资保障、科技攻关、军队调配、资源统筹的能力，是对综合国力的一次大考，背后作支撑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累积的发展基础，这是中国力量的物质基础。

中国力量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疫情防控中，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广为弘扬，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根本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涵养，这是中国力量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支撑。

党领导抗疫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启示初探

李文辉

(中共珠海市委党校副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次危机和大考，也是一场人民战争。经过艰苦奋战，我们夺取了武汉和湖北攻坚战以及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再次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证明了新时代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决定力量。笔者认为，其启示主要有：

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切实维护中央权威，显示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力。从这次疫情的始发、蔓延到防控、取胜，党

中央依据疫情发展态势，频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科学决策、动员、协调，及时从顶层决策到地方基层工作上部署全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等，体现了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和“主心骨”作用，也检验了十八大以来党内数次集中教育产生的“全党服从中央”的实际效果。

二是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积极发挥，实现了基层党员干部的执行力。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乡（镇）村（社区）等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干部越是艰险越向前，为党旗

添彩，为党徽增光，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安排具体落实到最基层，构筑起群防群治、共克时艰的严密防线。

三是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众志成城，展示了我们党的动员力。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人民解放军闻令而动，医务工作者一马当先，科研工作者昼夜攻关，人民群众全民皆兵，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4万多名来自全国的军地医务人员第一时间驰援武汉和湖北，全国数百万名医务人员默默奋战。火神山、雷神山速度惊异世人。至5月31日，全国参与抗疫的注册志愿者达到881万人。从1月24日到4月10日，来自广东26批医疗队、272家医院或机构共计2484人火速援鄂。还有，物资调配及时，市场供应充足，整个社会稳定，确保了抗疫斗争的胜利。

四是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治国理政成果与崇高威信赢得了亿万群众爱戴和拥护，

发挥了巨大感召力。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铁腕反腐，八项规定精神深得民心。三大攻坚战特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共建共享、基层治理日见变化，老百姓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截止5月31日，全国确诊住院患者结算人数5.8万人次，总医疗费用13.5亿元，确诊患者人均医疗费用约2.3万元，重诊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一些危重患者治疗费用则更多，全部由国家承担。而且，充分发挥舆论工具的宣传引领作用，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疫情防控工作，展示了良好大国风范，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些都为困难时期发挥党的感召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当前我们应强化忧患意识，加强危机教育，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维护人民健康。应更加坚定不移地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统一领导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同心同德，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

疫情防控与集体主义精神的升华

王增益

（中共东莞市委党校讲师）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突袭神州大地，在抗疫过程中，全体中国人经受了一场精神洗礼，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在不断的挑战中重构，以集体主义为底色的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得到升华，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打下了坚实支撑。

集体主义即是一种思维模式，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改革开放后，在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冲击下，中国

人对集体主义的理解和认同有不断弱化的趋势，而这次全民抗击新冠疫情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个趋势，并且集体主义在新时代得到升华。

一是新冠疫情让人直观地感受到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同构关系。面对新冠病毒，个人行为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抗疫形势；同时，整个国家的抗疫措施和成效则直接影响个人的健康和生活。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同构关系再清晰不过地展示在人们面

前,彰显了国家、民族、社会不是“虚幻的共同体”,而是现实的命运共同体。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自然被消解了,人们可以在许许多多其他方面轻易发现个人和集体利益的同构关系,从而为集体主义在新时代生根发芽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二是国人通过亲身参与抗疫体验了新的人生价值实现方式。“家国天下”的情怀和价值实现方式作为集体主义精神的核心,以往被普通人看成一种遥不可及的道德圣地。在抗疫过程中,几乎所有中国人都通过各种方式亲身参与,不论是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一线工作者和志愿者,还是在家里遵守防疫要求的普通人都为抗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们自然感受到,不仅仅名人可以“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普通人也可以通过点滴的小事为国家做贡献,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其带来的人生体验超越了个人利益追求的满足,升华了人生境界。“家国天下”的情怀和价值实现方式

成为一种触手可及的人生状态和生活方式,扎根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底。

三是通过中西比较确立了民族自信。中国进入近代史以来遭受的苦难和挫折曾经让一代代中国人丧失自信、过度自我批判,甚至导致“逆向民族主义”盛行。新冠疫情也是一场灾难,但这次中国人迎难而上,团结、奋斗、相互关爱,展现了中国力量,在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考验中,凸显了以集体主义为基础构建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的显著优势。通过不同国家抗疫过程和结果的比较,人们切实感受到集体主义的优势,打破了对西方盲目的崇拜与迷信。亲历这场抗疫,许多人发出“幸而生为华夏人”的感慨,进一步树立了“四个自信”和民族自信。

集体主义精神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得到了升华,一个自信的民族已经凝聚在一起,做好了引领人类走入新时代的准备。

弘扬战役精神 提升国家凝聚力

车孟杰

(佛山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2020年冬春之交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牵动着全球中华儿女的心。面对这场突如其来、来势汹汹的疫情,中华民族齐心协力,在残酷的抗击病毒、防控疫情中凝聚起磅礴力量,形成了伟大的战役精神。

科学认识战役精神的理论内涵:展现新时代的中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许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这其中,是中国精神在起着强大的支撑作用。而战役精神就是中国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展现,它产生于这场中华民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实践中。战役精神内蕴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中,真实反映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同时,它还承接与延续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形成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

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宝贵品质。因此，战役精神是一个在新时代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概念，它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政治素养为核心品质，体现为求真务实、尊重科学的创造精神，自强不息、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众志成城、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坚定信心、积极向上的梦想精神。

深刻领会战役精神的价值意蕴：彰显中国之治的优势

这次战役斗争过程中形成的战役精神，已经熔铸于中国之治当中，充分彰显了我国“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显著优势，发挥出凝聚人心共抗危机的强大合力。自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沉着应对，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果断决策，科学有效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尽职尽责，自发地加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全国动员、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铸就起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强大精神防线，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大战略成果，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因此，彰显中国之治优势的战役精神，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为提升我国国家凝聚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积极发挥战役精神的聚合力量：提升国家凝聚力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但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仍不乐观，因而我们还未到大获全胜的时刻，依然需要继续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弘扬战役精神，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抗击病毒、防控疫情的共同意志。一方面，在国内用好战役斗争这本生动“教材”，宣传好战役精神，增强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构筑中国道路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向国外讲好中国战役故事，让世界更深入了解中国战疫精神，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充实中国方案的话语体系。总之，我们必须积极发挥好战疫精神的强大聚合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国家凝聚力，为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提供硬核精神支撑。

疫情防控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赵为洪

（广东岭南美术学校教师）

一、疫情防控下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思考

疫情防控对人类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仍在继续推进，需要各界共同努力来解

决疫情给人类生命安全造成的威胁。对疫情防控下各行业的工作开展状况进行思考，不难看出人们都积极参与到行业的复苏发展中，也贡献自己的力量和疫情做斗争。无论是专攻疫情难题的专家，还是在城市道路中穿梭的快递人员，他们都对疫情

防控做出贡献，也在自己的岗位中体现出自己的爱国情怀和奋斗意识。中国共产党在疫情中的领导原则和正确引导，中华儿女在疫情阻击战中的各种表现都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魅力，也实现民族精神的升华。

二、疫情防控下民族精神升华的体现

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基本上阻断了新冠疫情的本土传播，可以说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整体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实现快速恢复。人民利益至上是一个老原则，共产党员在各项事业中牢记初心就是为了人民谋取更多的福利，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一个具体的工作原则，是在任何时候或者是任何条件必须坚持的。如果不能采取科学的措施那么就会导致疫情出现蔓延的现象，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或者是身体健康会受到严重地威胁，党中央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选择，宁可让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失，也需要坚持人民生命安全为首位^[1]。在具体疫情防控期间，老年群体由于体制和基础性疾病的影响成为易感群体，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医护救治那么则容易出现生命危险，但是经过医护人员全力救治，诸多高龄重症患者也实现临床康复。这次疫情阻击战体现出党中央人民利益至上的工作原则，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人身安全放在疫情阻击战的重要位置，在携手互助基础上解决疫情给国家发展和公民生命安全造成的威胁，更好展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三、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需要得到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持

通过对中国民族发展历史进行分析得知中华儿女有着独特的价值追求，不惧各项挑战或者是危险，在凝聚各族群众力量的基础上推动中国梦的实现。可以说中华儿女用自身的能力与奉献书写了保卫国家、积极参与祖国建设与积极抵抗灾难等壮丽史诗，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效体现。要想打赢疫情防控战争的胜利则应该做出多个方面的努力，更应该得到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效支持，在民族团结努力奋斗基础上做好疫情的防控工作。

历史表明在应对重大风险和挑战的过程中需要得到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持，最终是精神耐力上的一种比拼，只有具备奋斗不息和勇于挑战自我精神才可以获得最终的成功，在中华儿女努力拼搏和顽强奋进等精神品质支持下逐渐解决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无论是精卫填海等古代神话的探索，还是诸多箴言警句的运用都展现出中华儿女努力奋斗和执着发展的精神认知，只有具备坚韧的品格意志和勇于挑战等优秀思想认知才能应对疫情防控提出的各项挑战，也能推动中华民族的稳定发展。所以在后续和疫情进行斗争过程中应该关注到民族精神的升华，坚持不麻痹+思想不松动+努力拼搏的精神认知格局，这样可以让民族发展更加具备生命活动。

参考文献：

- [1] 鲁品越.中国新型制度文明在疫情防控中锤炼与升华[J].学术界, 2020, 22(02):27-34.

【责任编辑：谭建军】

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 的生成逻辑

曾丹凤

(肇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具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在文化传承上,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哲学思想和“家国同构”政治理念的传承;在理论逻辑上,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战略思想和重要策略原则的延展;在历史逻辑上,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重视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吸取;在实践逻辑上,是解决现实问题、开拓统战工作新局面的需要。剖析这一重要思想的内在生成逻辑,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其内涵,抓好工作落实。

关键词: 习近平总书记;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生成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35-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直面统一战线工作(以下简称“统战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策略新原则,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吸取了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回应了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的文化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对这一思想的生成逻辑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全面抓好贯彻落实。

一、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1],包括“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家国一体”的政治理念以及法家的法治思想和观念,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式,也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统

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和有益的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传承中赋予了新的时代涵义。

(一)统战工作的“求同存异”原则:“和而不同”哲学思想的传承

“非一则不能成两,非两则不能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做好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其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2]“同”是指“共同的政治基础”,强调的是“一体”和“一致性”,“异”是指“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强调的是“多元”和“多样性”,“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同”与“异”“一体”和“多元”的统一,讲和谐胜于讲对立,重“和”而不强求“同”,涵养着涵容异质、兼容并包的思想品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哲学思想的认同和传承。

“和而不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对“和”与“同”的关系就有深刻的理解。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国公曰:“和与同乎?”上大夫晏子曰:“异”,他

收稿日期:2020-03-10

基金项目:本文为 2020 年度肇庆学院统战理论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研究”(TZ202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丹凤(1982—),女,广东梅州人,肇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以美食为例来解释，曰：“和如羹焉”，例如鱼肉，添加了“水、火、醢、醢、盐、梅”等不同蘸料，“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才成为爽口平心的美食。他继而曰：“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如果“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同样地，如果“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最后他强调，“同之不可也如是。”可见，单一的要素无所谓“和”，要素的聚合或相加是“同”，不同要素间相互支撑、相互协调、互济互补、相生相长的和谐状态才是“和”。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中国有十四亿人，但不同地方、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凝聚共识的难度加大，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故而，“要考虑哪些是可以‘求同’的？哪些是可以继续‘存异’的？哪些是可以经过做工作形成或转化为共识的？”^[3]既要“求同存异”，也要“聚同化异”，处理好“一”和“多”、“同”和“异”的关系，达到和谐状态。

（二）统战工作的同心圆论：“家国一体”政治理念的传承

为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同心圆论”。“同心圆”虽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个数学概念，但在结构模式上，与中国传统社会基于血缘和亲情的“家国一体”政治结构相通，与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同心圆论”的文化基因。

《孟子·离娄上》中的“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记载了古代中国人对家国一体关系的普遍性认识和文化认同。孟子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从家庭伦理角度把家与国融为一体。《礼记·大学》中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把家国一体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政治理念和修身齐家的价值理念，“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彰显了家国一体的情怀，进而孕育出“仁心孝悌、忠信礼义、爱国爱家”、“忠孝一体”的价值观念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形成中华民族崇尚爱国主义和家国大义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把这一优良传统发展演变

为统战工作的“圆心论”。

这一理论有三层涵义，一是画出统一战线必须固守的圆心，也即统战成员同心所向、并肩所望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决不能触碰和动摇的政治底线；二是画出同一圆心的不同半径，体现对多样性的尊重和包容，即除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外的其他各种多样性，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寻找最大公约数，兼顾和融通各方利益；三是尽可能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也即守住政治底线这一圆心，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汇聚的力量就越强大。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延展

马克思主义常学常新、常用常新。“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策略和战略问题”^[4]，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战略和策略原则的思想，坚持并发展之。

（一）统战工作的本质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战略思想的延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思考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地位问题时，援引毛泽东的话，提出了统战工作本质论。在微观上，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地位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在宏观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略战略思想的深化和延展。

统一战线也称“联合战线”，英文“United Front”，起初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对抗“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而提出的一种战略思想，并通过“同盟”“联盟”“团结”“联合”等词汇来表达。在马克思看来，到1847年年底，欧洲已经“存在着一种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各民族的联合和兄弟联盟”已经成为一切派别、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一句口头禅，而且是用来反对和围剿革命无产阶级的。^[5]对此，恩格斯指出，具有共同利益的各国工人也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战斗”，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6]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

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建立联合阵线的战略思想，认为不仅要联合“全世界无产者”，而且要“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协调”^[7]，甚至还要依靠、争取和团结一切已经革命化的中间阶级和小资产者，将他们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组成“各种不同利益的联合”^[8]。

列宁和斯大林提出并直接使用“统一战线”后，毛泽东赋予统一战线法宝地位，认为“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把敌人搞得少少”，强调“统战工作是最大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强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目标就是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在治国理政中处于战略地位，是“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9]

（二）统战工作的策略原则：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重要策略原则的延展

“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10]，它服从、并服务于战略。为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推动大团结大联合、实现凝心聚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策略原则，明确新形势下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主要方式和内容以及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方式和内容，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重要策略原则。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各阶级和党派必须有一致的或共同的利益才能真正联合起来，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以鲜明的阶级立场、革命的性质和宗旨、坚决的斗争精神以及斗争的策略原则形成了对无产阶级自身及其他阶级和党派的聚合、吸引力和领导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是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并“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在实践中，他们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他们对反对党派的态度是既联合又斗争。^[11]马克思在总结革命经验时还指出，在革命进程中，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整个中间阶级会逐渐向无产阶级靠拢，连各

种色彩的改良之友以及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也“团结在最极端的主张变革的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12]

列宁和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列宁提出既要利用敌人之间的“裂痕”和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矛盾来战胜更强大的敌人，也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毛泽东不仅确立了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还明确要坚持党的独立性、争取领导权，同时制定了统战工作的具体策略和原则，即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时，必须“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13]，解决国内矛盾时，“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14]，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巩固势力”的政治路线。^[15]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正确把握原则性和灵活性，对以上重要策略原则作了深化和拓展。概而言之，就是以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为根本，以巩固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为前提，以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的利益为职责，灵活运用政策法规，创新方式方法，联谊交友，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

三、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历史经验的吸取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好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并发扬这一好传统，总结和吸取党的统战工作历史经验，推动理论创新。

（一）统战工作制度效能论：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的经验吸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包含两个主要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新时期，为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把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划分为大陆内和大陆外两个不同范围的联

盟,大陆内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政治联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基础发展协商民主,以爱国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大陆外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以“一国两制”为基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两个制度的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1949年以来党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的经验吸取。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利治利国利民的政党制度。这项制度创造了合作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模式、创立了执政与参政相结合的政权运作方式、创建了和谐的政党关系、创新了民主的实现形式,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由于这项政党制度自身具有的特殊结构和功能,在七十余年的实践中充分展现了它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上的独特优势,成为我国政局格局稳定的重要制保证,制度效能得以充分显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新形势下要搞好多党合作,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提升、更好地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

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成功解决港澳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港澳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这一制度的优势和效能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展现。面对近年来港澳,尤其是香港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制度自信,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16],具体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17]。2020年6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保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的重大举措,使“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和效能得以继续保持并增强。

(二) 统战工作重点论: 中国共产党重视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吸取

历史证明,统战工作的战略重点一般会随着统一战线主要解决的问题而转移。例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主要解决的是资产阶级问题,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统一战线主要是处理三个区域和四类不同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问题,即解放区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海外归国的爱国知识分子以及国统区的国民党或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以及自由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团结和争取国统区的两类知识分子。^[1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并坚持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由此也确立了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夺取胜利的一条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吸取这一历史经验,把党外广大知识分子问题视为新时期统战工作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继2013年提出对广大知识分子“要加强政治引导和政治吸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又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要重点做好“新三种人”的工作,即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留学人员和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这其中的代表人士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规定的重点对象。^[19]

四、实践逻辑: 解决现实问题、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的迫切需要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期,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20]。当前,统一战线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统战工作总体上能够有力开展,但也存在两个事关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部分同志对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的轻视或忽视。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这主要是由思想认识上的三个未解之“结”造成的。一是力量

之“结”，有的同志对党外人士的力量认识不足，认为他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忽视或轻视他们；二是麻烦之“结”，有的同志对党外人士的作用认识不足，认为他们是“一支比较麻烦的力量”，怕“麻烦”、嫌“麻烦”；三是异己之“结”，有的同志对党外人士的性质认识不足，至今没有摘下有色眼镜，认为他们是“一支消极甚至异己的力量”。^[21]第二个问题是部分同志不会做统战工作，原因在于不会领导、不懂政策、不讲方法。^[22]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23]。上述提到的关于统战工作的求同存异原则、同心圆论、本质论、制度效能论、工作重点论等等，都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是新形势下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的理论指引。

参考文献：

- [1]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这样为传统文化“代言” [OL/EB].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29/c_1121054808.htm.
- [2][9][19][21][2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561-562，556，540，557-559，560-561.

- [3]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1-32.
- [4] 中共中央统战部等. 中国统一战线教程[Z].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
- [5][6][7][8][11][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3，315-316，435，530，413，530-531.
- [10] 斯大林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48.
- [13][1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525，261.
- [15]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58.
-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21.
- [17]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9-11-06（01）.
- [18][20] 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讲座[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87-88,5.
- [2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2）.

【责任编辑：余伟】

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文献综述 ——基于 NVivo12 的关键词分析

张林鸿, 廖富超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 贵阳 551400)

摘要: 为进一步加深对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 本文以 NVivo12 质性分析软件为分析工具, 运用关键词词频分析方法对 2014—2020 年 5 月国内有关研究期刊文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 现有文献研究了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 8 个方面的问题或挑战, 提出了 9 个方面的功能角色定位, 总结了 11 个方面的功能优势或作用, 给出了 6 个方面对策建议。文章最后对既有研究进行扼要评价, 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 统一战线; 国家治理; 关键词分析; 词频分析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40-07

一、研究背景

统一战线强大而独特的聚力凝心、协调沟通、发展民主、科学决策、创造环境、民主监督等优势或功能, 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汇聚集体智慧、凝聚广泛共识、整合多方利益、协调社会关系、汇聚磅礴力量, 在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有必要对国内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梳理, 以更好认识和把握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存在问题、角色定位、功能优势以及完善建议, 继续为国家治理的能力提升和理论推进提供借鉴、服务和支持。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关键词词频分析方法对国内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关期刊文献进行研

究。通过统计研究文献内容的核心词汇在文献中出现的频次, 以此研判该学术研究主题的热点、历程、知识图谱以及发展趋势^[1]。截至 2020 年 6 月 11 日, 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高级检索中确定“主题”为检索条件, 输入“统一战线”和“国家治理”(逻辑关系设置为并且), 选择全部期刊, 不限制收集年限条件, 共检索出 267 篇文献。为获取重要文献和剔除无关文献, 以被引情况对 267 篇文献进行降序排序, 通过阅读文献的标题和摘要, 将明显与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献逐一排除, 再研读文献的全部内容, 最终选取了 34 篇研究内容紧密涉及研究主题的期刊文献, 文献数量分布情况见图 1。运用 NVivo12 质性分析软件(以下简称“软件”)将 34 篇文献的文本内容根据存在的问题或挑战、角色定位、功能优势和对策建议四个逻辑维度进行节点建立和关键词语词摘记, 尽量保持原始文献的表述方式、措辞, 最终形成了存在问题、角色定位、功能优势和对策建议 4 个开放节点(34 个子节点)和 1448 个参考点。

收稿日期: 2020-06-21

基金项目: 2020 年度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联合课题)《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编号: GZLCLH-2020-023);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贵州省高校统战工作研究》(编号: 2020GH001);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创新研究》(编号 2019szyjzx01)。

作者简介: 张林鸿(1972—), 男, 教授、法学博士,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廖富超(1990—), 男, 贵州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

治制度结合以及参政党自身建设等体制机制不完善甚至存在空白。

制度执行方面问题主要有：（1）统战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2）高校统战工作难度加大。（3）以管控为主，习惯于既成经验，老办法多、新办法少，依法办事能力不足，偏重于结果上的一致，偏重于做上层对象上工作，对基层统战工作重视度不够；不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系统的统战；不重视互联网新兴手段的运用；较少进行依法争取人心的谋划；面临“上热中温下冷”、敷衍了事、作风不实等问题。（5）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对其组织的认同归属感不强，履职积极性不高。

挑战因素方面问题主要有：（1）面临利益分化、矛盾化、复杂化、多元化问题，不同利益主体间矛盾多发，新时代社会稳定和社会治理压力增大。（2）社会多元思想日益加深，阶层分化，社会结构高度流动；多元化思想形成，利益诉求更加彰显自我；一些人借助互联网大肆宣传西方文化思想、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价值造成严重冲击和侵蚀；高校统战工作面临思想独立、多元、复杂等问题；新社会阶层不断出现，价值主体和利益主体群体数字化集结趋势加强。（3）面临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世界突发事件等外部环境挑战，及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博弈。

认识方面问题主要有：（1）强制性、单一性的政府管理思维明显；未在统一战线作为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形态的高度充分审视凝聚共识的重要功能，“过时论”“麻烦论”“危险论”“无相关论”“被动论”等错误认识仍然存在；缺乏对统战国家行为层面的意蕴认识。（2）部分基层党组织或政府对民主党派政治属性认识不到位（将民主党派当作群团，把党派机关当作部门），社会对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先富群体存在偏见和质疑。（3）不重视制度建设，对互联网新兴手段不够重视、不熟悉甚至不会用。（4）统战智库功能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

功能发挥方面问题主要有：统战优势及功能未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未全面体现，其实效与功能定位仍有较大差距。

学术研究方面问题主要有：（1）目前统一战线在中国政治学学科化建构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2）较多研究多是对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功能、路径的表面层次，未深入到统战性质下的宪政高度和要求；对统战制度定位的阐释视野相对狭窄；对统一战线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缺乏具体、系统的梳理，对统一战线制度的发展对策缺乏足够关注。（3）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还较少。

资金使用方面问题主要有：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中，如统战智库建设并未充分利用资金财力资源优势，一些发展资金无从落实。

人才建设方面问题主要有：部分统战成员政治性不足，部分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同化现象较为突出；统战成员素质高低不一，参政、社会意识和态度观念差异大，分歧常有，活力不足；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法律、自律、诚信等方面的意识还需要加强。

2. 角色定位归类

运用软件对“角色定位”节点（含29篇文献和150个参考点）文本内容进行词频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角色定位节点词频

单词	计数	加权百分比(%)
体系	49	8.25
组成部分	31	5.22
制度	22	3.70
机制	20	3.37
主体	18	3.03
政治	18	3.03
能力	15	2.53
实践	12	2.02
方式	12	2.02
力量	10	1.68

从表3可知，现有研究文献对于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角色定位方面主要有组成部分、体制机制、主体力量等观点，其中组成部分和体制机制的角色定位观点和认识已为多数学者达成共识。对“角色定位”所有参考点再进行开放式编码归类，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角色定位主要类型如表4所示：

表4: 角色定位具体类型

具体类型	涉及文献数量(篇)	参考点
组成部分说	16	49
体制机制说	13	27
实践方式说	13	23
复合角色说	7	15
主体力量说	7	13
智囊团(智库)说	4	7
重要法宝说	6	7
理念源泉说	3	6
平台说	1	1

组成部分说认为: 统一战线不仅是我国民主政治、党和国家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 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制度框架, 具有重要策略作用和国家治理意蕴, 促进国家治理更加民主、规范、科学。

体制机制说认为: 统一战线作为一种独特的国家治理机制, 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动员机制、组织机制、沟通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协调机制、核心导引机制及主体培育机制等多层次的保障机制, 有效提升国家各项基本治理能力。

实践方式说认为: 统一战线是我国国家治理所特有的实践方式, 不仅体现为战略策略, 更是国家治理的实践, 是推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独特而有效的实践方式和路径。

复合角色说认为: 统一战线在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复合角色, 全面涵盖了国家治理和建设五位一体布局的主体, 融入于国家治理格局之中, 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制度重要依托, 体现了民主之治、共识之治、制度之治, 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 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要条件。

主体力量说认为: 统一战线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力量, 发挥着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凝心聚力的功能, 存储着服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巨大能量。

智囊团(智库)说认为: 统一战线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智囊团(智库), 为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聚才汇智, 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政治智慧和举措。

重要法宝说认为: 统一战线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法宝, 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的作用, 以更好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理念源泉说认为: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积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理念, 体现了一种具有求同存异包容思维理念以及国家治理理念。

平台说认为: 统一战线是推进和服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平台, 将各方力量凝聚于国家治理、建设和发展, 为国家治理提供沟通协调、反映民意、能量交换的重要渠道及有效平台载体。

3. 功能优势归纳

运用软件对“功能优势”节点(含33篇文献和632个参考点)文本内容进行词频分析, 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功能优势节点词频

单词	计数	加权百分比(%)
政治	116	2.80
优势	110	2.65
力量	94	2.27
凝聚	80	1.93
关系	74	1.78
决策	66	1.59
共识	61	1.47
制度	55	1.33
联系	42	1.01
和谐	39	0.94

从表5可知, 现有研究文献提及了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凝心聚力、沟通协调、经济治理等11个方面的功能优势。对“功能优势”所有参考点再进行开放式编码归类, 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功能优势主要类型和主要文献情况如表6所示。

凝心聚力功能包括: (1) 统一战线将各方面的智慧与力量凝聚在一起, 使各种力量归位、发挥优势, 调动积极性, 焕发、增强党和国家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调动、团结更多更广泛的人民、市场及社会等多方力量, 形成强大的思想共识, 提升国家治理效能。(2) 统一战线包容多样, 引领成员致力于实现总目标, 汇聚起服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磅礴之力。(3) 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群英荟萃, 有

表6: 功能优势具体类型

具体类型	涉及文献数量(篇)	参考点
凝心聚力	31	211
沟通协调	28	154
发展民主	24	95
独特优势	13	43
科学决策	15	35
创造环境	13	25
民主监督	11	21
文化治理	11	21
经济治理	10	21
服务外交	3	5
生态建设	1	1

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人才资源优势,在凝聚智慧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和渠道,为国家治理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政治支持和智力支撑。

沟通协调功能包括:(1)统一战线维护、团结、协调“五大关系”,积极化解矛盾,减少国家治理阻力,实现国家治理治理能力和谐化、民主化、现代化。(2)统一战线广泛联合各成员,协商国策,传达诉求,反映社情民意;有效协调社会关系,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维护政治、社会稳定;广泛联系、下情上达,扩大共识、增进和谐,促进国家治理民主化、科学化。

发展民主功能包括:(1)统一战线促使民主协商、参政议政的形式和途径更广泛、更有序,厚植国家治理民主优势。(2)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治理的广度、深度得到全面拓展,积极融入国家治理。

独特优势包括:(1)统一战线制度植根于我国土壤,是适合我国实际的一好制度。(2)统一战线具有主体超脱、理念、方法、功能、区位及领域等独特优势。

科学决策功能包括:统一战线对政策、措施、决策提出修改或完善建议,推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实现国家治理决策、政策的形成、完善、引导。

创造环境功能包括:(1)统一战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维护政治稳定,为国家治理提供和谐稳定的政治环境。(2)统一战线促进沟通协调、广泛联系、和谐社会关系,增进社会活力,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民主监督功能包括:统一战线发展民主协商,加强民主监督,优化国家治理权力配置,完善权力约束机制,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有效预防和遏制贪腐,助力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监督体系,打牢“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中国民主监督制度的基础,提升国家治理民主监督能力。

文化治理功能包括:统一战线全面参与文化治理,实现价值引领,广泛凝聚各领域(党派、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识,夯实文化最大公约数基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治理的有效性,塑造文明、民主、和谐的国家形象。

经济治理功能包括:统一战线全面服务于服务国家经济治理和建设,为经济发展开展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实现政策对接、项目对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增强自主创新,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引进外资和技术,为新常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量和智慧。

服务外交功能包括: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是人民外交的重要实践形式、桥梁和渠道,具有联系海内外的主体超脱优势和对外联系优势,大大增进了理解、支持、合作和友谊。

生态建设功能包括:统一战线参与国家生态建设和治理,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发展、取得新成绩、迈上新台阶。

4. 对策建议梳理

运用软件对“对策建议”节点(含29篇文献和535个参考点)文本内容进行词频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对策建议节点词频

单词	计数	加权百分比(%)
工作	163	3.41
制度	79	1.65
能力	76	1.59
机制	73	1.53
政治	60	1.26
体系	56	1.17
组织	44	0.92
关系	42	0.88
服务	42	0.88
提高	39	0.82

从表 7 可知, 现有研究文献主要从工作方式方法、制度机制建设、深化认识等 6 个方面对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对策建议, 其中工作方法的完善建议为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对“对策建议”所有参考点再进行开放式编码归类, 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策建议主要类型如表 8 所示:

表 8: 对策建议具体类型

具体类型	涉及文献数量(篇)	参考点
工作方法	25	245
制度建设	23	103
深化认识	22	97
党的领导	16	47
能力建设	11	38
学术研究	3	5

工作方法方面的对策建议有: (1) 实施平台战略, 为统一战线搭建适应新时代的联系平台、协调平台、统战论坛。(2) 坚持精准统战, 做到动态识别、团结统战成员, 推进统战信息公开, 把握、实现治理型统战方向和目标。(3) 注重充分发挥统战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独特优势和功能, 全面提升国家治理的实效。(4) 创新统战在培育国家治理主体、凝心聚力、引领思想、协调关系、调处矛盾、智库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方式方法, 坚持新型统战模式, 转变工作作风, 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5) 重点加强“五大关系”以及政商关系、同胞关系、非公制企业劳资关系、文化领域、高校领域、生态领域等领域或关系的统战工作。(6) 全面实施执政党与参政党双向监督机制, 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角度、尺度、深度和广度。(7) 转变居高临下的工作作风和态度, 运用如平等相待、共商国是等体现我国传统文化方式坚持情感统战, 依法依规联谊联络联情, 做到尊重、引导、团结和关心人。

制度建设方面的对策建议有: (1) 加强顶层设计, 重视领导体制和互动机制建设, 完善统战服务国家治理的社会多元共治体系, 将统战服务国家治理依法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提高统战服务国家治理的制度化、体系化、程序化、法治化水平。

(2) 提升统一战线规范的法律位阶, 加强双向监督机制立法、执行, 推动统一战线相关法律法规系

统化、科学化。(3) 建立健全适应高度流动的统一战线走访机制、帮扶机制、网络机制、联谊交友机制、互信互助机制、“同心”工程服务机制等体制机制, 重点建立健全利益表达、矛盾调处、利益保障、社会协同机制, 形成一套符合国情、富有活力的协商制度。(4) 健全调查研究、建言献策、教育引导、社区统战、联系和服务群众、新型智库协商互动、新型智库资金捐赠、共识教育培训、参与治理激励等统战服务国家治理的具体工作体制机制。

深化认识方面的对策建议有: (1) 要用全局观念和政治眼光审视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和战略意义, 继续推动从统战立国到统战治国、从协商立国到协商治国、从实践优势到话语优势转变, 深刻认识和广泛发挥统一战线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战略功能。(2) 强化树立大团结、大联合的大统战意识, 进一步树立参政为民、重视实效、共治、法治的理念和思维, 关注、加强和改进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重视并研究某些宗教的“异化”新问题, 警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以“四个自信”的勇气主动参与国家治理。

党的领导方面的对策建议有: 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根本前提, 是统一战线作用发挥的先决条件, 是保证多中心治理活力和效率的根本所在。在推进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 坚定“四个自信”, 正确把握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确保统一战线在我国制度框架内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参与和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

能力建设方面的对策建议有: 加大统战人才保障, 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 加强新型统战智库建设, 坚持落实“有意识地把一些优秀人才留在党外”的原则, 更加注重选拔党外人士的人才。加强和创新组织学习培训, 提高统一战线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水平, 提高政治把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关系协调、利益调处、群众工作、合作共事等方面能力, 提升党各级统战部的履职能力。

学术研究方面的对策建议有: 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统一战线学, 构建反映中国政治这一重要实践的理论、学科和话语体系, 着力推进统一战线话语制

度的构建。学术研究要从实践、政策层面向学理阐释层面转变,重点研究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新常态的总体格局。

四、评价与建议

现有文献对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体现在对存在问题、角色定位、功能优势和对策建议,并采用了思辨分析、个案研究、实证调研等研究方法。但是,过往研究仍有不足:

一是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现有文献多采用思辨式理论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偏少,在实证研究中运用如质性研究的科学规范方法更少,因此许多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主题内容的文献“相似度”较高,看上去都小异大同,只是在表述上存在细微区别。

二是部分研究结论空洞泛化。比如有些文献基于我国宪政制度,空洞重申、提出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则和对策,其针对性和操作性并不强。又如,部分研究结论不符事实,有学者认为相关研究尚未充分重视统一战线的凝聚共识价值,实际上对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价值早已有多位学者从2014年起就进行了大量研究。

三是部分研究内容不够深入。从过往国内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对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责任机制的研究很少涉及;对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色定位和存在问题研究相对较少;一些文献对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策建议的研究停留在肤浅层面,如一些制度建设的对策中(建立健全利益表达、矛盾协调、互信互助、凝聚共识、参与治理的激励等的体制机制),以及完善法规政策方面,仅提出需要建立健全,但具体细节(如完善哪些内容、责任主体、如何完善等)和具体程序并未提及;学者对统一战线智库功能研究上没有足够的重视和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量少质不优^[2];一些研究对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色定位阐释视角相对狭窄,没有立足于治国理政的大背景和中国方案的大视野中去考察,对统一战线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和

发展对策缺乏全面梳理和足够关注^[3];过往研究存在路径依赖,多基于治理路径和功能视角研究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其研究角度和高度并未深入到统一战线性质的我国宪政体制^[4];统一战线处于我国政治学学科的边缘地位^[5]。因此,过往文献在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部分研究内容不够深入。

未来对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需要实现从研究的量不断积累过渡到研究质的转变,丰富和规范研究方法,注重实证研究,保证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入性。针对过往文献多采用理论思辨研究方法少使用进行实证研究方法问题,相关规范研究成果较少,未来可以对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实证研究,尤其是扩大在相关统计数据、调查样本、案例方面的基础资料的占有,使得相关对策建议和研究结论有更强的针对性、操作性、代表性和推广性,更加注重统一战线学科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必须指出的是,纯质性分析和量化分析都存在研究方法本身难以克服的不足,因此需要注重有效结合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方法,确保两种方法在研究中逻辑自洽、相互印证,才能对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才能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严谨。

参考文献

- [1] 张勤. 词频分析法在学科发展动态研究中的应用综述[J]. 图书情报知识, 2011(02):95-128.
- [2] 钱再见.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一战线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v.19;No.86(03):16-22.
- [3] 林华山,罗振建. 统一战线制度:一项立国治国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安排[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39(02):20-30.
- [4] 罗振建,林华山. 改革开放40年统一战线参加国家治理的成就、经验、启示[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02):33-40.
- [5] 《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新中国70年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研讨会综述[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04):110-112.

【责任编辑:余伟】

新时代宋庆龄事业的传承与创新探讨

谢德阶

(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 广东 广州 510080)

摘要: 本文通过探讨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坚定信念的时代意义和宋庆龄事业的时代作用, 探索新时代宋庆龄事业创新发展的方向路径, 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如何更好的弘扬宋庆龄精神、讲好宋庆龄故事、传播好宋庆龄声音; 更好的发挥宋庆龄的崇高声誉优势, 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 服务党和国家建设大局; 更好的继承宋庆龄伟大精神财富, 开拓宋庆龄事业发展新局面,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新时代; 宋庆龄事业; 传承; 创新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47-04

2018 年 6 月, 在宋庆龄先生创办的中国福利会成立 80 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祝贺, 对宋庆龄事业传承者秉持“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 为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为促进祖国统一事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的贡献, 给予了高度肯定, 并寄予了殷切期望, 充分体现了对宋庆龄事业传承者的关心、关怀和激励。

宋庆龄先生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为妇女儿童的健康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 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虑, 鞠躬尽瘁,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敬仰和爱戴, 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 并享有崇高的威望。

为了继承和发扬宋庆龄先生未竟事业, 2007 年 2 月, 经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胡启立倡导, 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挂牌成立。经过 12 年的成长, 省宋基会成为拓展粤港澳台民间外交的重要平台、推动两岸四地民间交往的桥梁纽带、发展少年儿童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们弘扬宋庆龄精神, 传承宋庆龄未竟事业, 要有新气象, 新作为, 新思考。

一、当好宋庆龄先生“永远和党在一起”坚定信念的践行者, 引领广大群众听党话、

跟党走

宋庆龄作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始终秉持“永远和中国共产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 她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与孙中山先生毕生努力的“振兴中华”目标是一致的, 她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宋庆龄一生追随共产党, 愿意并积极主动地为党和人民战斗、工作、敬业、奉献, 其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毛泽东同志曾在党内说过: “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向宋庆龄同志学习, 学习她的革命坚定性。”

1. 见贤思齐, 筑牢信念之魂。早在 1937 年, 宋庆龄在上海接触到地下党组织, 就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在“四·一二政变”等革命形势最危急的关头, 宋庆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1950 年 3 月, 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 谈到她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与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 同时也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1952 年 10 月, 宋庆龄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坦率地谈到了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1957 年, 宋庆龄在上海当面向刘少奇提出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宋庆龄的特殊身份, 党中央认为她留在党外的意义更大, 但她矢志

不移，临终前终于实现夙愿，圆了自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梦。这种不抛弃、不放弃，坚决而坚定地为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远大理想和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党员学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更加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移跟党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秉持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2. 举旗指向，引领民心向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宋庆龄以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也终于在弥留之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对党的事业最生动、最有力的代言；宋庆龄一生追随党，是其个人的毕生追求，更是党的先进性的一种力量彰显，同时也是对全体中华儿女的一种精神感召和无声号令，那就是要，听党话，跟党走，做党和人民的好儿女。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及《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两份重要文件，都提出“各群团组织要认真履行政治职责，充分发挥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大政治动员、政治引领、政治教育工作力度，更好的承担起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任务，把自己联系的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这就要求我们扛好宋庆龄这面伟大旗帜，发挥好感召和引领作用，带动民心向党靠拢。要进一步增强省宋基会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导所联系的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

3. 践行宗旨，全心全意为民。宋庆龄的一生始终是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她不辞辛苦去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少数民族地区，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人民心连心。她谦逊和蔼，平等待人，兴办实事，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她一生热心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之一。她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她毕生致力于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福利事业。她经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她一生虽然没有

亲生的儿女，却把慈母的爱全部倾注给了全国的少年儿童。

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必须始终践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基金会“和平、统一、未来”三大宗旨有机结合，在实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弱有所扶”上有所作为；在民间外交、港澳台交流、传承弘扬宋庆龄精神、维护宋庆龄声誉和基金会社会公信力等方面有所作为；在落实精准扶贫，改善农村产业结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有所作为。

二、当好宋庆龄先生享誉世界崇高声誉的传播者，团结全球华人和国际友人共画爱国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

宋庆龄同志生前坚持不懈地为维护世界和平奔走呼吁，在人民外交、国际交往和对外传播活动中堪称表率。我们要积极传播好、维护好宋庆龄先生崇高声誉，发挥宋庆龄先生崇高声誉独特优势，助力共画爱国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

1. 发挥宋庆龄先生崇高声誉独特优势，助力团结海内外侨胞和构建和谐世界。邓小平曾评价宋庆龄：“在国际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交往，进行了艰苦卓绝和富有成果的斗争，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崇敬，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伟大的女性”。今年是宋庆龄先生诞辰126周年，我们要维护好宋庆龄先生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声誉，发挥宋庆龄先生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海内外华人、华侨中，在各国友人中的巨大号召力，团结引领海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画好爱国统一战线的最大同心圆。以弘扬孙中山、宋庆龄思想和精神为纽带，通过各类交流活动，传播中国人民对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所持的美好愿望，团结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发挥孙中山宋庆龄联结两岸共同感情纽带独特优势，助力开展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宋庆龄生前一直关心着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故旧友朋，惦念着台湾的骨肉同胞，殷切期盼着两岸关系

不断发展。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充分发挥孙中山宋庆龄联结两岸共同感情纽带作用，积极开展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我们始终注重加强两岸青少年以及文化、教育、公益等领域的交流与互动，以化解疑虑、增进了解、增强互信，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新的时代，我们要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等要求，更多关注两岸青年成长，更好促进两岸公益交流合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作出新贡献。

3. 发挥宋庆龄基金会人民团体独特优势，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全面开放融合。十九大中央提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实验区，习近平总书记寄以厚望，要求广东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要求广东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遇，携手港澳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省宋基会要进一步发挥人民团体在海内外民间交往交流中的灵活性、针对性、多样性，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不断探索新路径、新方法。积极开展弘扬中华文化主题活动，讲好广东故事，不断提升省宋基会作为海内外民间文化交流交往平台的作用，顺势而为，为加强国际交流及推动粤港澳交流融合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当好宋庆龄基金会这一宝贵品牌的捍卫者，让宋庆龄公益慈善事业温暖凝聚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宋庆龄毕生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抗战时期，她发起并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向国外友好人士和侨胞发出了“救救战灾儿童”的呼吁。她积极促进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妇女团结合作，发起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建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为颠沛流离的千万难民募集救济物资。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

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儿童福利站，建设儿童剧团，以妇女、儿童为对象，进行文化、教育、卫生等福利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德高望重，一直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热情关怀妇女儿童工作，长期领导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福利会，为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周恩来曾形象地把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称为“孙夫人的事业”。在宋庆龄精神的感召下，她的事业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要倍加珍惜宋庆龄这一宝贵品牌，进一步把宋庆龄公益慈善事业做好做大，让党的光辉照耀温暖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1. 擦亮宝贵品牌。十二年来，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秉持“和平、统一、未来”宗旨，在增进国际友好、促进两岸交流、推动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树立了省宋基会的良好社会形象。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切实维护好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的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培育品牌、擦亮品牌、用好品牌，进一步扩大省宋基会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 搭好爱心平台。要进一步重视平台建设，将省宋基会打造成全省少年儿童公益事业的重要平台，建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关爱妇儿公益组织，不断提升省宋基会的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注重发挥平台两端对接整合，提升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能力：一方面让爱心人士知道我们，认同我们，愿意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奉献爱心；一方面能够有效掌握少年儿童公益事业的有效着力点和发展新动向，努力为全省少年儿童公益事业发展贡献独特力量。

3. 打造精品工程。省宋基会成立以来，已经陆续开展了一系列有实效、有影响的活动，打造出“广东省宋庆龄奖学金”“宋庆龄救助孤疾儿童基金”“关爱好人基金”“易方达妇女医学人才培养基金”“可可微笑”关爱唇腭裂儿童基金、“关爱乳腺癌妇女基金”等多个品牌项目，2012年设立的“广东省宋庆龄救助孤残儿童基金项目”，至今已筹资1000多万元，救助孤残儿童400余名，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充分彰显了省宋基会的外向型、公益型特征，扩大了影响，发挥了作用。接下来我们要在认真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着眼时代发展，面向社会需求，明确自身优势，集中力量打造起点高、立意新、影响大、生命力持久的精品工程。

四、当好宋庆龄提倡创新理念的探索者，推动宋庆龄事业不断发展

宋庆龄先生曾说，“学习是一个逐步前进的过程。……只有经过一步一步的摸索，我们才能懂得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她以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不断地为她所从事和领导的妇女儿童福利事业注入新的理念和鲜活内容。我们要牢记宋庆龄重视科学研究、提倡创新的嘱托，在以什么样的发展方式、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弘扬宋庆龄精神、发展宋庆龄事业方面，不断思考、学习、探索和实践。

1. 在示范性和实验性要求上努力探索。宋庆龄先生开创性地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少年宫、第一个儿童艺术剧院、第一本儿童期刊，她明确指出，她领导的事业要“在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方面起示范性和实验性的作用”。我们要紧紧围绕示范性和实验性的要求，结合自身岗位，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不断健全完善体制机制；要钻研业务，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要围绕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公益年会、慈善论坛等下功夫、做实验。

2. 在创新服务方式上努力探索。要进一步整合公益活动品牌和项目，创新服务方式，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精细化的服务，形成自身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品牌 and 标准。坚持内强素质、外塑形象，规范内部管理，强化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牢记初心使命，积极担当作为，不断增强基金会工作水平和服务效率。2019年省宋基会联合腾讯公益开展的“广东省宋庆龄关爱好人基金”网上募捐活动，至今已获得1000多万次的点击与关注，要总结经验，继续探索网络募捐、线下公益活动等新模式，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宋庆龄公益慈善理念，发挥公益慈善事业“暖人心、聚力量”的作用。

3. 在建设现代化基金会上努力探索。要加强现代化公募基金会建设，进一步打造宋庆龄基金会清廉、规范、高效、透明的形象；继承和发扬已有的好传统好做法，以“公开、透明”为导向，进一步建立健全功能明确、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对基金和公益项目的监管力度，创造性开展工作，增强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基金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探索创办能够自给自足并

实现良性循环的实业。通过自身科学、良性的发展，更好地承担弘扬宋庆龄精神、发展宋庆龄事业的历史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不忘宋庆龄事业的初心，时刻铭记她缔造未来的嘱托，把她对祖国和人民最深情的爱传承下去。要胸怀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的大局，把握大势，以全新的姿态融入新时代，勇于新探索、增强新担当、展现新作为，不断开拓宋庆龄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站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立场上践行伟大精神，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民间外交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要更加充分地体现政治性、展现时代性、彰显示范性，在继承弘扬优良传统中砥砺前行，在实现伟大梦想进程中不断壮大，认真讲好中国故事、广东故事，共同播撒宋庆龄“爱”的思想，努力推动宋庆龄事业更加稳步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福利会成立80周年[EB/OL].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14/c_1122987372.htm.
- [2] 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3/28/content_5377892.htm.
- [3]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EB/OL].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2/27/c_1124171974.htm.
-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18/c_1121822489.htm.
- [5] 宋庆龄入党的曲折历程[EB/OL]. 人民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6/0704/c85037-28520141.html>. 2016-07-04.
- [6] 邓小平与宋庆龄交往二三事：特殊情况下奇特会面[EB/OL].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6-04/1719827.shtml>. 2009-06-04.
- [7] 统一战线无小事，习近平擘画最大同心圆[EB/OL].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5-18/8516917.shtml>.
- [8]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续写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事业发展新篇章[EB/OL]. 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127/c1001-29790238.html>.

我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性和未来展望

林少红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00)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凸显了代表广泛性、利益整合性、治理有效性等制度优势, 彰显我们党坚定的制度自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战略部署, 展望未来, 新型政党制度必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永葆生机与活力, 制度效能进一步提升, 给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带来一种新范式新模式。

关键词: 新型政党制度; 历史选择; 政治优势; 未来; 展望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51-06

2018 年 3 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行了概括和阐述, 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创新性概念。这一制度从确立到发展以及不断完善, 在推进中国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显示出巨大政治优势, 形成了鲜明特性。“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 马克思没有讲过, 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 所以,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干中学, 在实践中摸索”。^[1]展望未来, 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 随着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必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永葆生机与活力, 制度效能进一步提升。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邓小平明确指出,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实行多党派的合作, 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符合中国国情, 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产物, 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的原创性制度

设计, 是历史的必然, 符合我国政治发展规律。

(一) 新型政党制度是厚植于中国土壤的体现中国国情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植根于中国土壤, 是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与民主党派联合创立的,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 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是中国人民对政治发展道路持续探索的结果, 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从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苦苦追寻梦想探索救国图存的道路, 在东方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中, 历经艰辛, 君主立宪制、多党制、总统制都尝试过了, 但都证明与中国国情“水土不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为实现共同革命目标, 面对强大敌人, 中国共产党在力量对比中实现革命势力对反动势力的比较优势, 为联合一切革命阶级、政党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创造性地与其他政党与各革命阶级及其政党结成联盟, 成功为中国革命解决了革命所要的团结力量, 在保持自身独立性与先进性实现了国共合作。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即提出建立民主联合阵线, 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不同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和领导了工农民主联合阵线、抗日民

收稿日期: 2020-07-02

作者简介: 林少红 (1971—), 女, 广东揭阳人,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学部主任、教授, 从事统战理论研究。

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各民主党派逐步认清了革命形势和发展道路。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在城南庄会议上通过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遍海内外，极大鼓舞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立即得到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强烈响应，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承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1948年7月底至1949年3月底，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周密安排下，北上汇集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会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深植中国土壤的符合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既符合时代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二）新型政党制度是随着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70多年来，多党合作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中共中央法规和文件为主体、以相关配套政策为辅助的比较完备的制度框架体系，为多党合作制度有效运行、发挥效能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共十八大后，我们着眼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比较成熟的政党协商形式明确规范了相应的指导思想、内容形式、基本程序和保障机制等。特别是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党内法规形式对多党合作进行规范。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是在把握统一战线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中不

断完善并得到发展。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之所以在形成中并不断发展，一个重要方面是契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中国文化并植根于中国的历史、社会土壤之中，也因如此，因养分丰富而充满生机，才易于为中国人民接受和认同，因优势独特而前途光明。

二、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政党制度70多年的政治现实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多党合作制度的精神内涵，“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创立了一种新型政党制度形式，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独具特色”^[3]她融合了东西方不同思想传统和政治文明的精髓，同时又克服了它们原本具有的劣势和弊端，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生成逻辑和要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伟大独创性，成为世界政党制度中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价值，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认识。

（一）具有代表广泛性

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必然结果，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我国的各民主党派是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各方面的成就、有代表性的人士。从本质上看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是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应，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又一重要形式，即中国共产党就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直接协商，在人民政协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协商，是各种政治资源的互动和兼容；是一个强大的政治资源体系，既尊重多数人，又照顾少数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诉求，既能够充分反映和协调各方面意愿与利益，将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源源不断地输入决策中心，体现在国家治国理政的各项方针政策中，代表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这种广泛的代表功能是西方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4]也就是说，作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和渠道，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辅相成，扩大了社会各

方面成员的政治参与，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充分有效地实现了人民群众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二）具有利益整合性

我国多党合作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各党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整合是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现代社会，政党制度是实现政治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必然要求政治制度具备高度的整合功能。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还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和矛盾，社会发展呈现出利益多元化、组织多样化特点，需要有畅通的渠道，表达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和诉求，以利于协调关系，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前提，又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所联系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合作，从而形成强大整合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形成高度政治认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有效地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内耗，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思想、人民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政策决策的优化和高效实施，有效处理和协调各种关系，有效引领和组织社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和长期持续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5]

（三）具有治理有效性

制度化建设，历来是我国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开始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在此后的近30年间，中共中央连续颁布多个文件，对我国多党合作事业进行规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新时期推动“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新任务，维护和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与社会利益，在理论创新、实践探索上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加强了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加强和改善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工作作为重要改革内容和重点工作，拓宽渠道、形式、主体和丰富

内容，形成以程序合理、运行顺畅、协商高效的协商机制，基本形成了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完整的民主体系。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权的新型民主形式，以多党合作为核心，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深深融入新时期现代国家治理之中，并在长期民主实践中初步完成了多领域、立体化的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布局，推进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促进了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新型政党制度焕发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

三、新型政党制度未来展望

新型政党制度经过70多年的建设已显示出其巨大政治优势。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必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6]。展望未来，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必将进一步提升，新型政党制度必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永葆生机与活力。

（一）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新型政党制度的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目标，并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团结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党的领导是爱国统一战线中的根本问题也是多党合作中的根本问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党派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前进，不断进步，不断发展。邓小平多次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7]在多党合作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地位，保证多党合作正确的政治方向，避免西方多党制产生的互相倾轧，进而保证包括各

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目标与梦想。当然，社会主义民主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协商民主要求贯穿党和国家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凝聚最大共识，形成强大合力，有效防止议而决、决而不行，确保协商有组织开展、人步骤实施、有计划进行。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开展协商中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中推进协商民主，鼓励倡导协商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协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只有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幸福安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未来，在新型政党制度的践行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忘多党合作创立的初心，保持政治定力，自觉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携手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多党合作呈现新气象，新型政党制度也必坚守共产党领导这一政治前提。

（二）积极推动新型政党制度主体政治层面的合作与协商

理论思维的成熟是衡量政党政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进入新时代，为更好地引导和滋养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我们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开展理论创新，使得新型政党制度被赋予了更多新的特质和要求。为此，在多党合作建设过程中，做实一些规律性、经验的提炼等基础工作进行总结，新型政党制度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需进一步探讨，如何提升新型政党制度建设路径等。^[8]通过一系列理论梳理、不断用创新了的理论为增强新型政党制度自信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在制度层面的实践中，多党合作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在创新中可以说是不断地推进，出台了不少就如何坚持和完善政治协商方面的政策意见，这些文件、意见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如何在实践中得到规范化落实，成为当前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

个关键问题。为此，发展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现有政治性合作的形式和内容，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各类相关文件尤其重要，特别在多党合作中要“健全相互监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监督、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等机制”^[9]。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释放了要“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10]的强烈信号。为此，在多党合作和协商的实践中，民主监督的内容、方式方法等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将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有效完善，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的制度设计，明确知情、沟通、反馈、落实等环节程序规定，畅通民主监督渠道，增强民主监督功能，同时健全党委政府自觉接受民主监督的约束机制。在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中，创造性地总结和利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实践的成功经验，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主体政治性合作新突破。

（三）推动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

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是一个敢于承担和勇于革新的政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为适应政党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探寻自身改革的有效途径，以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刀口向内的自觉和刮骨疗毒的决心推进自我革命，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本领和领导水平，搞好自身建设，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增强也会为参政党的政治参与和参政能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自身建设中可以相互学习与借鉴和相互促进，更好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庄严责任。在同心共筑中国梦、共创美好新时代的新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理想，也有共同的责任，多党合作舞台广阔、大有可为。^[11]参政党建设关系我国多党合、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关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参政党，怎样建设参政党，基本标准是什么？如何进行界定与规范？又包含哪些具体要求？又如何体现？在政治生活中

的独特作用如何更好发挥？随着参政党的新老交替、社会基础、成员结构等方面的多样性特征发生明显变化，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对参政党建设提出了新有更高要求，参政党作为政党制度中的主体之一，这些问题的探讨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我们必须有清晰准确的认识。若没能对参政党建设这个根本性问题的精准认识，对民主党派发展不利，对参政党建设不利，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功能和政治优势是不利的。因此，参政党也要在提高综合素质以增强参政意识，提高参政水平，真正发挥参政党的功能作用。为此，习近平强调，民主党派要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必须坚持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新”要求，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在未来“要加强民主党派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会制度以及各项议事决策制度，增进班子成员团结，提高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到新水平。”^[12]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聚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坚持照顾同盟者利益，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2019年5月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帮助民主党派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支持保障。随着执政党参政党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革新，在未来，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合作双方将更加成熟，合作水平将会有新提高，两者的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和谐，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拓展政党协商合作新渠道和新领域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对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作出机制性安排。^[13]各民主党派从人民政协诞生起到以后的历届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都是人民政协组织中的重要界别和组成单位，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组织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作为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加

强同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通过联合调研、共同举办协商活动等方式，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更好发挥作用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当前，上至中央，下至各省、市、县都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人民政协组织，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界别优势、党派优势和群众优势，具备上达党政、下连各界、位置超脱的特点，是各党派、界别、群众表达意愿的平台，特别在培育国家治理意识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效能”“丰富协商形式，健全协商规则，优化界别设置，健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程序机制”。^[14]民主党派通过政协这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对国家、地方事务、政策及群众生活和统一战线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做好人民政协的党外人士安排工作，创造性地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践，支持民主党派在政协中的作用，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的优势必将充分发挥，更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大大增强人民政协中各族各界人士的大团结，更有利于促进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必将为推动人民政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筑牢国家治理体系的政协制度基石，将成为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也为我们拓展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提供了重要基地。

（五）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人类20世纪政治文明的创新模式之一，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中国政党之“治”在世界面对民主这一世界性难题时尤显独特，中国政党制度不仅给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带来一种新范式、一种新模式，向世界提供了解决问题且仅供参考借鉴的中国方案，得到世界诸多国家的认可与认同。尽管如此，我们仍坚持“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15]。正如欧洲左翼党领导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左翼力量、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中共则是世界范围内左翼政党的榜样”^[16]。随着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提升，

这一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对世界具有的独创性贡献和启示在未来政党实践中将会得到世界上更多人的认可、认同,中国政党理论话语体系也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越来越大,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258.
- [2]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155,165.
- [3] 中国的政党制度[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www.gov.cn/zwggk/2007-11/15/content_806278.htm.
- [4] 从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中看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EB/OL]. <https://doc.xuehai.net/b63ffa49ae6992219f78bb6ff-3.html>
- [5] 袁廷华, 李金河.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概论[M]. 学习出版社, 2018:28-29.
- [6] [9] [10] [14]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
-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266页.
- [8] 徐凤月, 孙壮. 新中国70年新型政党制度的演化逻辑与前景展望[J]. 江淮论坛, 2019(5):17.
- [11]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的讲话[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1/28/c_1124055281.htm.
- [12]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的讲话. http://www.gov.cn/xinwen/2018-02/06/content_5264433.htm.
- [13] 习近平: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0/c_1125020851.htm.
- [15]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2017-12-02(02).
- [16]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伟大的政治创造——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N]. 光明日报,2018-10-19(16).

【责任编辑: 谭建军】

国家治理语境下增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的 几点思考

齐春雷, 陈茜茜

(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51)

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构成,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基础。“共产党领导, 多党派合作; 共产党执政, 多党派参政”的“一元核心、多元参与”功能优势的充分发挥需要执政党和参政党密切合作, 良性互动。参政党必须与时俱进, 加强自身建设, 增强参政议政能力, 提升建言献策水平, 多元治理主体才能良性互动、协同推进大国善治。

关键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 民主; 民主党派; 参政议政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57-05

人民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主体, 民主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始终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构成,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基础。“共产党领导, 多党派合作; 共产党执政, 多党派参政”的“一元核心、多元参与”功能优势的充分发挥需要执政党和参政党密切合作, 良性互动。民主党派作为执政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应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参政议政, 建诤言, 谋良策, 展现新作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 积累了充足的物质财富, 达到了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民基本实现小康, 人均 GDP 超过 8000 美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平等、自由提供了基础。

“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 一方面, 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 其次, 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2]市场经济中的平等精神、自主独立意识, 为国家治理塑造了更具有主体人格的公民。“不是所有市场取向的制度都是民主制度, 但每一种民主制度必然是市场取向的制度。”^[3]物质财富的丰厚积淀则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可能性。正如利普塞特所言, “国家越富裕, 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 只有在没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 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可配置资源的相对充裕, 为民众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资金、时间和知识、信息、理性等储备。

多元化的经济成分促成了多元化的利益分配结构、社会存在方式、民众生活方式, 形成多元利益主体和多元利益诉求。“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实现对社会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 政治资源包括政治权力、政治利益、政治荣誉等内容, 其核心是政治权力, 因为它具有支配其他社会资源的能力, 甚至具有重构社会结构的能力。”^[4]因此, 以维护自身和群体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为原动力的民众政

收稿日期: 2020-05-15

作者简介: 齐春雷(1970—)女, 安徽界首市人, 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主要为统战理论、政党政治; 陈茜茜(1980—), 女, 安徽合肥人, 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文化交流处编辑, 从事中华文化研究。

治参与的增长、膨胀,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国家政治体系也必须予以吸纳、回应。网络移动技术的高度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信息传递的开放性、互动性、多中心性,冲破了传统通讯的种种藩篱障碍,为整个社会的有效联络提供了技术支撑。民众获取信息、表达诉求,得到了经济便捷的方式渠道,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政治参与的能力大为提升。当微信、微博能够迅速得到上万甚至几十万、数百万、千万虚拟空间的聚集、呼应时,这种网络政治参与的能量是极其惊人、巨大的。“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得以借此有效表达自己和群体的利益诉求,这就要求政治系统以更为合理化的结构、更为制度化的运行来进行理性、合法地疏导、回应,将多元主体参与规范在合理有序的幅度,否则可能对国家治理、社会稳定造成负面的冲击。

在一个近 14 亿人口、国土广袤、不同地域差异巨大的国家进行现代化治理,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政治、生态、文化各领域协调配合、统筹发展,治理的高度复杂化、精细化、专业化使得党委政府事无巨细地包揽所有公共事务的传统治理难以为继。“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5]人民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主体,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千千万万民众的事业,只有保证“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6]才能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多元社会结构中,民众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主体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在全面深化改革、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社会生态中更为关注资源配置对本阶层、群体的利弊得失,从而扮演比历史任何时期更为积极、主动的政治角色。“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 95% 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的多。”^[7]这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中党委政府不应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强制性管控来处理与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通过公平、公正的利益协调机制的运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

构建国家、社会、民众共同参与的共治、共享的合作协商平台、机制,充分激发各治理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展其能,相互协调,密切配合,运转和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

国家治理既然是多方主体的合作共治,就需要为同样作为治理主体的民众提供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机制。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政府、民众、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主导力量。民主党派作为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事的友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并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其参政党职能履行的过程,也是参与国家治理、与执政党同心协力推进国家良政善治的过程。

民主党派联系、代表广泛的社会阶层、群体,涵盖社会、经济、教育、法律、医疗、科技出版、归国留学人员等众多职业领域。无党派人士以党外知识分子为主体,具有更大的社会力量包容性。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全方位、立体化特点,从中央到地方、基层,从人大到政协、政府,不同层次、不同的政治渠道多维度、深层次地参与国家治理。通过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政治吸纳,将不同阶层、群体民众对于国家治理的决策制定、政策实施的意愿诉求输入核心政治系统得以有效表达。从与中共中央和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层协商到与党委、政府部门“面对面”对话,以及就国家治理重大决策的专题调研,使得民众对国家治理的所思、所盼、所求,被关注、被体现,充分彰显民众的治理主体地位,充分激发参与国家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

科学决策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中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既面临着来自传统大国的挤压,又要应对现代化高速发展中纷繁复杂的国内矛盾,国家治理难度空前,因此对于国家决策的正确性、科学性、前瞻性的要求也是空前提高。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要能统筹兼顾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建设的协调推进,把握重点,放眼长远;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则要多方审时度势,考量多元利益格局中效率、公平、民主的多重因素平衡。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是完善优化公共政策的重要环节,或通过人大、政协、党委、政府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或与政府相关部门开展对口联系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或直接任职政府、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以特约监督员身份参与决策,或通过快捷简明的信息直通车反映社情民意,或就国家治理的重大战略展开专题调研……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党派在公共决策参与的广度、深度都与时俱进地得以拓展,影响力地位进一步提升,影响决策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同时,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决策的防错、纠错机制。历史经验证明,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突出优势,但前提是必须保证目标、方向、措施的准确无误,绝不能出现全局性、颠覆性的错误、失误,否则将给国家民众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损失。避免决策权过于集中、决策主体的认识局限性,只有发扬民主,才能做到科学决策、正确决策。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民主党派与政协监督的重要性,“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8]2017年1月,习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询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的不同声音,兼听则明,是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职责所在。

多元共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民众多种社会力量的多元利益、多元价值、多元话语的汇聚、交锋、博弈,找到其中最大公约数,达成最广泛共识,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治理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理绩效,实现多方共赢的必然要求。美国管理学大师 H.A 西蒙认为,人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而协商能使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最大化。^[9]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多党合作提供了最大限度凝聚最广泛共识的合作、协商民主机制,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的组织机构,政协委员中党外人士的比例超过 60%,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治理建言献策的重要渠道平台。执政党与参政党立足国家整体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着眼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就国家的重大战略、重要政策,遵循民主的价值准则,进行广泛、密集、深度的协商,寻求共识,但不强求一律,既凝聚多数意愿,又尊重少数表达。

新时代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是完善民众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决策科学化的必然要求。执政党坚持重大决策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中,政党协商已经成为常态化制度安排。2017年2月,出台了支持民主党派中央开展重点考察调研的相关文件,这使得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更加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序可循。各民主党派紧扣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聚焦“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等重大问题深入调研、建言献策。从中共十八大到2019年6月,各民主党派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报送书面意见建议共647件,其中527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为中共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10]2018年12月,制定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有关规划。2019年又连续出台了三个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以及新时代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工作的有关政策文件,为参政党履职尽责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殷殷厚望、重托中,也寄予了对参政党提升参政议政水平的更高期待。

三

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的提升,必须依托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坚持和完善。提升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需要执政党和参政党勠力同心,携手并进。新时代执政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提升,参政党也必须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参政议政能力,提升建言献策水平,多元治理主体才能良性互动、协同推进大国善治。

一是优化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核心,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信息的收集、渠道的拓展往往取决于执政党党委、政府的态度和作为。部分中共领导干部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理解甚至错误的认识、做法:有的对民主党派在政治把握上不放心,不支持其参与决策;有的对自己的能力水平过于自信,认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可有可无;有的甚至把民主党派看成是异己力量,反对其参与国家治理……虽然已经有了一套较为成熟且日趋完善的民主党派政治参与制度,但如果缺乏执政党方面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真心的认同、诚心的配合,民主党派的调研质量难以保证,其参政议政的效能也就难以提升。当然,参政党成员也存在着加强思想建设,增强责任意识的问题。有的民主党派成员对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妄自菲薄,认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是主导地位,不发挥主导作用,可以不必太较真、太认真;有的则为了和党委政府的领导、部门保持一致,进行歌功颂德式的建言献策,甚至对于可能会带来重大损失的决策,也不敢提出质疑和反对……因此,优化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政治生态,需要执政党和参政党共同的努力。执政党应加强党委政府官员对多党合作重要性的认识,对统战理论及其方针政策的学习,民主党派也应增强政党意识和责任感、使命感。良好的民主政治氛围,能有效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效能感与积极性,挖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广度、深度。

二是夯实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组织基础。民主党派历史上参政议政的成就影响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老一辈旗帜性领袖,他们学术造诣深厚,享有崇高

的社会威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构成政党功能发挥的核心力量。但随着代际交替,老一辈领导人先后辞世,新一代领军人物、旗帜性人物相对欠缺。相当一部分基层组织负责人是长期从事科研工作的专家学者,业务水平很高,而行政管理能力相对不足。“培养和造就政党协商专家、党务专家和两方面能力兼备的参政党政治队伍,应当成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根本性任务。”^[1]虽然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加大了对党外人士的选拔培养使用力度,但相对而言,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比例仍然较小,参政议政人才仍有限,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组织基础有待于进一步夯实。加强组织建设的力度,应进一步拓展党外人士政治安排渠道,积极推荐具有不同学术领域专业造诣的人才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胆举荐党外人士在各级政府部门担任实职,使其专业特长融入社会实践以经世致用,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提升参政议政能力。发挥民主党派专业技术人才荟萃的优势,可以加大组织力度,如成立民间智库、政策研究机构,植根草根民众,广泛调查研究,密切关注社会发展的难点、公共事务的热点、政策措施的重点、民众民生的痛点、国家治理的焦点,汲取民情民意,从中央、省、市、基层组织四级渠道,依托政协提案、人大议案、调研报告、资政报告、社情民意信息等多种形式参政议政,急党委政府之所急,解国家民生之所困。

三是健全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长效机制。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高等教育国际化越来越普遍,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中的专家学者,大多有着在海外留学、访学的国际化背景,其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较之老一辈更为强烈,对国家治理有着深层次的理性观察、思考,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独立性,对于平等、民主的交流协商更为认同,而很难接受传统的权威说教。这需要健全相应的参政议政机制,构建中共党委政府和民主党派相对应的各级组织之间、民主党派内部组织之间的定期、不定期的信息通报制度、联谊交流制度、考察调研制度、奖励激励制度、民主协商制度、结果反馈制度等等,畅通民主党派知情渠道、利益表达渠道,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机制体制。同时,应加强八个民主党派之间参政议政的协商合作机制建

设, 它们之间在组织发展上有交叉, 在参政议政领域也有重合, 彼此加强沟通、协调, 在某些调研主题上可以集中优势资源, 避免同一议题的重复调研, 降低成本, 同时在保持各党派特色的基础上, 优势互补, 各展其长, 互利共赢, 从而达到1+1>2的整体效应。

四是厚植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民众基础。转型中的中国问题纷繁复杂, 千姿百态, “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要依托广大民主党派成员的力量, 深入民间, 深入社会, 深入民众, 从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汲取参政议政的鲜活素材。网络的及时性、便捷性、交互性为参政主体之间、参政党与民众之间、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交流提供了技术支撑。应充分有效利用网络技术搭建参政议政平台, 拓展社情民意的提取渠道、公共决策的信息渠道, 从广度、深度多方位丰富参政议政的信息储备。全国政协会议已经开启了网上提案, 网上协商民主方兴未艾, 有些政协委员更是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 加强同网民的沟通、联系、互动, 广泛提取民情、民意, 这是新媒体时代中国民主发展新的增长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也可以借助网络民意, 多加关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诸多方面的热点、难点、重点、痛点。网络资讯具有即时性、敏感性、广泛性, 能够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供生动、丰富的素材。将海量、庞杂的信息资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提炼、升华为理性、科学、系统的政策咨询建议, 需要相当的政治素养、专业术语和专业技术表达, 需要专业领域的梳理、阐释, 这正是人才荟萃的民主党派所可为、所当为、所应为之。同时可借助微博、微信、公共论坛等及时引导社会舆论, 解疑释难, 既能够加强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零距离接触, 直接倾听到民众的呼声、诉求, 又可以为参政议政“参到点子上, 议到关键处”奠定、夯实民众的支持认同。

五是激活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监督功能。参政党民主监督的政党职能, 相当程度上寓于参政议政、政党协商之中。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目的是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从而助力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使公共权力的运作更加彰显其人民性。参政党应有“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情怀, 聚焦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要决策部署, 以扎实的调研, 详实的数据, 对其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监督。这种监督不同于西方政党监督的对抗性、排他性, 不以“权力分割”、“权力制衡”为目的, 是坦诚相见、平等协商, 融参与、监督、协商、合作为一体, 是求同存异、畅所欲言, 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 既不断巩固已有共识, 又要聚同化异, 在清除隔阂和分歧中形成新的共识。古人云, 为政贵在执行, 以实则治, 以文则不治。2016年以来民主党派在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中, 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纵深推进。应紧扣“十三五”规划实施、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问题, 实事求是, 探索事物发展规律, 寻求问题解决之道。不冷漠, 不浮躁, 不缺位, 不越位, 不错位, 为公众传心声, 为民生建真言, 为国计谋良策。从而回应中国国家治理赋予参政党的更高期待, 也增加参政党成员对本党的自豪感、忠诚度, 激发其参政议政的主动性、积极性, 使政党形象与政党作为互相促进、共同提升。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19-11-6(01).
- [2] 米尔顿·弗里德曼.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9-10.
- [3] 转引自杨宏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多维审视[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6:139.
- [4] 王寿林.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论[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84.
- [5] 列宁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483.
- [6]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111.
- [7]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311.
- [8] 邓小平文选[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2):205.
- [9]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M]. 南京: 淮海大学出版社, 2017:104.
- [10] 董熠晶. 多党合作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创新[J]. 中国统一战线, 2019(07).
- [11] 蔡永飞.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多党合作的作用[J]. 团结, 2016(05).

乡村治理视阈下农村基督教问题研究

王娜娜

(青岛市社会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03)

摘要:农村基督教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对于农村基督教治理所面对和凸显的若干问题,不能单独从基督教自身来看,而要从整体来把握。本文坚持问题导向,把宗教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发展变化的大环境中去考量,从重塑基层党组织权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多元宗教治理协作机制、依法加强监管与引导以及发挥三自爱国教会作用等方面提出强化农村基督教治理成效的路径建议。

关键词:农村;基督教;治理

中图分类号: B9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68-06

农村宗教事务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农村宗教治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纳入乡村治理这一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对农村宗教工作进行了顶层安排部署,明确提出加强农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相关要求。目前我国基督教信教群众已经达到 3800 多万人,是五大宗教中人数最多的,其中超过半数出自农村。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基督教的组织结构、传教方式、活动空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基督教领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基督教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基督教强势渗透进一步加剧,对农村宗教事务治理形成很大挑战,影响宗教和睦、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摸清、掌握当前农村基督教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势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其影响及挑战,并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农村基督教发展新态势

(一) 发展速度的变化: 信教人数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基督教在我国农村特别是北方农村地区发展十分迅

速,农村“基督教热”不断升温,在我国农村宗教生态格局中曾经保持着“一枝独秀”的局面,信教人数占我国基督教信教总人数的 80%。进入新时代,随着人口自然死亡、持续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外出务工潮的兴起,农村基督教信教人数增长呈现下降趋势,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负增长,一些乡村教会出现了萎缩的情况。“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2016 年进行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共抽取样本 32897 人,其中基督徒共 675 人,占了 2.05%,这些基督徒中来自农村的有 338 人,来自城市的有 337 人,两者比例相当。”^[1]这个数字明显可以看出农村基督徒的人数整体是呈下降趋势。

(二) 信众结构的变化: 信众结构仍然以“三多”为主

当前,农村基督教信众结构中中青年、男性的比例虽有一定增加,文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但以老人、女性、文化层次低的社会边缘群体为主的“三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近年来大量中青年随着城镇化发展加入外出务工大潮,更固化了这一结构特点。一些农村教会成员也几乎都以老弱病残为主体。其中,五十多岁左右的妇女往往充当了教会的骨干,其余则大多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这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农村留守儿童成为潜在基

收稿日期: 2020-06-30

基金项目: 2018 年度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青岛市农村基督教发展状况及对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QDSKL1801216)

作者简介: 王娜娜(1982—),女,汉族,烟台市莱阳人,法学硕士,青岛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信徒的可能性增加。留守儿童通常跟随老人生活，如果老人是基督徒，平时参加教内活动通常会带着他们一起去。久而久之，耳闻目染，潜移默化中他们的思想都或多或少会烙有基督教的一些印记，尽管这种印记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

（三）信教成因的变化：信教动机功利性倾向仍旧突出

“大多数农村基督教信众加入教会基本都与自身或亲属生理疾病或边缘化的社会处境有关，即使有信仰背景的家庭，子女信仰基督教也多与自身的困境危机紧密相连。因此，改变困境、寻求心理慰藉的愿望决定了其最初信仰动机的功利性。在这种功利性前提下，祈祷也多与治病、保平安或改变贫困现状有关。”^[2]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信仰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与民间信仰无异，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外国的神而已。他们对于基督教教义本身的理解是模糊的，即使在一些历史上几乎全民信仰基督教的村庄，很多人表示一出生就受洗，家长要求怎么做就怎么做，具体为什么不知道。

（四）发展空间的变化：教会活动空间向城市迁移

伴随农村教会的萎缩，基督教把发展教徒的重点从农村转向了城镇，这导致城市郊区或城乡结合部基督教聚会点呈现较快增长趋势。有些城市基督教教会已经把农村务工人员作为发展重点，并为吸引更多农村务工人员进入教会，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宣教策略。与此同时，城市教会也引导和帮助农村教会发展。“一些城市教会定期和不定期组织牧师和信众到农村教会讲道、分享、交流，并且提供书籍、培训和物资上的必要帮助。农村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也会到城市教会进行学习和培训。”^[3]这样，农村教会与城市教会之间的互动日益密切，彼此之间的双向流动日益加深，基督教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呈现出嵌入式交互发展新格局。

二、农村基督教对乡村治理形成的影响与挑战

虽然当前我国农村基督教信教人数明显下降，不过因为农村在人数上具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基

督教在农村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对农民的社会生产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影 响不容忽视。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总体上看，当前农村基督教发展是有序的，在道德教化、精神慰藉、心理调适、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其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一些热点、痛点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并且在新时期呈现出不同面貌，凸显出一些不一样的问题，对农村社会稳定及乡村振兴发展带来诸多挑战。

1. 强社会动员能力对基层政权构成一定威胁

总体来说，农村基督教信众大都不关心政治，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也无意挑战基层组织的权威。但基督教的强社会动员能力客观上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权威和群众基础构成一定的威胁。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原有的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公共空间不断被打破，但农民对‘在共同体之中进行联合生活的渴望’却一直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强烈。”^[4]然而，基层政权组织对于联合生活所必须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提供上一定程度上是缺位的。一些地方村党支部、村委会长期不开展活动，与群众关系疏远，在村民中的威信逐渐削弱。而基督教组织则十分活跃，一般都定期定时开展活动，并常年坚持，宗教生活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化。制度化的宗教生活必然会强化他们的宗教认同和宗教归属感。当农民越来越依赖基督教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与寄托、物质上救济与帮助的时候，就会将权威认同由基层政权转向神权，忠诚依附于基督教组织。相反，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将会逐渐被削弱。

2. 内在排他张力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社会和谐

宗教天然 是排他的。基于信仰建立的信仰共同体，会把对外的张力当成是内在凝聚力的构建形式，一神教尤其如此。同时，宗教的超强社会组织性，则又容易将这种排他性进一步放大。相比其他宗教，基督教强烈的传教冲动和严密的组织结构，更容易加剧与社会关系的张力。共同的信仰使基督徒建立了自己鲜明的群体边界以及有归属和认同感的个体身份。在同一村落的基督徒，彼此之间的交往一般比较紧密，在村中逐渐形成一个交际圈，与教外邻

里交往程度呈逐渐较少的趋势。虽然彼此之间并没有明显而激烈的冲突,但观念与情绪上的矛盾已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邻里关系的和谐。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与农村传统民间信仰之间的张力,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明确的宗教身份,但实际上是有鬼神信仰的。民间信仰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传统上早已成为农村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体现在老百姓的婚丧嫁娶及各种风俗习惯节庆礼仪中。然而,这些民间信仰恰恰是基督教作为偶像崇拜必须禁止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冲突。

3. 基督教文化盛行解构农村主流意识形态

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渴望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然而在农村,即使是一些比较富裕的村庄,文化设施普遍缺乏或陈旧,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得精神文化需求。除了在节日期间热闹一下之外,平时基本没有什么文化活动。而基督教除了每周一次的礼拜,还有交流会和见证会,还经常举办音乐班、学习班、诵经班等活动。这种有规律的宗教生活方式对于那些缺乏集体文化生活的农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宗教的仪式感也让农民内心找到了一种崇高的感觉,体验到精神上的充实。于是,在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匮乏的情况下,基督教组织有规律的宗教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化生活方式,填补了农民贫乏的公共文化生活,满足了农民排解孤独和进行情感交流的精神文化需求。但这种文化与乡村振兴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不同的,许多方面甚至是相冲突的。应该说,基督教至今还没有真正融入中国社会,还没有真正在中国文化中落地生根,其中国化道路尤其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否认,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侵袭着党在农村的文化宣传阵地,对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的建构成成一定冲击。

4. 非法宗教活动挑战宗教事务管理

由于农村基督教信仰具有较强的功利性,极易出现异化现象,这为农村基督教私设聚会点非法宗教活动和邪教滋生以及境外基督教渗透提供了空间和土壤。一方面,农民信徒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对宗教与迷信、邪教难以辨别是非真假,又缺乏教牧

人员的正确引导,给一些非法宗教和邪教组织带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农村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传教热情高涨,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善于以小恩小惠吸引群众信教,在农村基督教信众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成为境外基督教势力渗透的重点对象。私设聚会点组织相对分散,活动场所隐蔽,外人不经熟人介绍难以进入,给政府部门的准确摸排和有效监管造成很大困难。一些非法私设聚会点被取缔后不久又重新照常活动,屡禁不止、难以根除。最为要害的是,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信徒所读《圣经》来源一般为自行购买,购买渠道不明。讲道员一般是自封传道人,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圣经》进行断章取义的解说,讲的“经”往往都是相对保守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只讲对教会的言听计从,不讲对法律法规的遵从。很多农村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与境外基督教在经济、组织、人员方面或多或少存在联系,成为境外势力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的桥头堡。如何实现对农村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有效监管,成为当前农村宗教事务管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三、乡村治理视阈下农村基督教治理路径构建

“农村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离不开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它是农村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也是农村社会问题的表象之一。农村基督教的出现和存在有着合理性。”^[5]基督教能够在农村这片土地上生根发展,就证明了它已经适应了农村社会的形态。所以,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有一定必然性,至于农村基督教治理所面对和凸显的若干问题,不能单独从基督教自身来看,而要从整体来把握。要客观、公正、辩证、理性看待,既不能把它当成“瘟疫”,一味地“堵”,试图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它;也不能无视它的消极作用,放任自流,甚至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它,而应在中央宗教工作精神、特别是习总书记对于宗教工作的重要指示进行,把握和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问题导向,在“导”上下功夫,切实树立宗教工作大格局思维,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

面面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发挥基督教对农村发展的积极作用，抑制消极作用，使基督教成为农村社会的和谐因素。

（一）重塑基层党组织权威，是农村基督教治理之基

1. 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

要切实加强党在农村的全面领导，真正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要切实加强农村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心农民生产生活需求，切实帮解困难，让他们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最大限度地包括基督教信众在内的农村广大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筑牢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

2. 加强党对农村宗教工作的领导

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切实提高对基督教的特殊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贯彻和落实好党的基本宗教方针政策，做好农村基督教事务的管理和引导，担负起农村宗教工作的主体责任。同时，还要切实履行好“党要管党”的职责，坚决杜绝党员信教，决不能出现党员为基督教“推波助澜”的现象。要牢牢掌握党对农村宗教工作的主动权，坚决维护党在农村的领导权威，坚决防止宗教与宗法势力结合、形成妨碍农村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势力，保障农村基督教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有序发展。

（二）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农村基督教治理之本

1.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供给

按照“城乡一体、全面覆盖”理念，逐步试点医疗、社保、教育、文化、就业等的城乡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与均等化改革，努力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范围，逐步提高农村保障标准，稳步提高农民的保障能力，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积极帮助贫困家庭脱贫，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切实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并最终建构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农民生产生活的确定性与安全性。让农村百姓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避免农民因病、因贫或养老等困境而投入基督教的怀抱。

2.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引导

要在广大农村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隐性教育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融入乡村德治建设之中，占领、浸润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要有效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and 道德教化功能，使之成为农民群众的行为习惯，使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有长期稳定的依赖，从而摆脱对基督教在精神上的过分依赖。

3. 加大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文化发展体系。通过广泛开展戏曲、广场舞、腰鼓队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文娱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消除宗教信仰的支撑点，吸引群众脱离宗教场所。

（三）建立多元宗教治理协作机制，是农村基督教治理应有之义

在乡村治理结构下，不同主体应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动性，深入挖掘各自的潜力和优势，注重发挥自治、法治、德治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效应。农村基督教治理也应在乡村社会治理的多元格局中，充分发挥不同主体间的能动作用，构建以宗教管理部门为主，村民自治组织等各类主体充分参与的治理体系，着力实现政府—社会多元主体协作宗教治理新格局，达成良性互动的治理效果。比如，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对农村社会的组织归属需求，可以立足于加强乡村社会组织建设，激发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活力，推进村民自治机制和自治规范建设。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弥补公共服务方面供给不足的危机，在重建乡村秩序、促进社会融合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推进农村基督教治理要注重加强乡村社会组织建设，激发其活力。要积极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健全农村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此外，还可以采取多种途径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四）依法加强监管与引导，是农村基督教治理之要

1. 在健全工作网络上下功夫

一是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宗教工作网络，严格落实乡、村两级宗教工作责任制，“探索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管理的精细化、精准化，确保农村宗教工作有人抓、有人做，使农村基层组织成为依法管理宗教工作的战斗堡垒。”^[6]尤其要落实好村级宗教工作目标考核责任制，配备基层宗教工作联络员，延长工作手臂，解决好以往村级宗教工作没有落脚点的问题。二是完善基层宗教工作联席工作机制，建立由宗教工作部门牵头、各部门各司其职的宗教工作协调机制和预警机制。基层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必须切实树立宗教工作大格局理念，理顺、统一成员单位的工作理念，明确各自工作责任，防止出现因部门利益之见，影响工作全局的情况。三是把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计划，使基层干部从全局高度认清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尽可能多地熟悉掌握政策，从根本上杜绝不敢管、不会管、不愿管的现象。

2. 在依法严格管理上下功夫

一是坚持不懈地在农村进行党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教育宣传，引导广大农村基督教信教群众正确处理好国法与教规的关系，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合法开展宗教活动。二是尊重农村基督教信教群众的信仰和感情，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置涉及基督教因素的矛盾纠纷，正确区分宗教事务与一般社会事务的界限，不能将一般社会问题与宗教问题相混淆。要把能不能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作为评价宗教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坚持政治上团结、信仰上尊重，感情上贴近、生活上关心，真心实意为信教群众办实事好事。三是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加强对基督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教职人员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依法加大对农村基督教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力度，严密防范、坚决制止以基督教为名影响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干预行政司法等国家职能的非法宗教活动。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决抵制境外利用基督教进行的政治渗透。

2. 在整治私设聚会点上下功夫

农村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治理的重点难点在于其易于“变质”性和自身的隐蔽性，因此，对于私设聚会处点的治理不能简单粗暴地“一刀切”。要采取疏堵结合、区别对待、分类处理、纳入管理的多元方式，有效防止其组织化、体系化发展。一是对那些设立时间较长，信众思想基础好，愿意加入三自教会的，应积极帮助他们走上爱国爱教道路，符合条件的，给他们办理临时登记证。二是对不服从政府管理、信众思想基础不一的，要在耐心细致思想工作的前提下，依法加强管理，不能简单粗暴地取缔了事。三是对于多次依法取缔而又三番五次地恢复活动的，要坚决打击惩处，并增加其违法成本。四是要创造条件，逐步动员引导聚会点的信众到正规教堂过正常的宗教生活，从源头上挤压私设聚会点的生存空间。

（五）发挥三自爱国教会作用，是农村基督教治理之辅

1. 加强三自教会自身建设

一方面，要在农村信教群众中加大对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存在合理性的解释，消除对这一组织设立合理性的曲解。另一方面，要认真落实宗教教职人员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支持帮助农村三自教会结合实际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规范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巩固和增强其在广大农村信教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通过正信挤压非法宗教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从而更好地引导信教群众积极维护社会稳定。

2. 深化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国化建设

基督教领域的种种问题根源在于基督教始终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化。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方向关键是实现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国化。要引导三自教会自觉担负起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国化的主体责任，引导其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自觉抵御极端主义思潮影响，让基督教的消极影响及异端邪教失去生存空间。

3. 配强教职人员力量

教职人员对信教群众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宗教界人士和教牧人员，尤其是中青年教牧人员的素质如何，关系到整个农村宗教团体未来的面貌。针对目前农村基督教教职人员鱼龙混杂的现象，要做好对传教人及讲道员的管理和规范，登记入册，

切实打击非法传教活动。对于那些信教群众多、活动堂点多的农村，在配备农村教会教职人员时，要尽可能选派在基督教院校学习、培训过，思想过硬、宗教学识水平较高的教职人员。对已经在农村教会做教务工作的教职人员，要经常性、分批次、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提高政治素养、宗教学识和品德修养，引导宗教人士端正教风、潜心修行。尤其要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增强法制观念，增强政治把握能力，大力宣传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引导农村信教群众坚持正信正行，提高遵守法律和抵御境外渗透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使他们成为引导信教群众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主要力量。

参考文献：

- [1][2] 唐晓峰，段琦. 中国农村基督教的现状与问题[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6).
- [3] 孙雄，黄佳. 农村基督教发展态势及其社会影响—基于浙江的研究[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6).
- [4] 张晓洁. 农村基督教信仰对基层的影响—基于皖北F市的调查思考[J].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学报，2017(4).
- [5] 赵建玲，王书敏. 农村基督教信仰热现象探析与社会工作干预[J]. 中国农学通报，2012(2).
- [6] 曹学霖. 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做好农村宗教工作[N]. 中国民族报，2018-02-27.

【责任编辑：温开照】

中小企业成长悖论与人力资源投入的创新绩效研究

刘玉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中小企业由于“小的劣势”使得成长战略成为其取得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本研究提出中小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影响创新绩效的成长中介作用机制,不再将企业成长看做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是作为中介变量。我们使用中小企业层面的 2014-2016 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和发现了支持证据。实证结果证明中小企业需要根据“变强”目标来制定人力资源战略。

关键词: 中小企业成长; 人力资源投入; 创新绩效; 小的劣势

中图分类号: F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74-07

在日益复杂和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战略管理文献将创新视为企业创造价值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推动力。更具创新性的公司会更多成功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开发新的功能,取得更好的绩效。然而,创新举措严重依赖于员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人力资源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源战略是企业影响和塑造个人技能、态度和行为的主要途径,从而使员工做好自己的工作和实现组织目标。以往的文献已经注意到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组织绩效的关系,如生产力,灵活性和财务业绩等,但是这种理解需要扩展到创新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人力资源投入对创新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

管理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中小企业在刚创立的几年内会出现高死亡率(Fan,2010; Geroski et al.,2010)^{[1][2]},对此的一个核心解释是源自于中小企业存在“小的劣势”,企业的规模小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融资困难、招聘不到高素质的员工等;还可能遇到合法性问题;也很难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因此,沿着这个逻辑学者们建议中小企业应该通过不断成长来提高存活率和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人力资源的投入是否使得中小企业得到积极的成长,进而提高创新绩效?

一、理论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 人力资源投入与创新绩效

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影响和改变员工的态度、能力和行为,实现组织目标,并在催化和引导个人朝着创新活动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企业发展新的产品和改善管理流程时,需要人力资本的创意和能力,以此开发创新方法,获取新的机遇。技术是创新的推动力,技术人员在企业创新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当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时,他们会遇到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需要灵活的、能够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的创新型员工(Madsen 和 Ulhøi, 2005)^[3]。一般而言,员工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的知识技能越多,对不确定性环境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更强,并且通常能把知识转化为创新创意的来源。而当公司将创造力作为招聘和选择员工的标准时,员工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并致力于更多的创新行为。通过有效的人员配置,员工将变成公司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新思想来源。通过培训,企业可以培养出企业需要的创新能力与专长(Weisberg, 2006)^[4]。绩效考核可以提高员工从事创新活动的动机,并使企业取得有利的创新成

收稿日期: 2020-04-10

基金项目: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驱动广东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区位选择战略与创新政策研究》(2015A080801005)

作者简介: 刘玉芽(1981—),女,海南文昌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

果(Jiménez-Jiménez 和 Sanz-Valle, 2005)^[5]。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 1a: 中小企业技术人员比例越高, 企业创新绩效越强。

假设 1b: 中小企业员工教育程度越高, 企业创新绩效越强。

(二) 人力资源投入与企业成长

以往的研究认为更多的资源通常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的扩张。。这忽略了持有太多的资源可能导致低效, 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发挥, 而创业过程中盲目追求机会但没有控制好目前的资源也会导致失败。同时, 创业理论以及企业成长理论(Churchill and Mullins,2001; Pierce and Aguinis,2013)认为企业可能存在成长的局限性, 在这种局限下成长可能不会给企业带来利益, 反而会降低存活率^{[6][7]}。对于中小企业而言, 成长有着特别的内涵, 企业渴望的成长是基于资源的成长。一家公司独特的有形和无形的资源组合影响着这家公司的成长率以及扩张的方向, 即成长受到管理团队如何定义和使用企业资源的影响。管理团队的关键角色就是利用其对企业和市场的认识来定义和塑造扩张路径并将该公司的资源转化为盈利增长。公司资源之间紧密的联系, 与众不同的能力和管理团队的心智模式或“主导逻辑”推动了成长的多样化, 因此服务和资金的收益取决于高层管理团队的主导逻辑。由于资源与成长战略之间的关系, 不难理解公司成长率存在差异。中小企业由于管理方面的因素, 资源的投入可能不会带来快速的成长, 然而这种缓慢的成长也许对中小企业来说是降低风险的一种方式。员工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员工的专业技术和知识素养对中小企业平衡风险和后来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 2a: 中小企业技术人员比例越高, 企业成长速度放慢。

假设 2b: 中小企业员工教育程度比例越高, 企业成长速度放慢。

(三) 企业成长的中介作用

管理者经常把成长作为组织的一个理想的目标。成长带来越来越大的规模经济和其他“经济体”增长。另外, 成长还带来知名度、声望以及抵御环

境冲击的能力, 以及更高水平的高管薪酬和其他管理上的好处。由于这些原因, 成长经常被视为重要的组织绩效和扩张的动机。然而, 成长也会增加组织的复杂性, 而且这种复杂性有时也是难以管理的。创业理论以及企业成长理论也认为企业可能存在成长的局限性, 在这种局限下成长可能不会给企业带来利益, 反而会降低企业绩效。因此, 中小企业快速的成长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放慢成长速度可以说是适应外部环境,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的必然过程。

Coad 和 Rao(2008)的研究显示, 创新活动对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仅集中在快速成长的企业, 而对于其他的企业它的影响是负向的^[8]。这就预示着成长慢的企业里, 企业成长与创新绩效可能存在负向的关系。企业在发展初期, 由于资源的限制和管理的局限性, 会出现成长缓慢的时期, 然而正是这种速度的放慢, 使得企业内部管理得到平衡调整、外部风险得到控制, 促进了创新型员工在这种平稳的环境中发挥主观动力, 更容易获得创新绩效。

创新往往伴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与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劳动力的降低。一个创新型企业可能会改变其生产资源, 得益于机器和以牺牲就业为代价(Coad, 2009)^[9]。因此, 中小企业往往会在人力资源的投入和管理上, 增加技术人员的比例和提高员工受教育的程度这两项富有竞争力的人员管理措施, 减少其他非核心竞争岗位员工, 这些措施有利于精简机构, 提高企业绩效。这在中小企业, 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里非常常见。这些措施总体而言抑制了总雇员数量的增长, 但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增强, 创新绩效提高。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 3a: 中小企业的成长在技术人员比例和创新绩效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

假设 3b: 中小企业的成长在员工受教育程度和创新绩效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

二、样本与变量度量

(一)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样本选取 2014-2016 年我国中小企业的上市公司, 构成面板数据。为保证数据的有效

性进行如下筛选：(1) 选取 2014、2015 和 2016 年中小企业板块的上市公司；(2) 考虑到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剔除业绩过差的 ST 和 * ST 公司；(3) 剔除财务信息披露不足和数值异常的上市公司；(4) 剔除样本中变量数据遗漏、不全的公司。筛选后得出最终研究样本 406 家公司。数据来源于 WIND 金融数据库。本文使用 Excel, Stata 14 等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 度量变量

1. 人力资源投入。员工的能力可以帮助创业者执行他们的目标，有助于企业成长。人力资源会随着企业从新创到发展为成熟的企业而有所变化 (Thakur, 1999)^[10]。根据 Cardon (2003) 的研究，中小企业比成熟企业需要更多的专家和高技能工人。这表明中小企业在招聘和培训员工时，更看重员工的教育背景和技能水平，这有利于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获得创新和创造力，增强竞争力^[11]。因此，本研究选择技术人员的比例和员工接受教育的程度这两个变量作为中小企业人力资源投入的标准。技术人员的比例指的是中小企业技术人员占全部员工的比例，教育程度采用中小企业员工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作为度量标准。

2. 企业成长。我们对文献的回顾认为中小企业最重要的测量标准是销售额、雇员和市场份额。实证表明这三种成长测量标准存在强烈的相关关系 (Baysinger et al., 1982)^[12]。也可以单独使用其中某个作为成长的测量标准。雇员增长表明，企业的组织结构或策略发生了变化 (Hanks et al., 1993)，代表公司里员工数量的增加^[13]。这种变化往往是由于企业经营范围扩大或业务立即增加造成的。随着雇员的增加，中小企业要配置新的人力资本以达到目标。该企业还能够更好地评估外部环境，以确保它能够最有效地竞争。除了表明公司内部的变化外，雇员增长也是中小企业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标志。因此，本研究采用雇员增长作为衡量企业成长的变量。

3. 创新绩效。国内外大多数理论研究者使用 R&D 支出、专利数和文献量数据作为创新投入品和产出的测度来研究创新活动。作为创新措施的专利申请受到一些限制，因为并非所有的创新都是可以获得专利的，特别是对于申请专利的初创企业来

说相当耗时且通常成本太高。学者普遍认为，研发费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Heshmati 和 Loof (2006) 使用瑞典连续的创新调查数据，基于时间系列的前后向联系分析，发现 R&D 是未来利润、就业、销售和增加值等变量增长的良好预测指标^[14]。本研究采用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额比例作为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程度的替代变量，从创新投入测度技术创新。

4. 控制变量。根据创业创新的相关研究，由于公司年龄、企业规模、行业类别和企业性质对不同的中小企业具有不同的影响，尤其对不同阶段企业的能力发展演进影响更大。因此，为了更好地反映出变量间的关系，本研究将上述 4 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 模型设计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 (2004) 在系统分析、总结提出的十几种检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既可以做部分中介检验、又能做完全中介检验的检验方法，而且这种检验方法发生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总概率相对比较小，目前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5]。本文在借鉴上述检验方法基础上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1. 自变量为技术人员比例的中介效应模型设计

$$Rd_{i,t} = \alpha_0 + \beta_1 Ter_{i,t} + \lambda_1 Age_{i,t} + \lambda_2 Ass_{i,t} + \lambda_3 Indg_{i,t} + \lambda_4 Own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Emr_{i,t} = \alpha_0 + \beta_2 Ter_{i,t} + \lambda_1 Age_{i,t} + \lambda_2 Ass_{i,t} + \lambda_3 Indg_{i,t} + \lambda_4 Own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Rd_{i,t} = \alpha_0 + \beta_3 Emr_{i,t} + \lambda_1 Age_{i,t} + \lambda_2 Ass_{i,t} + \lambda_3 Indg_{i,t} + \lambda_4 Own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Rd_{i,t} = \alpha_0 + \beta_4 Ter_{i,t} + \beta_5 Emr_{i,t} + \lambda_1 Age_{i,t} + \lambda_2 Ass_{i,t} + \lambda_3 Indg_{i,t} + \lambda_4 Own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模型 (1) 用于检验技术人员比例对创新绩效的显著性检验，模型 (2) 用于技术人员比例对企业成长率的显著性检验，模型 (3) 用于企业成长率对创新绩效的显著性检验，模型 (4) 用于在控制了企业成长率的情况下技术人员比例对创新绩效的显著性检验，即检验中介变量企业成长率的中介效应显著性。其中， $Rd_{i,t}$ 表示第 i 家中小上市公司第 t 年的创新绩效水平；下标 i 表示公司 ($i \in [1,406]$)，下标 t 表示时间 ($t \in [2014,2016]$)；

Ter_{i,t} 表示第 i 家中小上市公司第 t 年的技术人员比例；Emr_{i,t} 表示第 i 家中小上市公司第 t 年的企业成长率；控制变量方面，Age 表示中小上市公司年龄，Ass 表示企业规模，Indg 表示中小上市公司的所属行业类型和 GDP 的交叉项，Owng 表示中小上市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和 GDP 的交叉项。ε_{i,t} 表示公司和时间混合差异的随机误差项。

2. 自变量为员工受教育程度的中介效应模型设计

$$Rd_{i,t} = \alpha_0 + \beta_1 Edr_{i,t} + \lambda_1 Age_{i,t} + \lambda_2 Ass_{i,t} + \lambda_3 Indg_{i,t} + \lambda_4 Own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5)$$

$$Emr_{i,t} = \alpha_0 + \beta_2 Edr_{i,t} + \lambda_1 Age_{i,t} + \lambda_2 Ass_{i,t} + \lambda_3 Indg_{i,t} + \lambda_4 Own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6)$$

$$Rd_{i,t} = \alpha_0 + \beta_3 Emr_{i,t} + \lambda_1 Age_{i,t} + \lambda_2 Ass_{i,t} + \lambda_3 Indg_{i,t} + \lambda_4 Own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Rd_{i,t} = \alpha_0 + \beta_4 Edr_{i,t} + \beta_5 Emr_{i,t} + \lambda_1 Age_{i,t} + \lambda_2 Ass_{i,t} + \lambda_3 Indg_{i,t} + \lambda_4 Own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7)$$

模型 (5) 用于检验员工受教育程度对创新绩效的显著性检验，模型 (6) 用于员工受教育程度对企业成长率的显著性检验，模型 (3) 用于企业成长率对创新绩效的显著性检验，模型 (7) 用于在控制了企业成长率的情况下员工受教育程度对创新绩效的显著性检验，即检验中介变量企业成长率的中介效应显著性。其中，Edr_{i,t} 表示第 i 家中小上市公司第 t 年的员工受教育程度，用拥有本科学历的员工比例测度。

三、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创新绩效 (Rd)	1218	5.161	4.699	0.03	46.72	%
技术人员比例 (Ter)	1218	21.975	16.203	1.42	91.77	%
员工受教育程度 (Edr)	1218	21.973	15.984	1.44	88.74	%
雇员增长率 (Emr)	1218	14.920	87.015	-82.2	2190.36	%
公司年龄 (Age)	1218	16.305	4.165	6	36	年
公司规模 (Ass)	1218	44.618	76.274	2.18	1450.71	亿元
行业与GDP交互项 (Indg)	1218	588356.2	250364.6	0	744127.2	亿元
企业所有制与GDP交互项 (Owng)	1218	552543.2	280484.3	8	744127.2	亿元

(二) 模型解析

对于面板数据，首先需要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本文在研究过

程中，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测试，结果表明 F 检验显著，固定效应模型比混合回归模型更优。Hausman 检验显著，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优，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如表 2 所示，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从模型 (1) 可以看出，自变量技术人员比例对因变量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1a 得到支持；从模型 (2) 可以看出，自变量技术人员比例对中介变量企业成长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 2a 得到支持；从模型 (3) 可以看出中介变量企业成长率对因变量创新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模型 (4) 可以看出，将中介变量和自变量都加入到回归中，

自变量技术人员比例对因变量创新绩效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时不显著, 说明自变量技术人员比例对因变量创新绩效的影响被企业成长率完全中介, 假设 3a 得到支持。

表2 自变量为技术人员比例的回归模型与假设检验

变量	模型(1) Rd	模型(2) Emr	模型(3) Rd	模型(4) Rd
Ter	41.77*** (-16.030)	-2.216*** (-0.539)		27.84* (-15.84)
Emr			-6.546*** (-1.015)	-6.288*** (-1.024)
Age	442.200 (-286.100)	4.180 (-9.615)	484.3* (-280.1)	468.5* (-279.8)
Ass	-28.85*** (-3.694)	-0.047 (-0.124)	-29.52*** (-3.612)	-29.15*** (-3.613)
Indg	-0.004 (-0.005)	0.000 (0.000)	-0.004 (-0.005)	-0.004 (-0.005)
Owng	-0.004 (-0.004)	0.000 (0.000)	-0.004 (-0.004)	-0.004 (-0.004)
Constant	-2281.000 (-1669.000)	60.510 (-56.100)	-1,495 (-1,620)	-1,900 (-1,634)
观测值	1,218	1,218	1,218	1,218
R-squared	0.084	0.022	0.122	0.125
F test	1.26***	1.17**	1.4***	1.41***
Hausman test	71.92***	14.81***	160.64***	163.19***

注: * p < 0.1, ** p < 0.05, ***p < 0.01

表3 自变量为员工受教育程度的回归模型与假设检验

变量	模型(5) Rd	模型(6) Emr	模型(3) Rd	模型(7) Rd
Edr	68.87*** (-20.78)	-2.773*** (-0.701)		51.70** (-20.53)
Emr			-6.546*** (-1.015)	-6.191*** (-1.022)
Age	332.1 (-288)	8.323 (-9.712)	484.3* (-280.1)	383.6 (-282)
Ass	-30.14*** (-3.686)	0.012 (-0.124)	-29.52*** (-3.612)	-30.06*** (-3.607)
Indg	-0.002 (-0.005)	0.000 (0.000)	-0.004 (-0.005)	-0.003 (-0.005)
Owng	-0.004 (-0.004)	0.000 (0.000)	-0.004 (-0.004)	-0.004 (-0.004)
Constant	-2,001 (-1,652)	41.630 (-55.710)	-1,495 (-1,620)	-1,743 (-1,617)
观测值	1,218	1,218	1,218	1,218
R-squared	0.089	0.020	0.122	0.128
F test	1.28***	1.17**	1.4***	1.43***
Hausman test	76.26***	15.72***	160.64***	165.74***

注: * p < 0.1, ** p < 0.05, ***p < 0.01

如表3所示,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从模型(5)可以看出,自变量员工受教育程度对因变量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1b得到支持;从模型(6)可以看出,自变量员工受教育程度对中介变量企业成长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2b得到支持;从模型(3)可以看出中介变量企业成长率对因变量创新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模型(7)可以看出,将中介变量和自变量都加入到回归中,自变量员工受教育程度对因变量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均被削弱,说明自变量员工受教育程度对因变量创新绩效的影响被企业成长率部分中介,假设3b得到支持。

四、讨论与结论

(一) 理论贡献

1. 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中小企业人力资源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是积极正向的,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影响和改变员工的态度、能力和行为,实现组织目标,并在催化和引导个人朝着创新活动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以中国上市中小企业为样本,验证了中小企业提高技术人员的比例和提高员工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提高创新绩效。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

2. 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的投入不一定对企业成长有帮助。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发挥。持有太多的资源可能导致低效,创业过程中盲目追求机会但没有控制好目前的资源也会导致失败。第二,高层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团队的心智模式也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成长速度。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在创业阶段不一定将成长作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目标,并且成长是多样化的和长期的,高层管理者也需要时间和经验整合和协调内外部资源。第三,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可能对企业生存不利。创业理论以及企业成长理论认为企业可能存在成长的局限性,在这种局限下成长可能不会给企业带来利益,反而会降低存活率。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的投入有可能在给企业带来知识技能的同时,避免或减少了成长的局限性,促进管理和创新的效率。

3. 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可能不利于创新绩效。以

往的研究显示创新和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积极的,但他们忽视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局限性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中国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认为中小企业成长速度过快可能不利于创新。可能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企业的成长需要高层管理者具有很高的管理技能和经验。增长会增加组织的复杂性,而且这种复杂性有时也是难以管理的。中小企业由于刚起步不久,这些管理协调和整合资源能力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现,尤其是追求创业绩效的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可能会掩盖掉管理上的问题,导致创新这种需要良好环境的知识财产得不到孵化。

4. 企业成长在中小企业人力资源投入和创新绩效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论证和实证,证明企业成长在中小企业人力资源投入和创新绩效中起到的是负向中介作用。理论演绎和实证表明,技术雇员和良好教育背景的雇员是中小企业重要的资源,他们的创新能力强,工作效率高,足以替代很多低技能员工,可以使机构去臃肿化,管理效率提升,有利于企业创新。

(二) 实践价值

1. 创新举措严重依赖于员工的知识,专业知识和技能承诺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中小企业比成熟企业需要更多的专家和高技能工人。随着企业进入扩张阶段,才能雇佣技能较低的工人以满足产量需求。中小企业为了在扩张阶段生存下来,企业家有必要提前做好准备。中小企业有必要在员工结构中提高技能型员工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比例,并催化和引导他们朝着创新活动发展。

2. 虽然成长对于很多企业是理想的目标,但是成长也会带来局限性,增加组织的复杂性,有时也是难以管理的。企业往往面临着关于成长速度和方向战略困境。这些困境表明成长在企业战略研究中值得考虑。中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更要重视企业创新带来的竞争优势,基于这种优势获得生存和成长。如果中小企业将创新绩效作为企业追求的目标,可以适当增加企业需要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技能型员工的比例,并且做好员工培训和绩效考核。中小企业获得宝贵的技术型和高素质的人才后,可以适当地放慢成长速度,获得管理效率和创新绩效

的提高,为扩张阶段做好准备。

(三) 研究局限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虽然本研究的假设得到数据的支持,数据样本也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可毕竟只局限于上市公司的数据,没有覆盖到未上市的中小企业。其次,数据的时间跨度只有三年的时间,相对较短,主要原因是早些年度的有些数据并未公布或不完整。本研究在这方面只是一个探测性的研究,作为创业研究的一部分,未来应该增加时间跨度,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再者,在因变量的选取上,虽然R&D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作为创新绩效的替代变量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更多人把它视为创新的投入变量。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选取其它的变量测度创新绩效,增强并深化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 [1] Fan TPC. 2010. De novo venture strategy: arch incumbency at inaugural en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1(1): 19 - 38.
- [2] Geroski PA, Mata J, Portugal P. 2010. Founding conditions and the survival of new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1(5): 510 - 529.
- [3] Madsen AS, Ulhøi JP. Technology innovation, human resources and dysfunctional integration. *Int J Manpower* 2005 26(6):488 - 501.
- [4] Weisberg RW. Expertise and reason in creative thinking: evidence from case studies and the laboratory. In: Kaufman JC, Baer J, editors. *Creativity and Reason 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5] Jiménez-Jiménez D, Sanz-Valle R. Innov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it: an empirical study. *Int J Manpower* 2005 26(4):364 - 81.
- [6] Churchill NC, Mullins JW. 2001. How fast can your company afford to grow?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9(5): 135 - 143.
- [7] Pierce JR, Aguinis H. 2013. The too-much-of-a-goodthing effect in manage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39(2): 313 - 338.
- [8] Coad, A., & Rao, R. 2008. Innovation and firm growth in high tech sectors: A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Research Policy*, 37, 633 - 648.
- [9] Coad, A. (2009). *The growth of firms: A survey of theori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10] Thakur, S. P. 1999. Size of investment, opportunity choice and human resources in new venture growth: Some typologi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4: 283-309.
- [11] Cardon, M. S. 2003. Contingent labor as an enabler of entrepreneurial growth.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42:357-373.
- [12] Baysinger, B. D., Meiners, R. E., & Zeithaml, C. P. 1982. *Barriers to corporate growth*.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 [13] Hanks, S. H., Watson, C. J., Jansen, E., & Chandler, G. N. 1993. Tightening the life-cycle construct: A taxonomic study of growth stage configurations in high-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18(2): 5-29.
- [14] Heshmati, A., H. Loof. 2006. Investment and Performance of Firms : Correlation or Causality [Z]. CESIS Working Paper, NO. 72.
- [15]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 36 (5) : 614-620.

【责任编辑:余伟】

增强青年国家认同的国际经验及反思

谢素军, 孙慧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5)

摘要: 国家认同是一个系统工程, 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更是一个实践的创新过程。基于对英美、日本、印度、新加坡等世界典型国家和地区实施国家认同的基本策略和运行机制的梳理, 发现海外国家增强青年对国家认同的实施机制存在入心、入教、入制和入俗四个共同特征, 同时也存在增强国家认同的青年方向不够明确, 大熔炉模式带来的伤害不可磨灭, 照搬模式存在水土不服等问题。但以海外为鉴, 在推动增强港澳青年对国家认同的措施上, 可以在经济、法律、政治和教育等多维度得以蓝本的映照。

关键词: 国家认同; 青年; 国际经验; 粤港澳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81-06

青年对国家的认同问题显性或隐性地发生在许多国家的大多数历史阶段, 中国港澳地区同样面临此类问题。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等因素的影响, 使得不同世代的港澳民众所遭遇的经济周期和所获得的发展机遇存在差异; 自媒体的广泛渗透, 使得青年世代的信息获取、资源动员、社会参与、网络链接等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因素都极大的影响了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回归以来, 香港、澳门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徐徐前行, 但反对之声、尤其是“港独”的声音时有爆发。特别是 2019 年 6 月以来, “港独”分子违法乱纪直至冲击立法会、香港警局及中联办等重要国家机关, 意欲组织非法“三罢”活动, 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对国家的完整统一、对“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带来了实质性的威胁, 这正是根源于青年对国家认同的削弱、误解乃至敌视。事实上, 国家各级机关从未放松对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工作开展, 但效果欠佳。那么, 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 海外国家是否有遇到同样的青年认同问题? 有哪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和措

施?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何种启示? 本文尝试从海外经验中寻找可能的答案。

一、“认同”概念的内涵

国家认同的解读纷繁复杂, 但根源在于 identity 一词, 其来源于拉丁文 idem, 意思是 the same, 简而言之就是“认为相同”的意思。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 急剧的社会变迁导致族群矛盾日益尖锐, 国民身份意识与国家归属情感出现严重危机, 奥地利的精神学派分析大师、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认同应用到心理学领域, 将其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进行探讨, 其基本含义是“认知和情感依附”^[1]。埃里克森 (Erikson) 在弗洛伊德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认同不仅是个体的, 还是群体的、社会的”^[2]。泰弗尔 (H.Tajfel) 大力提倡社会身份论, 并提出一个对社会认同研究影响深远的假设: 人们建立社会身份, 是为了透过所认同的社群提高自尊。受此启发, 学术界形成了一系列社会认同论, 这些理论的共同点

收稿日期: 2020-08-07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课题“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实施机制研究”(18BSH0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谢素军 (1983—), 男, 汉族, 湖南耒阳人,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研究中心主任, 副研究员, 广东财经大学特约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是青少年发展、社会治理; 孙慧 (1987—), 女, 汉族, 湖南益阳人,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穗港澳青年比较研究、青年就业创业研究。

在于认为社会行为不能单从个人心理素质来解释；要全面地理解社会行为，必须研究人们如何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身份。这些探索构建了国家认同基本的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认同研究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江宜桦认为，“认同通常有三种涵义：同一，确认、归属，以及赞同、同意”^[3]。沙莲香（2002）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认同“进行了界定，她认为“认同是维系人格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从而是维持人格统一性和一贯性的内在力量”^[4]。贾英健（2006）指出，认同的前提在于差异的存在，没有差异，也就无所谓认同^[5]。

综上，“认同”概念及其内涵的扩展主要有两大流源，一是心理学派的自我同一性理论，这个视角下的“认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连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二是社会学的角色理论、参照理论与符号互动论，从这个视角来看，“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所有的认同都是“意义的建构”^[6]。本文从青年视角出发，结合两大流源的定性，认为青年对国家的认同应该是社会行为和心理归属的统一，具体表现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倾向，个体行为和群体运动的方向。

二、增强青年国家认同的海外模式

基于建国历史和地区冲突，以及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原因，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增强青年国家认同的路径机制特征分明。欧美国家较具代表性的国家为英国、美国和德国，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凸出的代表为日本、印度和朝鲜，新兴国家和典型地区则更具现代性，我们重点关注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增强青年国家认同的路径和实施机制方面颇具特色，值得分析探讨和比较借鉴。

（一）以英国、美国等为代表的欧美国家的经验

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社会。在联合王国构建的历史进程中，以“不列颠”这一国家身份和民族历史的共享符号整合各民族，实现了整个王国的身份认同。二战后，苏格兰、北爱尔兰等各民族的自我认同不断强化，对“不列颠”这一国家认同

形成巨大挑战，造成重大冲击^[7]。英国面对国家分化的挑战，最成功之处便是宪政改革，推进权力下放，即将权力从威斯敏斯特议会和中央政府分散到各地方议会、政府的纵向放权行为，允许相关方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治的方式，从而增强国家的合法性。面对独立运动威胁日益凸显，英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扶持政策，为了加快“苏格兰硅谷”的经济发展，采取增加投资、实施优惠税收政策、增加文化活动拨款等一揽子政策，从而拉动青年就业，凸显对苏格兰文化的重视，增强苏格兰对英国的认同。

美国为了更好的构建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认同，自独立以来不断调整国家的民族政策，重点针对青年群体实施。而为了塑造外来移民的“美国特性”，美国强力推行文化同化政策，要求外来移民必须放弃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与文化，强制接受以英语为基础的白裔文化，即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化，后来同化政策逐渐演变成“熔炉政策”。美国最为成功的则是提出“美国信念”，强化对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的信奉，其具体内容体现为《独立宣言》和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包括“个人的尊严，人人平等，人人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公正，机会均等”，后来发展成为一整套普世的思想原则：自由、平等、民主、立宪主义、个人主义等，以及体现这一思想和原则的政治和社会制度^[8]，并以此确立了“美国梦”。美国获得独立后，源源不断的移民涌入美国“寻梦”，而通过美国化运动，移民逐渐融入主流文化，只要恪守美国身份的主要标志，亦即认同普世性的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原则和政治理想，就可以成为美国人。总之，美国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不断灌输“美国信念”，树立整个美国共同价值理念，坚定了他们作为美国人的自信心，特别强化了美国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

事实上，在增强国民尤其是青年的国家认同工作方面，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也比较典型，除了意识形态、法治制度等路径，其他一些创新的内容和形式也值得关注，如德国推崇的“青年历史观”，极大提升了青少年对国家的认可度。法国推行的“青春纪念册”通过引导青少年群体近距离了解马奇诺防线、诺曼底登陆等具有国家意义的实景故事，影响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投身国家建设。瑞典则将国

家认同与城市认同紧密结合在一起, 将国家认同融入青少年对祖国山河风景的热爱之中。

(二) 以日本、印度等为代表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验

日本由“百余国”到“三十国”再到大和政权的建立, 无疑是一个由分散到统一的历史的进步。为了支撑国家政权的稳固, 日本开始寻求构筑国家统一体的国民认知的方法, 就是构建以“天皇”为核心的认同体系。在这一过程中, “氏神”作为氏人最高的精神权威, 首先被统治阶级所关注, 天皇皇室势力开始收集和编撰各氏族的氏神传说, 并将各其他氏族的氏神和自身的祖先神“天照大神”进行联系, 而“天照大神”被塑造为主神形象, 以此形成有利于天皇皇室自身统治的神话体系。从早期的大和政权、大化改新到近代的明治维新, 日本政府都在塑造着统一、神圣的天皇身份以及国家认同。早期日本的国家认同教育就是基于同宗理念, 通过观念上的同一化来实现整个社会的统一。二战后, 日本国家认同教育模式转向了直接的国家认同, 更多地关注本土、本国、本国公民, 更多地本土化使得政府、民众必须去认清自我的定位, 更好地实现自主发展。日本开始有意地摆脱完全的西化教育、美式教育^[9], 开展了以日本为核心、日本本国发展为目的的全新教育发展战略。此外, 日本在构建国家文明体的过程中将自身的独特性和文化的极优性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还充分利用天皇的作用, 使内向求同愈发深入, 重点寻求战后日本海洋国家认同的架构, 一方面吸取战争失败的教训, 另一方面通过民族文化来促进民族复兴, 不断加强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 美丽日本、强日本等概念相继风靡全国。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 塑造统一民族的国家认同显得尤为重要。为了降低多民族文化认同倾向, 强化统一国家认同, 印度联邦强调国家一体化, 灌输统一国家理念, 塑造统一民族和国家文化的认同, 实行“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政策, 试图建立一个统一或单一的“印度民族”国家。最典型的做法就是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 凝聚少数民族中的落后阶层, 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国家和民族认同, 削弱了分裂群体的力量。印度政府试图推动印地语

国语化, 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是印度在宪法中明确规定, 将英语确立为官方语言, 印地语确立为国语, 孟加拉语等十多种小语种可以作为地方城邦的官方语言, 并承认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化保留和发展的权利, 明确了语言的平等地位。印度政府在语言上采取了中庸之策, 所有的民族都可以在语言上产生交集, “三种语言方案”照顾到了大多数人, 而逐步落地的“印度普通话”也顺利推广, 印地语在不断加强并形成认同感^[10]。总而言之, 印度联邦推进的国家认同教育有其独特内容、方法和经验。一是规定认同教育的刚性目标和任务。印度联邦通过立法, 刚性规范认同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为教育机构落实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认同教育提供法律化的刚性制度支撑, 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为社会和国家服务的好公民。二是构建国家统一认同教育的有效机制。印度联邦通过设置一系列的基础教育课程进行国情与爱国教育, 使每一个公民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国家, 增强其对国家统一认同重要性的教育感知。三是运用国家认同教育的各种资源。印度联邦一方面运用大国主义思想催生印度民众统一国家的自豪感、荣誉感和使命感, 以大国主义精神推动印度统一国家文化认同的构建。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大多经历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害, 虽然国家历史悠久, 但在近代史上重新走向独立却历经劫难, 再加上近年来西方文化的入侵, 青年的国家认同状况不容乐观。日本和印度作为两个不同发展背景的国家, 在构建国家认同的举措方面各具特色, 东南亚诸多国家所推出的机制策略也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另外,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国家, 处于东亚一隅的朝鲜, 该国通过带有宗教信仰特色的国家崇拜和伟人崇拜机制形塑青年国家认同感, 经过数十年的培育几乎形成一套完整的信仰崇拜体系, 并配以严苛的管教体系, 虽然看似实施效果显著, 但其未来发展和国家影响值得后续关注和思考。

(三) 以新加坡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典型地区的经验

新加坡是一个种族、语言、文化错综复杂的典型的多元性质移民国家, 但很好地实现了多民族混

居、多民族共学、多民族共进的新加坡共同体建构,成为全世界解决多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典范。新加坡国家认同的成功经验,得益于其立足国情,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家认同的基本策略和运行机制,实现国家认同的构建模式由“制度认同”向“文化认同”、动力机制由“外生”向“内生”、价值理念由“共存”向“一体”的嬗变^[1]。此外,新加坡针对青年群体推出打造“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意识计划,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积极确立和弘扬本国核心价值,构建共同的国家认同,基本实现了国内各种族和谐共处、各宗教宽容共生的社会和谐状态。具体举措有:一是强化共同价值,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主,和谐共处。二是独辟蹊径宣扬东方文化的复兴,确立新加坡人的价值和地位。三是强化国家认同的教育,在学生群体中特别提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口号,明确“我是一个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同时发布了《理想的教育结果》,把培育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操,作为新加坡教育的首要目标。

典型地区还有中国台湾(地区)、以色列等。以以色列为例,以色列建国之初便倍感国之于家的意义,虽然没有明显的增强青年国家认同的政策措施,但其所渲染的历史环境、地区环境、政治环境乃至战争环境之中一直将浓厚的国家意识贯穿于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以色列特别重视强化海外族人的同宗同族意识,并不断通过经济和科技影响力提高国家的凝聚力和召唤力。

三、青年国家认同问题的反思

尽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增强青年国家认同的实施机制方面措施不同,手段不一,实施的效果不尽相同,但都有着高度一致的目标和方向。在这些增强青年国家认同的措施背后,存在一系列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 海外增强青年国家认同的共同经验

从海外国家和地区纷繁复杂的具体实施机制中可以归纳出几个共同的关键词:入心、入教、入制和入俗。入心即紧紧抓住国民心态尤其是青年意志。群体心态和意志的形成往往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

现实基础,国家在制定提升青年国家认同的机制时,不同的国家会基于其国情和社会背景去实施。入心的关键点在于价值培育和经济支撑。在主流价值的培育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推崇西方式民主和自由意志,并将这种价值贯穿于国家发展之中以规范国民行为。而亚洲发展中国家则更倾向于培育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的“家国”意识,将国家摆在第一位。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强自身合法性,通过提升整体经济实力来获得民心支持。入教即将国家认同融入国民教育体系。虽然各国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不同,但在培养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方面,其教育的本质和目的高度一致,即对国民进行全面地价值观引导和灌输。入制即进行增强国家认同的机制制度建设,其目的除了引导普通的国民热爱国家之外,更重要的功能是对不具认同感的群体进行规范及惩戒,入俗则是将国家认同与民风民俗融于一体,由于各国和各地的风俗人情不同,宗教信仰相差甚远,于是,通过仪式、歌曲、舞蹈,以及地名的确立、故事的创造等融入到风土人情的国家认同教育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宗教发展的方向引导,因而引导风俗民情是影响力最为广泛的一种手段。

(二) 海外增强青年国家认同实施机制的弊端

尽管海外国家在增强青年国家认同的路径和措施上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解决认同问题,甚至衍生出新的国家认同问题。其一,增强国家认同的青年方向不够明确,虽然各个国家在增强民众国家认同的措施上都将青年涵盖在内,但都欠缺针对青年群体的指向性政策措施,而是以区域为重心,以政治为导向,多数处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阶段,而未能真正意识到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其二,大熔炉模式带来的伤害不可磨灭,无论是语言、文字、文化还是种族、宗教等,基于某种大一统的方向去推动政策,即便最终取得了大多数的认同,也难以对少数的反对派形成影响力,况且还会破坏、摧毁部分有价值的文化记忆。其三,照搬模式存在水土不服问题,国家认同所面临的问题永远处于变化状态,尤其是政治模式的效仿,如印度在政治上大张旗鼓推进改革,加快实施议会民主制、选举制、多党制,这对印度的民主氛围营造确实起到了效果,民众的政治参与度空前提

升, 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也迅速得到巩固。但在触及到深层次问题时存在弊病, 尤其是民族政策的不完善导致后期民族问题日益突出, 助长了少数民族的分裂情绪, 以及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 事实上不平等等问题严重, 给印度国家认同带来巨大隐患^[12]。最后, 伴随历史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最终得以存续的永远是进步的、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能够给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认同体系, 尤其对青年国家认同感而言, 最终的落脚点一定是对价值、文化、自身和未来的认同。

(三) 海外经验对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启示

不论是英国的宪政改革、“美国信念”的确立, 还是亚洲国家“家国”意识的构建, 其本质都是以培养公民意识为核心。可以说公民意识是国家认同的基础, 它有效解决了多民族、多种族历史背景下国家认同的重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对于增强中国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实施机制而言, 不同国家成功的制度和措施可以提供技术性的参考, 但这些机制措施背后的特征和内涵才是最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内容, 只有真正了解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群体所思所想, 摸清楚这些青年群体所处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 才能探索出契合发展实际的道路。中国作为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其民族、历史、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在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路径方面应充分考虑“一国两制”的基本国情, 借鉴海外有关增强国家认同的有益做法, 同时凸显自身优势,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增强国家认同模式。

首先是经法层面。在经济层面, 建议以新加坡为参考, 香港亟需立足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去寻找新的发展点, 湾区发展不仅带给港澳青年发展的机会, 也使港澳在内地青年的眼中更具有吸引力, 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有助于增强港澳青年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认同感。由于港澳和内地的制度不同, 在语言、法律、生活、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如何在“两种制度”下实现跨境协调, 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 这是湾区最大的挑战, 也是国家战略规划需要谨慎做出的抉择。在法律层面, 由于法律本质上和经济密切相关, 因而弥合港

澳和内地法律上的分歧和差异对于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成立粤港澳自由贸易仲裁中心, 创新争端解决和调解机制, 拓宽经济纠纷解决渠道也是完善法律保障机制的重要举措。三地司法资源和司法信息应该共享, 三地政府可以加快建立资源共享中心和司法信息分享机制。另外, 要尽快统一地区行业标准和认证标准, 在经济贸易、环境保护、土地产权、劳工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实现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全面对接, 打造一支有政府资源、有香港专业机构、有市场资源参与、分工明确的工作团队, 为推动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提供优质服务。

其次是政治层面, 本土主义由相对和平的公民抗命走向暴力化的社会抗争甚至港独, 与政改失败给香港人带来的普遍政治挫折感、对中央的不信任感以及对未来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维系的恐惧感有关。建议以印度为借鉴, 以循序渐进的民主发展最大化压缩本土分离主义的政治空间和生存土壤, 最大化争取香港青年世代的转向与认同。民主是香港社会与法治并列的核心价值观, 也是传统泛民的核心政治立场。在“一国两制”之下, 需要理解内地与香港政治发展阶段及政治价值观的基本差异, 通过兼顾国家利益及地方民主发展, 实现“一国两制”的与时俱进以及对香港的宪制整合。体制内发展民主也是一种关键性的政治吸纳机制, 可以有效拆解泛民与青年本土派的政治捆绑, 分化分解反对派的阵营与力量, 促成有利于特区繁荣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形成。

再次是教育层面, 以日本为参考, 除了做好教育的顶层设计, 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循序构建新的教育体系。在学校、社区培训机构等教育领域加强对国歌、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符号的宣传和推广; 在政府有关课程设置等教育导向中突出强调国家地位, 将国家认同教育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巩固并扩大“爱国爱港”学校的比重, 引导学校在教学环境中通过升国旗、唱国歌、讲授普通话等形式营造有利于提升国家认同情感的氛围; 选好配齐公民教育课程师资, 由于公民教育的课程体系具有专业化、连贯性、体系化等特征, 而目前存在的专职教师配备不足、代课老师流动性大等问题, 影响了国民教

育和公民教育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政府要摸清师资配备的底数,加强对国民教育、公民教育的资源倾斜;探索建立全社会协同推进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体系,通过资源倾斜、政策扶持、资助计划等壮大“爱国爱港”团体力量,推动全社会形成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良好环境。

当然,除了经济、法律、政治、教育等方面,文化、社会参与、青年心理等诸多影响青年国家认同的因素都有待排摸和探索。港澳青年国家认同危机并非偶然突发,其有深层次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更有海外势力长久以来的侵透和策反。面对危机,通过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并不能一劳永逸,攻心和收心才弥足珍贵,学会以史为鉴、以邻为鉴才是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 [1] 张文宗. 浅析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国家认同[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6).
- [2] 刘娜. 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民族发展政治理路解读[D]. 中央民族大学, 2007(07).
- [3] 江宜桦.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 台北: 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 [4] 万斌. 大学生国家认同研究[D]. 浙江大学, 2014(06).
- [5] 贾英健. 认同的哲学意蕴与价值认同的本质[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01).
- [6] 郑航. 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教育[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
- [7] 陶翀, 饶从满. 英国人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公民教育: 作用考察与背景分析[J]. 外国教育研究, 2018(06).
- [8] 王立新. 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J]. 历史研究, 2003(08).
- [9] 徐建新. 东亚国际关系背景下琉球(冲绳)的国家认同[J]. 外国问题研究, 2018(03).
- [10] 李艳平, 亢升. 印度国家认同教育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16(08).
- [11] 张利国, 郭立强. 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历史演进及启示[J]. 理论导刊, 2017(03).
- [12] 左岫仙, 吴天喜. 印度国家认同的建构措施: 问题与启示[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10).

【责任编辑: 温开照】

华侨博物馆在侨务工作中的作用研究

亓延坤

(广东华侨博物馆, 广东 广州 510105)

摘要: 作为承载华侨华人历史文化集体记忆的载体, 海内外共有 60 余家涉侨类华侨博物馆, 主要分布在美洲、东南亚、欧洲等国家和中国广东、福建等省份。华侨类博物馆作为集中展示研究华侨历史文化、反映侨胞精神的文化家园, 应积极适应和融入新时代侨务工作格,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立足弘扬华侨历史文化, 凝心聚力, 主动作为, 在持续进行征集、收藏、展示、宣传、利用、研究华侨历史文化资源, 接待海内外观众及侨胞, 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合作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更好发挥统战宣传平台作用。

关键词: 华侨博物馆; 统一战线; 侨务工作

中图分类号: D6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87-0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血脉, 是广大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 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 在传承中华文化、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华侨博物馆作为特殊的博物馆, 记载着广大华侨华人的血泪史、奋斗史和慈善的历史, 沉淀了千百年来海外游子在异国他乡千回百转、荡气回肠的历史记忆, 在弘扬侨胞精神, 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 并通过文化认同, 增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 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华侨博物馆的地位和作用

(一) 博物馆在文化沉淀、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

2015 年 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博物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 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 让历史说话, 让文物说话, 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

时, 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 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

2018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对发挥博物馆等各类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同时也为博物馆等各类公共文化机构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1. 博物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 各级政府部门要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将文化传承作为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环节, 有计划、有目的地注入社会资源, 厚植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优势, 在整个社会层面构建起现代、高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场所, 并利用这些馆藏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文化, 成为链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特别是其丰富的馆藏历史文化资源, 更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资源。博物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收藏、陈列展览、学术研究、宣传教育、文

收稿日期: 2020-09-04

作者简介: 亓延坤 (1982—), 男, 汉族, 山东莱芜人, 广东华侨博物馆文物博物中级馆员, 研究方向: 华侨华人历史与文化, 华侨文博。

化交流等工作,实质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体现,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博物馆的藏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博物馆之中的藏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并通过不同的形式,展现出自然和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以及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是人类智慧成果最为直接的表现。

3. 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博物馆是公众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关注最新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感知古代文明最直接的文化机构,博物馆文物展览面向社会公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展现的重要途径。

(二) 华侨博物馆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1. 推动中外文化传播交流。华侨博物馆分布广,特色显著,优势明显,在当前华侨文化建设和人文交往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据统计,截止至目前,全世界已开放各类涉侨华侨博物馆近70家。华侨博物馆与海内外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相比,虽然总体上规模较少,文物藏量不大,陈列水平参差不齐,但由于能有效彰显华侨的功绩,弘扬华侨的文化和精神,推动中外文化的传播交流,能让居住国政府人民透过文物展品了解华侨华人历史,客观公正地去看待华侨华人,营造有利于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良好人文和社会环境。

2. 联系华侨华人的“精神家园”。华侨历史文化是华侨华人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也是当前侨务部门开展侨务文化工作,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贡献的重要文化资源。起到发挥华侨博物馆建设华侨文化阵地,打造华侨华人的“精神家园”,保护好华侨华人的“文化之根”的作用。

3. 增强华侨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发挥华侨博物馆的文化纽带作用,增强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及对祖(籍)国的向心力。华侨博物馆展示和研究的历史文化是华侨华人连接祖籍国历史文化的天然纽带,是侨务部门与华侨华人建立文化联系、争取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许多侨胞在对照自身家族历史的过程参观华侨历史陈列后,充分表达

了了解自身历史文化的收获和愉悦,及作为炎黄子孙的自豪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因此,侨务部门可利用华侨博物馆,对华侨华人开展中华民族及华侨历史文化的宣教工作,建立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4. 推动世界文化繁荣发展。发挥华侨博物馆开展中外人文交流的平台作用,积极推动文化繁荣和多元文化发展。中国人移民历史悠久,华侨华人分布广泛,华侨历史文化多样性、开放性等特点,形成了华侨博物馆文化观念和建馆理念的开放性,这使得华侨博物馆不仅是展示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也是推动不同种族和文化观念的人群了解华侨历史,展示自身文化,并开展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场所。发挥华侨博物馆在公共外交方面的窗口作用,为树立我对外良好形象和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服务。华侨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机构,面向世界各国观众开放,能对观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海内外观众包括外籍人士通过华侨博物馆的展示和服务,在获取有关华侨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必然获得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价值理念及文化观念等信息,潜移默化形成关于华侨及中国关系的正确观念。

(三) 华侨博物馆在凝聚侨心中的核心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丰富的侨务思想,对于推进我国侨务理论研究和侨务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主席对海外侨胞的地位、作用以及侨务工作的重要作用、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论述。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对于总结和丰富、完善中国侨务理论,深刻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施“一带一路”构想;深刻理解“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深刻理解侨务工作、侨联工作、统战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最广泛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集中侨智、发挥侨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集中收藏展示华侨精神,致力于打造侨胞精神家园,为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新时代海外统战工作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做出

应有的贡献，这是华侨博物馆在凝聚侨心中的核心地位。

二、广东华侨博物馆建设的做法和经验

(一) 征集和收藏华侨历史文物与文化文献资料。目前广东华侨博物馆馆藏文物藏品1万余件(套)，其中涉侨文物7000余件(套)，涉及40几个国家和地区，团体和个人300余个，以纸质文献资料为主，华侨实物为辅，95%以上为华侨、华人、华裔、归侨、侨眷、侨务干部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无偿捐赠。捐赠馆藏文物呈现出数量大、种类多、范围广、可持续捐赠、历史及文物价值较高等特点。

(二) 陈列展示华侨历史文化，弘扬华侨精神，传承教育后代。

广东华侨博物馆已成为展示侨务工作、弘扬华侨精神的重要阵地和平台，各级领导、各国侨领、侨胞、各地侨务干部及相关部门了解广东侨务工作的一扇窗口。各级领导充分肯定，外国友人高度赞誉，家学者认可，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归侨侨眷深受感动，侨务工作者深受教育。成为帮助华裔青少年寻根、学习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接待了大批海外华裔新生代青少年参观，“中国寻根之旅—华裔青少年夏冬令营”营员每年夏季和冬季都走进我馆，学习了解广东华侨历史和华侨文化。参观结束后，大家都口述笔写纷纷表达了“欣慰”“感动”“骄傲”“一定再来参观”等感动之情，寄托了深情厚意和恳切鼓励。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直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活动基地。分别向省文明办、省直关工委申报“第四批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直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活动基地”，致力于打造开展教育的良好平台，被授予“省直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活动基地”牌匾。成为社会大众学习了解华侨历史与文化的课堂。社会观众是接待对象的最主要来源，开馆以来接待了大批社会观众前来参观，接待服务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此外，还努力构建与侨务、教育、旅游等部门及同行合作，力争成为展示广东华侨历史的文化名片。多次举办涉侨专题展览，弘扬华侨文化，提升知名度。开馆以来，先后举办了《庄世平光辉事迹展》、《赵泰来捐赠藏品展》、《馆藏

书画和李炳源捐赠文物展》、《辛亥百年 华侨丰碑》专题展、《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专题展等多个涉侨或文化艺术专题展览，弘扬了华侨历史与文化，提升了广东华侨博物馆知名度。

(三) 开展华侨历史与文化研究。

1. 完善馆藏图书资料室建设。重视馆藏图书资料室及阅览库建设，目前馆藏图书期刊近万册，进行分类整理，规范图书借阅与登记程序，充分发挥馆藏图书对开展华侨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支持作用。

2. 举办侨博讲堂。“侨博讲堂”是广东华侨博物馆在广东省委统战部的关心和指导下创立的工作品牌，创立以来得到了侨界、社会团体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并成功举办多期，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2019年广东华侨博物馆举办了“广东华侨华人与新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专题展”等涉侨展览，为侨胞和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

3. 申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课题。为进一步发挥华侨博物馆的功能作用，服务侨务文化工作，广东华侨博物馆先后申请参与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年度课题、中国侨联年度课题、黄埔军校同学会课题等，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4. 开展学术研究。鼓励馆员积极撰写发表华侨历史与文化学术论文，提高研究水平。为进一步提升广东华侨博物馆研究水平，扩大影响，广东华侨博物馆工作人员纷纷撰写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学术会议，这对提升广东华侨博物馆华侨历史与文化研究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四) 加强对外联系与宣传交流，成为展示广东历史文化名片。广东华侨博物馆加强华侨文博交流，广泛征集文物，积极做好网站管理和维护工作，提升对外影响力。与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华人世界》栏目合作拍摄《华人世界之华人足迹》系列华侨专题片。与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积极招募志愿者。与广东省学前教育学会建立联系，努力打造学前教育基地。

三、促进广东侨务工作的对策建议

广东是全国侨务大省，海外侨胞众多、侨务资源丰富是广东的重要省情和独特优势。广东华侨博物馆植根于侨务大省，拥有丰富的华侨文博资源，是全国第一家省级华侨博物馆，以服务国家、服务侨胞、服务社会为宗旨，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华侨华人历史文化和侨乡文化于一体，具有鲜明的“侨”特色和独特的“侨”优势。借鉴广东华侨博物馆的经验做法，新时代侨务工作应该从以下方面发力。

（一）提升涉侨陈列展览水平。以广东华侨历史陈列为重点，不断深入完善提升陈列展览水平。在办好基本陈列的同时，广东华侨博物馆应充分发挥侨文化特色，独立主办或与社会进一步合作举办高水平的涉侨文物展、图片展、文化艺术展等专题展览。

（二）以弘扬粤侨精神为抓手，凝聚侨心侨力。2012年，广东省侨办发起了“粤侨精神全球大讨论”，提炼出“念祖爱乡 重信明义 敢为人先 团结包容”的粤侨精神。可发挥广东华侨博物馆作用，进一步宣传弘扬粤侨精神，凝聚侨心侨力。

（三）以宣传侨法为切入点，涵养侨务资源。利用法律宣传周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涉侨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活动，提高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护侨意识，在全社会营造知侨、爱侨、护侨的良好氛围。让广大归侨侨眷、华侨华人知晓我国我省对他们的各项保护制度，感知祖国对他们的关怀，涵养侨务资源。

（四）以宣传教育为媒介，提高社会影响力。一是密切与媒体合作，宣传报道华侨文博事业。二是利用网站与微信公众号平台，全方位报道华侨文博情况。三是开展宣传教育，发挥社会教育功能。

宣传教育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能，也是政府赋予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作为华侨专题博物馆，应以向海内外社会宣传华侨历史文化，彰显华侨丰功伟绩，弘扬华侨精神，推动华侨文博建设为宗旨，以侨为桥，以馆为管，以史为鉴，以物感人，以情动人，达到知侨、爱侨、为侨的宣教目的。

（五）以征集文物为基础提高研究利用涉侨资源水平。广东华侨博物馆收藏研究工作从无文物、无库房、无人员基础起步，经过多年努力，广东华侨博物馆馆藏文物、书刊和艺术品1万余件（套）。主题陈列展示文物藏品1700余件（套），充实了陈列内容，用文物讲述华侨历史，提高了观赏性。利用好文物是办好主题陈列的重要条件，用心用情用力是做好收研工作的重要前提。作为华侨专题博物馆，华侨文物资源在于侨胞，只有用心去做、用力实干、以情感人，才能赢得侨胞的心，才能获得侨胞捐赠，才能把侨胞捐赠的资金和文物使用好、利用好、保护好。

（六）以加强管理为手段，提升侨务工作后勤保障水平。广东华侨博物馆在抓好馆舍装修陈列布展的同时，高度重视管理制度建设，建立起适应馆情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为正常运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当前，中央已吹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号角，广东省也在全面实施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华侨文博事业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期。新时代，华侨博物馆已成为博物馆行业发展的新亮点，发展华侨文博事业，服务侨务工作大局，已成为各地共识和侨务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亦是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同园共享中国梦的重要平台和抓手。

【责任编辑：张山】

新时代做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 路径选择及思考

杨光, 陶杰

(大连理工大学党委统战部, 辽宁 大连 116023)

摘要: 本文从改进与创新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 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出发, 探讨了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 分析当前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初步提出新形势下改进与创新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

关键词: 高校; 党外知识分子; 思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91-04

高校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窗口和重要领域, 是党外知识分子的聚集地, 是统一战线各方面代表人士的重要源头。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数量众多、层次较高、联系广泛、影响力大。做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把他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 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 对高校创新发展、加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对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发挥和统一战线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多年来高校党委突出思想政治引领这个中心, 强化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 充分激发党外知识分子的内生动力, 把党外知识分子广泛团结在党的周围。高校在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也在发生着变化, 如何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探索出符合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思路、新途径, 进一步提高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就成为了高校统战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

政治工作的价值意蕴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内容丰富, 其中做好其思想政治引导是基础、是“生命线”。“心相通, 方能行相随”, 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导, “即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内,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武装统战成员的头脑, 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引导统战成员正确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 采用多种形式调动统战成员的积极性, 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

1. 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 是实现党外知识分子所肩负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为己任, 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和崇高理想, 追求“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一代代爱国报国的知识分子将聪明才智赤诚奉献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追求之中。新时代赋予了当代知识分子新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向他们提出了自强不息的要求, 殷切希望他们能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开拓进取、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为国家、民族、人民的未来努力奋斗, 为人类的美好前途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

收稿日期: 2020-08-20

作者简介: 杨光(1973—), 女, 大连理工学院党委统战部干事, 讲师; 陶杰(1970—), 女, 大连理工学院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人数最多的党外知识分子群体，同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已经或正在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做着贡献。更好地调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引导他们在奋斗中砥砺爱国之情担当之志是新时代做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

2. 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是对复杂多变国际国内环境的需要。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下历史交汇期，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国际环境总体稳定，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继续深入，各项建设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凸显，许多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国际国内发展环境错综复杂。面对多元文化、价值的冲击，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群里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加以甄别和重视，注重加强对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引领。

3. 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是适应当前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群体新变化的需要。

党外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新形势下，党外知识分子队伍构成更加多样。高等学校党外知识分子密集，是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阵地。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数量多、层次高、对党和国家认同度大，他们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党外知识分子群体也出现了许多新特点，他们具有高学历、高职务、高职称，独立自主和自我意识强，积极进取，事业心强。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日益显著，伴随着各种思潮和观念的冲击，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倾向。因此，新形势下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导工作就成为目前高校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4. 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是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的需要。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人数众多，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一半左右。他们工作在教学、科研、管理第一线，其中不乏有学术骨干、优秀专家、学科带头人等，是高校教学、科研、管理的重要力量。坚持立德树人，完成好“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高校的根本任务。高校要动员、依靠包括党外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党外知识分子作为学校各项工作的重要力量，其思想政治状况如何，是否发挥了应有作用，形成发展合力，直接影响着高校的改革水平。

二、当前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强化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导是做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主线。经过长期的努力和实践，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以及当前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行为的变化，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新情况，存在实效性不高、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1. 重视程度不够，工作机制体制不健全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大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一门有对象、有理论、有规律的科学体系。”^[2]新时期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特点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决定了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但在目前高校统战工作实践中存在对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不够的现象。高校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比较重视，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建设重视得不够。一些统战干部、党外知识分子在认识上存在偏差，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虚”“空”“软”。在具体工作中存在“重业务轻思想”、“重使用轻培养”现象。在基层，针对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还没有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体制，没有一套完整的有章可

循、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致使工作缺乏组织保障,没有专门的党外知识分子思政工作队伍,没有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细则及评价体系。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地位被动。

2. 内容手段落后,工作针对性实效性不强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高校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多年来,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工作方法和载体形式,但就其中思想政治工作而言,存在内容形式手段落后问题。主要表现在,教育内容较为匮乏,缺乏系统性、针对性,还不能与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实际紧密结合,存在大而化之、甚至流于形式的“空对空”现象。教育方式呆板、方法老套、形式较为枯燥,不少还停留在开大会、作报告、读报纸、发文件、座谈、上课、参观等较单层面上,缺乏互动、吸引力,实效性不强。这种单向灌输式的工作方式方法不能够表现思政学习灵活性的一面,难以引起党外知识分子的学习兴趣。导致党外知识分子对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高。

3. 统战干部队伍力量薄弱,统战工作者人格魅力有待提升

目前高校统战专职干部队伍的整体情况是人数偏少、年龄偏大。在党外知识分子主要分布区域的院系、部门等单位,兼职统战干部队伍力量薄弱,往往身兼数职,很难在统战工作上投入更多。面对庞大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开展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思想政治引导,高校统战干部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此外,高校统战干部做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还有待于提升。一些统战干部忙于事务性工作,缺乏学习的主动性,自身在理论素养、专业知识、沟通交流上不能与时俱进及时更新,工作方式方法墨守陈规,在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上,工作没有底气,不敢做、不会做,导致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落实、落地、落细开展。

三、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引领实效的路径分析

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

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还要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这是我们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遵循。

1. 提高思想站位,把党外知识分子思政工作摆在基层统战工作首要位置。

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是高校统战工作的核心。高校党委要深化对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认识到新时代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首先要着眼凝聚人心,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导,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坚持党的领导,抓好思想政治引领,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帮助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把个人理想融入共同理想,把个人追求融入共同梦想。团结引领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2. 以因人制宜、分类施策为路径,提高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实效。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构成多样化的特点。党外知识分子队伍构成也更加多样。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中,包括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有功成名就资深专家和著名教授,也有初出茅庐蓬勃向上的优秀青年;有在行政管理岗位踏实奉献的行家里手,有在教学科研第一线默默耕耘的辛勤园丁;有在海外多年学成归国的海归人才,有在国内茁壮成长的本土人才等等。不同类型的党外知识分子的培训需求是不同的,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要求“需要针对不同特点分类施策”。体现在基层实践工作中,要求我们对党外知识分子“分群分级分类”,调整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角度和表达方式,坚持“对症点穴”、“投其所好”、“满足所需”,对党外知识分子实行个性化、差异化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思想政治工作载体能够为广大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所认可和接受,促使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落到实处。

3. 加强组织建设,夯实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

政治工作基础。

毛泽东曾说过，组织起来“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高校在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统战团体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党外知识分子对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发挥党派基层组织、统战团体在教育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方面应有的作用。大力加强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自身建设，提高“五种能力”。支持民主党派“自觉、自主、自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学校实际适时成立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党外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留学人员联谊会、侨联等统战团体，充分挖掘各统战团体的统战性、知识性、服务性、联谊性等功能，使其成为党外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展示风采的舞台，成为沟通事业、联络感情、交流信息的平台”。使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各统战团体成为学校党委与党外知识分子联系交流的桥梁纽带。发挥它们的平台辐射作用，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全覆盖。

4. 强化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做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任务应该是也必须是多层次的，必须根据具体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的实际，确定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思想工作的具体任务。”^[3]做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就是要掌握、了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实际，结合党外知识分子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基层统战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要主动关心了解党外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所盼，及时掌握他们关心什么、需要什么，全面评估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观念取向。准确把握新时期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特点。要深入基层，深入党外分子群体之间，针对党外知识分子思想状况进行专题调研，了解新情况、新问题，掌握第一手资料。分析研究新形势下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新时期做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的新途径、新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追求与解决党外知识分子现实思想实际有机结合起来。

5. 创新教育载体，丰富教育内容，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时而新”。时代在前进，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也在发生着变化，这都要求新时期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传统采用的“我说你听”单向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已经不适应新时期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特点，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不能充分发挥他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动性、参与性，亟待改变。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要坚持引导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丰富教育内容。在传统的时事政策学习解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领悟学习基础上，引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深入开展世情国情教育，加强典型教育引领。创新教育载体，在已有的校内教育培训，依托社会主义学院专题培训等载体基础上，积极探索搭建党外知识分子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教育培训平台载体，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打造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新平台。

6. 重视人文关怀，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温度。

现代社会竞争加剧，每个人都在承受着种种压力。高校教师面临着科研压力职称晋升压力生活压力的多重重压，据2018年麦可思大学教师生存状况研究显示，“大学教师周均工作48小时，88%的被访大学教师感到工作带来了中重度压力”^[4]。这要求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要较过去，更加关心、呵护他们的心理需要。要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尊重党外知识分子的人本诉求，重视其思想层面的教育引导，同时也要在学习、工作和生活层面主动关心、了解他们的心声、需求，力所能及提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在润物细无声中温暖党外知识分子的情感，唤人心、暖人心，才能聚人心。建立完善党政领导干部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制度，创造彼此尊重、互相信任的良好环境，坦诚相见，以心交心，赢得党外知识分子的充分信任，不断增进政治共识。

参考文献：

- [1] 杨德映.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导工作现状与对策研究[D].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7.
- [2] 陈万柏, 张耀灿.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 北京: 高等

- 教育出版社, 2007.
- [3] 徐晨光. 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创新研究 [M].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2.
- [4] 大学教师生存现状 [EB/OL]. http://www.sohu.com/a/252932928_484992. 2018-9-10.
- [5] 徐以师.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现状与对策思考[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0, (05): 39-41.
- [6] 刘谋. 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03): 98-102.
- [7] 王兰惠, 赵跃先. 努力提高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8.41(06): 50-53.
- [8] 张彩云. 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研[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 (104): 55-57.
- [9] 李彦平, 姜长宝, 张淑娣. 创新新时期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载体[J].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 (02): 23-25.

【责任编辑: 温开照】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视阈下城市精神培育路径研究

——以佛山市为例

陈燕霞

(中共佛山市委党校, 广东 佛山 528300)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已经进入新时代, 以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审视当代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精神的培育, 一方面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另外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持续发展的要求。要以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为指导, 建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城市观。新时代城市精神的培育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把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作为城市精神培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培育城市精神, 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发挥城市精神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 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 城市精神培育; 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 城市品格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90-06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城市的出现反过来又成为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进而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文化与经济, 始终是城市发展绕不开的话题。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精神的灯塔指引作用, 也离不开城市精神的凝心聚力作用, 城市精神是城市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和不竭源泉。培育城市精神, 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发挥城市精神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 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核心构成, 是城市的灵魂之所在, 反映出一座城市的城市品格和价值追求, 同时也是市民的价值认同和精神追求。城市精神是由多方面文化因子凝结而成的, 这其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革命文化的因素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因素。

一、从三个维度的视角把握城市精神

从传统文化维度来看, 中国传统文化是孕育城市精神的土壤。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它凝聚着这个城市的历史, 引领着这个城市的未来, 文化是这座城市的“血脉”, 城市精神扎根于其独特的地域历史文化。^[1] 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发展, 以岭南文化为核心, 隶属于广府文化的佛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比如说武术文化、舞狮文化、陶艺文化、粤剧文化、剪纸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等都是城市精神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 “行通济”是佛山元宵时节的传统民俗文化之一, 至今有 300 多年历史。佛山的“通济精神”给佛山注入了通济和谐的精神文化因子, 在深层意义上改变了佛山的城市与人文特质, 带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通过对民俗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将佛山精神潜移默化地注入到佛山新旧市民的内心, 影响着大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从革命文化维度来看, 革命文化传承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以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 另一方面, 革命文化还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摇篮。革命文化兼有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核, 其内涵更易于被市民所接受, 更容易成为城市精神的重要

收稿日期: 2020-10-15

作者简介: 陈燕霞(1987-), 女, 辽宁普兰店人, 中共佛山市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部讲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 城市文化。

因子。佛山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红色资源。禅城区近几年也是重点打造罗登贤和陈铁军的这两个红色文化品牌，以红色文化为引领来提升禅城区的整体知名度。佛山的改革创新精神就是继承烈士的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蕴含在红色文化中的红色基因一直是激励佛山人民改革创新的不竭动力，这种红色基因也成为了佛山城市精神的一个构成因子。

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维度来看，佛山有改革创新精神，具体表现就是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改革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历来具有的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的典型代表，同时也在佛山这片热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佛山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山是以制造业起家的城市，发展实体经济是佛山这座制造业之城的基因，企业家精神支撑佛山连跨数个千亿大关，如今已经实现了万亿俱乐部的发展目标，更需要大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加强对企业家特别是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培养，传承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城市精神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同时企业家精神也为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发展注入新的元素。与企业家精神相对应的还有“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一种信念，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工匠精神”是抛却眼前的一切物质利益而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发展，给当今时代浮躁的人心提供了一些精神的慰藉，同时为佛山工业文明注入了核心内涵，成为全体佛山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说过，“将一个城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2]P65 孕育于传统文化中的城市精神，继承和弘扬了传统文化的基因，使得这种精神根深蒂固，根基深厚；孕育于革命文化中的城市精神，传承和赓续了红色基因，培植了市民浓厚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赋予市民不竭的发展动力，务实创新、蓬勃向上，使得这种精神活力四射，怀有对更高品质城市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拥有更多价值因子，使得这种精神生生不息，连绵不断。这些构成了新时代城市精神的内核，使得城市精神更加丰满和立体。

二、城市精神的作用及其培育所存在的问题

“精神”是无形的存在，但精神的力量一旦被群众掌握就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城市精神的孕育成功，会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城市的未来不能单依靠纯经济的发展，也要注重文化的因子，不断地塑造城市精神。对于城市精神的认识，目的在于让城市越来越丰富多样，而不是变得越来越简单统一。在回顾历史立足现实，总结城市精神的时候发现在城市精神培育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任重道远。

（一）培育城市精神的作用

1. 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城市精神的背景是文化，如果城市没有历史文化的积淀，没有文化凝聚力，市民的精神寄托与这座城市关系不大，就说明这座城市没有城市精神。市民的精神状态是城市文明程度的象征，大众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支撑。培育城市精神可以重新发现城市的历史文化坐标，构建城市当前的价值体系，提升市民的精神文明程度，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连续几年，佛山的“行通济，无闭翳”的民俗都在元宵节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很多慕名而来的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海洋周边城市的人也一同参与到元宵节这一民俗活动中，这就对佛山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至今，越来越需要文化力量的推动和支撑。文化可以凝聚起多方面的力量，为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佛山一直在寻求机会和平台，来提升佛山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时代特色，最终使佛山文化成为佛山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内源动力。佛山各种产品在佛山精神的带动下，一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现在人们一看到陶瓷产品、家电产品、家具、内衣、铝型材等就联想到佛山。停顿的城市必定没有活力，佛山的制造业实力雄厚，高新技术产业初具规模，佛山已经

跻身万亿俱乐部的行列，需要一条崭新的起跑线，以佛山城市精神为依托的，凝聚佛山脊梁的千百英才，是佛山发展的新动力，打造佛山历史文化名城和佛山经济面貌发展齐头并驱，交相辉映。

3. 构建城市人民共有精神家园

佛山市民对自己的文化基因之重视，在许多老佛山人身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这种文化自觉也传递到了他们身上。文化对任何人都有一种深刻的意义，哪怕你不去想它，它依然影响着你。从土生土长的老佛山人到刚在佛山落户的新佛山人，佛山精神起到的是凝聚和向心力的作用，为他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品格，同时也是一群人的集体价值观的体现，使全体市民形成共同的精神追求，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城市精神本身就具有二重性，即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抽象的城市精神通过市民的文化自觉，变成佛山人具体的精神特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是提升城市品质的必要物质条件，被市民所认同和追求的共同的城市场精神也是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动力，使得全体市民在拥有美好生活家园的同时，构建起佛山全体市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二）城市精神培育所存在的问题

1. 城市文化精神特质不鲜明

一座拥有稳定精神特质的城市，其城市精神必然是既具有鲜明的个性，又和社会主流价值文化的共性相吻合。每座城市有每座城市的历史境遇，每座城市又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必定有不同的文化精神特质。各个城市不同的文化精神特质，也往往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相联系，一座城市的精神表达是由其现实地位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如何反映这座城市的精神特质，更多的根植于历史传统同时又在现实地位中得以表达。不同的城市拥有不同的精神特质，佛山的传统文化很丰厚，种类繁多，广泛而厚重，但一直以来很难概括出独特、鲜明的佛山文化精神特质。因此，要扎根优秀佛山传统文化，凝练佛山独特、鲜明的文化精神特质。

2. 缺乏优秀的文化人才群体

高端、多样优秀人才群体对城市精神的形成和影响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随着文化佛山大幕的拉开，面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艺创作和文化行业管理几大板块，佛山文化系统队伍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转型，尤其是缺乏高端、多样的优秀人才群体。高端、多样的优秀人才群体应该具备三种能力：专业化、品牌化和社会化。专业化是立身之本，包括预测、评判、建构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品牌化是增值之要，指要用“工匠精神”打磨，把活动做成品牌，把品牌做成风俗，把风俗沉淀为文化。社会化是服务之基，体现为文化部门的社会发动能力，还有社会力量的参与热情。对高端、多样优秀人才群体的要求很高，佛山需要加大力度去挖掘、引进培养相关的优秀人才。

3. 没有深厚的学理支撑

在2008年关于“新时期佛山人精神”的大讨论之后，将“敢为人先、崇文务实、通济和谐”确定为“新时期佛山人精神”的基本表述，虽然初步拟定提炼总结了佛山精神，经常在党报和杂志见到关于佛山城市精神的文章，但更多的只是新闻层面的东西，多是口头宣传，没有进行学术、学理的研究和提升。因此，佛山城市精神虽然提出了，但是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撑，在基本定义方面研究匮乏，在佛山精神的塑造和传播途径的研究上匮乏，导致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表面的宣传并不能使佛山精神的内涵深入人心。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形成的城市精神，更是草率和仓促，亦难概括其市民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的共性，因而导致现在市民对佛山精神的内涵仍旧不是很清晰。这就是对佛山精神的学理研究不足，应该成立课题组或者研究中心，对佛山城市精神进行专门的研究和梳理，形成统一的理论基调，为佛山精神的推广奠定理论基础。

三、以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为指导来培育城市精神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审视当代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精神的培育，一方面是新时代发展的必

然要求，另外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持续发展的要求。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国城市的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也存在很多问题，以经济发展为首位，看重资本逻辑，我国城市精神的孕育中缺乏了“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根本的目标。这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为指导，建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城市观，新时代城市精神的培育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把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作为城市精神培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重视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传承

1. 以历史文化资源重塑城市文化空间

佛山城市精神的培育，既要历史进行挖掘，积淀地域文化，同时也应把握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保持提炼方向的正确性和意义性。城市自身的历史与文化造就了今天的城市精神，城市文化更突出的体现在这座城市的建筑风格和城市布局等人文资源中，文化的品味和含量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魅力，也是优秀城市精神的象征。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佛山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佛山是一座蕴藏丰富历史文化的城市，通过挖掘相关的历史资源，打造本土风情的城市文化空间，可以造就独特的佛山精神魅力。祠堂可以说是一个民俗博物馆，又可以说是一部家族变迁史。祠堂可以使得海内外宗亲记得住乡愁，找到家族的根，让更多的人领略到祠堂古建筑的魅力。现代佛山是历史佛山的继承与发展，通过众多的历史名人就可以作为观察当代佛山人很好的窗口，透过这些历史名人的祠堂，就会读懂佛山人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深挖散落在城乡的文化遗产资源，通过修复、重建、传承、活化和展示来焕发佛山的岭南风采，唤醒广大市民的乡愁记忆，进而塑造独特的城市品质。

2. 弘扬尊师重教的文化

尊师重教是自中国儒家文化开创以来，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穿汉服、点朱砂、写毛笔字、读《论语》……在传统文化日益复兴的今天，各种传统仪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每年新学期开始，佛山许多地方也陆续组织举行开笔礼。通过举行丰富的开笔礼仪式，让孩子们更好地传承尊师重教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笔是中国古代对少

儿开始识字习礼仪式的称谓，俗称破蒙。作为少儿进入人生学习阶段的纪念形式，往往令人记忆深刻，成为终生的戒律和鞭策。开笔礼符合传统文化的内在涵义，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又有所创新。佛山推崇开笔礼仪式，比较著名的是佛山祖庙孔庙学童开笔礼以及素有“理学名山”、“珠江文明的灯塔”的美誉西樵山开笔礼，大批的家长带着孩子参加这个传统的启蒙仪式，这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将尊师重教的文化深深镌刻在人们的心中，同时在小孩子内心种下一颗启蒙的种子，也是将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传承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佛山精神的一种文化因子，这种文化现象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3. 传承家训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为本的文化，重视修身养性，立德立言。家庭是构成城市的最小单元，传承家训文化，有助于厚植家国情怀，形成城市精神最本源的支撑。佛山禅城区对家训文化发扬得比较好，比如说紫南村建了广府家训馆，对外免费开放参观。广府家训馆以家训、家风、家教为要点，以广府文化为底色传承经典，促进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在广府家训馆里，收藏展示了中华传统家训、广府家训以及广府地区传统家庭文化实物、照片，通过这种建立展览馆的形式来穿传承家训文化。龙津村通过挖掘、编译、诵读，将沉睡的《龙津古训》唤醒，并且活化利用继承发展，让古训带来新风，为龙津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围绕《龙津古训》陆续开展“古训书法创作”“古训学习征文”等一系列活动，活化古训精神，能够凝聚精神力量，真正将古训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二）以红色文化品牌为引领重塑城市精神

佛山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系统梳理佛山的红色基因，通过这些红色基因重塑新时代佛山城市精神。可以用焕发生机的佛山红色文化基因来为新时代佛山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凝聚更多的力量和共识。同时需要打造特色红色文化品牌，比如罗登贤、革命三谭、陈铁军，可以作为新时代佛山城市形象重点打造的标识，在浓厚的商业文化影响之下，佛山需要红色文化的底蕴作为根基。佛山是以制造业城市著称，商业文化气息浓重，商业文化

既有优点也有短板,优点在于商业文化具有开放并蓄,务实创新的因子,缺点在于商业文化更重利益,轻视人情世故,导致新佛山人缺乏归属感。打造佛山红色文化品牌,以佛山先进红色文化引领商业文化,融入家国情怀的因素,可以减弱乃至消弭商业文化的负面影响,加强佛山红色文化品牌建设,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形象和文化软实力,更加吸引人才,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三) 做好新时代的城市精神培育工作

1. 培育高素质的文化英才和市民文化群体

文化对每一个人都具有施加影响和进行教化的功能,能够深刻影响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和行为方式。佛山在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和高品质文化导向型名城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更多高素质的文化英才,在培育佛山城市精神的过程中也需要高素质的文化英才和高素质的市民群体。在培育佛山城市精神的进程中,需要引进高素质的文化英才,来共同参与到城市精神的培育和建设进程中。秉承着“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展理念,印发《佛山市文化英才扶持工程实施细则》,加快构建与文化导向型名城相匹配的文化人才供给体系,培育理念先进、影响广泛的文化英才。搭建文化创意中青年人才培养平台,选取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人士进行专项培训,比如藤编、珠宝玉器、工业设计、陶艺创作等行业。用先进文化育人,用名人文化化人,是培育高素质的市民文化群体的根本手段。要通过名人文化的不断渗透,着力提高市民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要让人们“来到”名人的身边,“走进”名人的心灵,触摸名人的成长脉搏,让广大市民受到强烈的影响和教育,使之拥有文明的行为习惯、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应成为佛山精神培育的重要途径。

2. 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

城市精神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之一,城市可以依靠城市精神的力量,激发市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之心。现代社会中,大众对城市的认知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媒介传播的,因此城市精神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宣传。如果城市精神定位的模

糊与传播策略不当、力度不足、途径分散,就很难得到正面宣传。尤其在当今时代,处于新媒体统领天下的时代,和传统媒体相比较,新媒体有与其无法比拟的优势,传播渠道之灵通、传播速度之迅猛、传播信息量之大。处于信息时代的洪流之中,新媒体在塑造和传播城市精神中充当着重要角色,比如微信公众号和抖音短视频都是传播城市精神最便捷和迅速的方式。得益于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新媒体可以打破时空和传播方式的界限,同时进行线上和线下的共时性互动。通过高新技术手段,打造与传统不同的传播体验,同时又可以即时性的传播和分享,增强城市精神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城市形象。佛山精神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短视频等自媒体进行传播,每个市民甚至是非市民都可以参与进来,进行信息发布和传播。结合佛山城市人文资源特色,量身打造相关的宣传片,整合多方面新媒体渠道,通过新媒体的传播策略,将佛山城市的发展的目标与价值追求内化为成市民的行动自觉,进而传播佛山精神的深刻内涵。

3. 加强城市精神的科研力度

文化作为城市的基因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可以用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了解佛山这座城市成长的内在逻辑。佛山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进程中一直呈现的发展势头,具有的创新气势,日积月累从而凝聚而成的佛山精神特质。因此要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去梳理研究佛山精神,将佛山精神的来龙去脉研究通透,让佛山的形象更加清晰,发展目标更加鲜活,让佛山精神与大众生活的关系更加紧密,更易于佛山精神的传播。在佛山精神的研究过程中,在方法论上,可以综合运用哲学、文化学、历史学、城市发展学、精神发展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理论来研究佛山城市精神的培育与塑造。

4. 以人民为中心营造积极向上的城市文化氛围

城市文化氛围的营造应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把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作为城市精神培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好党群关系重塑工作和政府角色重塑工作。第一,实施新时代思想引领工程,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经常性开展群众文艺活动,提振群众的精气神。第二,实施新时代文化

治理工程，提升文化治理水平，净化文化市场环境。第三，实施新时代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工程，开展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第四，实施新时代文艺发展繁荣工程，建设一批高品质文化艺术展演阵地，鼓励本土文化研究持续深入。要营造积极向上的城市文化氛围，关键是要多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载体来营造氛围。推动文化塑造城市精神，传播城市形象。以文艺精品的创作、民俗品牌活动和多种文化形态树立城市新形象，以新时代的城市精神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和创新动力。

参考文献：

- [1] 刘介民. 广府民俗艺术审美[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09.
- [2] [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08.
- [3] 《佛山市建设高质量文化导向型名城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 [4] 周复多. 城市文化品质与城市可持续发展[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15-18.
- [5] 陈柳钦. 城市精神及其塑造和弘扬[J]. 理论学习，2010,(10):26-32.

【责任编辑：余伟】

浅谈礼仪文化的当代价值

王燕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10)

摘要: 中华民族素有仪式之邦的称号。在传统文化的引导下, 礼仪已成为判断一个人有无涵养的标准之一, 更是彰显社会道德和文化特色的行为规范。本文主要梳理礼仪文化的价值, 警示世人在运用礼仪的同时, 更能体会其内在的涵养。礼仪文化的传承有助于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人道德品质, 在促使培养良好的个人形象、端正的言行习惯的过程中,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为祖国的繁荣强大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关键词: 中华民族; 礼仪文化;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B8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96-03

中华民族的昌盛不衰, 源自于自身深厚的文化; 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离不开历史传统的底蕴。礼仪文化携带着中华民族的基因, 烙印在中国人民的内心, 孕育着上下几千年文明智慧的结晶, 无时无刻都对中华儿女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 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因此,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 礼仪文化仍不能弃而不谈, 应与时代要求相结合, 才能更好的做到继承创新, 让礼仪文化绽放魅力和彰显时代风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很多宝贵的思想观念和正统的道德规范, 从形成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现在从未失去其应有的意义。正是因为礼仪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 该文化才流传到现在从未消失, 犹如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之中, 有着中华文化的基因, 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特色, 具有英雄儿女的性情, 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价值取向。不仅如此, 礼仪文化还引领新时代的步伐, 具有持久的价值和深刻的意义。重视礼仪文化教育, 学习礼仪文化的价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学习礼仪精神, 传承礼仪内容

礼仪精神没有得到正确充分的学习, 是源自于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没有摆正学习礼仪文化

的心态, 进而缺乏学习礼仪文化的自信。如何增强这种礼仪文化的认知和自信, 首先对礼仪文化需要有一种自觉意识, 培养对该文化的理性思维, 而不是停留在感性认知的层面上。需要追踪礼仪文化的根, 了解他最基本的脉络, 尤其要学会辨别和其他文化的关系, 崇洋媚外的思想坚决不能取, 亦不可混淆。

其次, 作为礼仪之邦的一份子, 我们需要学习礼仪文化的核心内容, 如果对核心理念没有认识, 就意识不到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 更找不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密码, 从而礼仪文化的自觉自信也是坐而空谈。没有历史的底蕴, 没有知识的支撑, 礼仪文化对于国人来说, 只是华而不实的空架子。因此, 学习礼仪精神是当下的我们所必需做到的。

再次, 我们要正确区分中国礼仪和西方礼仪。二者虽然有相同的地方, 但仍有差别的地方, 因为文化的差异就会带来理念的不同。中国人讲道理, 重方法, 以仁存心, 以礼待人, 重视个人修养, 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西方礼仪是将个人信仰和行为规范区分开来的, 他们更在意的是个人利益, 崇尚征服。

最后, 只有真正的了解礼仪文化, 学习到其中的精华, 才能掌握礼仪文化的传承密码, 更能激发

收稿日期: 2020-08-13

作者简介: 王燕(1989—), 女, 汉族, 山东济南人,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人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在不动摇礼仪文化根基的情况下，可以大胆吸收外来优质文化，促使礼仪文化根繁叶茂，对我们文化的前景和发展充满信心，并能积极践行礼仪文化。

二、领悟和谐要旨，促进思想传播

和谐是礼仪文化的根基，具有崇高不可替代的地位。和谐主要体现个人、群体和国家间的和谐。首先个人的身心和谐，在反思中提高德性和内在，通过树立诚信、学会仁爱、提高觉悟来塑造健全的身心。学会换位思考，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对方；心存敬畏保持谦卑，将内心修养和礼仪的践行结合起来，达到身心的和谐，提高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

其次群体之间的和谐。群体之间的和谐有助于促进个人之间的关系。人是群居性动物，只有在团体中、群居中才能找到归属感，找到自己的定位，群居的前提是和谐相处，与其他群体建立良好的关系，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自我们的祖先时代，就以群居的方式生活，通过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群体之间的真正和谐。

再次国家间的和谐。家是国的家，一个个家庭组成国。家庭关系的和谐是国家关系的缩影和体现，实现礼仪文化的价值。这种和谐也验证了国家之间的相处上，可以概括为和合思想。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使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均处于和谐的状态，实施政策得到民族的认可、得到民众拥护，无一不体现中国礼仪文化智慧。

三、加强礼仪输出，提升国家实力

礼仪文化的传承，是中国软实力的象征。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华文化是唯一保留至今，继续传承的文化，本身就具有潜力和吸引力。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华文化逐渐被其他国家认可研究，并由衷的表示中华文化带来的震撼。中国文化作为最博大、最丰富的思想宝库，其价值还有待开发和利用。

中国要想赢得全世界的认可和尊重，必须加大

传播我们的思想文化。礼仪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外在展现，应该大力输出。使其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以及强有力的突破口。一旦世界认识到中国礼仪文化中深邃思想和理性态度，感受到中国儿女对和谐世界的不懈追求，中华文化，尤其礼仪文化必然会引起共鸣和巨大的凝聚力。

世界需要一个平等的对话，文明的秩序，和谐的氛围。那么平等、文明、和谐的风气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不难看出，礼仪文化还为国际关系的平衡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以德治国、礼仪天下已成为一段佳话，更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我们要善于运用其思想精髓与世界各国处理好关系，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

四、注重礼仪文化，提升经济效益

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不是割裂开来的。礼仪文化在经济发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对经济环境和效益的影响也逐渐加深。礼仪文化放在经济领域具有一定的管理功能。处理各种关系，调动员工积极性，激发其创造力，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经济管理无一不涉及礼仪规范，尤其规章制度。评选先进模范，授予荣誉称号，充分体现人性化，激发员工的潜力。礼仪文化的良好运用，能够形成人际关系与经济效益的有效互动。

礼仪文化还可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环境、提供有知识有修养的高素质人才，有利于企业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带动。如果现代企业都注重礼仪文化，礼义廉耻可以有效的得到内化，有助于仁义礼智信的践行。减少互不信任、互不尊重，办事推诿，责任不明现象的发生。长此以往，无疑会大大降低企业培训费用以及公关成本。办事效率的提高，从而增加收益的提升。

经济产品也能直接或间接地找到礼仪文化的痕迹。如：礼仪图书、礼仪期刊以及音像制品；各种服饰、礼仪礼节的展示；创作、表演、文艺培训也会涉及礼仪元素；婚庆公司、旅游景区、婚纱摄影也存在着各种礼仪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中的首饰、印刷包装、文化出租、会展服务等，一一涵盖礼仪文化，亦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五、掌握核心要义，明确正确义利

掌握礼仪文化的核心要义，能为我们树立正确的观念，明确树立正确的义利观。重义轻利的观念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过程，儒家学派也早已教导我们情义重于利益，这亦是君子所为。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必须以情义为先，争取做到利仪兼顾，尽力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者，而不是破坏者。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学习礼仪文化能够让我们在取舍之时，应当有一种大局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全球各国和谐相处，也是建立在正确的利益观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互利共赢。

掌握礼仪文化的核心要义的积极意义在于促进文明社会的全面实现，避免了过分在意个人利益而社会的混乱局面出现，肯定个人的合理要求，在义与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为解决义利矛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但当今社会中，为追求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仍然存在着，在个人、民族和国家利益选择时仍优先考虑自身，礼仪文化中的核心思想还强调领导者的以身作则和树立楷模。这种带头的自律和修养有着超过制度和法律的作用，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六、提升礼仪修养，锤炼个人品德

中国一直朝着大国强国的方向发展，少不了特色文化的支撑。国民素质的高低就是以礼仪文化为依据。在言行举止上体现的是个人素养和修为；在思想道德上体现的是文化积累和行为；在交际能力上体现的是自我情商和机会。因此，礼仪教育不仅仅是知识面的拓展，更是实践行动的落实。礼仪实践能力加深了对礼仪知识的理解，提升了个人品德的修养。

随着社会的进步，礼仪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个人品格的表现；二是各种礼节的展现。中国礼仪是以道德为基础，讲文明懂礼仪促进道德素养的培育，道德素养的培育可以在礼仪中体现出来。内存品德外行于礼，需要个人节制自律，有着良好的个人操守，严谨的生活作风，健康的生活情趣。在积极倡导老祖宗遗留礼仪文化的同时，也应敢于批判和借鉴。

任何文化都有其优劣之处。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中国人的优点是有“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两大精神，而短处在于缺乏“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换句话说，我们国人至今存在公德心薄弱、国家观念不强、纪律习惯不良、公共秩序缺乏等现象。因此，现代礼仪在内涵层次上，要勇于传承；在仪式行为上，要善于吸收，即融合创新。

礼仪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构架，是一个丰富的精神体系。它囊括了国家、社会、自然、个人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可以有效的与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先进思想相契合，闪烁出时代的光辉。礼仪文化历经数千年，其意蕴深厚一丝不减，它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具有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在接下来的发展中，社会各界争取让礼仪文化结合主流意识，发挥其积极的现代价值。唯有不断将其发扬光大，才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才有助于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序推进，才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助力。

参考文献：

- [1] 江又明. 传统礼仪文化的精神意蕴及当代价值[J]. 理论建设, 2019(5).
- [2] 汤媛, 傅琼.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当代价值[J].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9(10).
- [3] 梁漱溟. 中国文化的命运[M]. 中信出版社, 2013.
- [4] 林伟健, 王仕民. 文化价值论[M].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9.5.

【责任编辑：温开照】

论抗疫大考对我国国家治理的检验

曾宇青

(深圳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34)

摘要: 本文从制度优势视角论述为什么我国能取得显著抗疫成效。阐释了贯彻宗旨意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国家治理取得显著绩效的基本逻辑理路; 抗疫大考充分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全国一盘棋,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 充分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具有能够使全面依法治国贯穿国家治理全过程,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真正造福人民的优势, 进而得出坚定制度自信的结论。

关键词: 国家治理; 抗疫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099-0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他说: “抗疫斗争既展示了良好精神状态和显著制度优势, 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习总书记的“大考”思维充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 要求我们辩证总结抗疫大考的经验。本文从制度优势视角论述为什么我国能取得显著抗疫成效。

一、贯彻宗旨意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国家治理取得显著绩效的基本逻辑理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意识, 是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战胜困难、走向胜利宝贵经验的总结, 也是我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十九大报告指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正是“以人民为中心”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艰难险阻, 走向辉煌。

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意识, 我国及时

作出全面抗疫的正确决策。我国最先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其特性、传染程度、危害、致死率等我们都不熟悉, 是人类面临的新疾病的挑战。但我们没有甩锅, 没有心存侥幸, 没有拖延。在 2020 年 1 月 25 日我国农历大年初一这个万家团圆的节日, 中央政治局罕见地在这个时间召开了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及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决不能因费用问题耽误患者救治”。正是基于党的宗旨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及时吹响了全面抗疫的号角。

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意识, 我国的全面抗疫工作得到全民支持。应该说, 没有党领导的人民就是一盘散沙, 是原子般游离的个人。但 14 亿中国人民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淬炼, 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验证, 难能可贵的形成了对党的信任, 也难能可贵的形成了集体理性。这个集体理性强调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 团结意识, 而不是强调个人的绝对权利和绝对自由。抗疫中, 武汉一千多万民众没有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 而是愿意担负隔离的责任。14 亿中国人也没有强调个人自由, 而是愿意团结一致, 众志成城抗疫。正是拥有这种党领导下的千锤百炼形成的对党的信任和集体理性, 使党能够做出武汉

封城和举国抗疫的决定。这是显著的优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先生惊叹这种14亿中国人的利他的集体意愿，称赞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团结；并为武汉一千多万人口能够集体承担隔离责任而动容的呼喊“世界亏欠你们！”这实际是14亿国民以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团结意识，参与了举国抗疫。所谓民主无非就是公共参与。由此可见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国家治理能够代表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和部署，向疫情全面宣战，各省纷纷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背后的逻辑。

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不畏牺牲”发挥了先锋带动作用。疫情猛于虎，领导干部纷纷一线调度、靠前指挥，这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一切为了群众”的宗旨意识。只有领导带头冲锋陷阵，才能引领群众共同抗疫，才能起到了定民心，聚民心，暖民心的巨大作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坚持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与人民一起构筑了一个切实保障人民利益的抗疫天网。各级党政组织能够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能够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做好群众工作，依靠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事实证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能够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决策，能够获得人民支持，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

抗疫大考推动着我国整治抗疫中暴露的官僚主义问题，如少数领导干部投机取巧，压力转给一线；或临阵退缩，谎称触疫需要隔离；或大搞形式主义，要求层层填报表格；或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瞒报亲属子女重点疫区暴露史等等，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二、抗疫大考充分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

具有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我国集中力量办成了一件又一件涉及国家全局性、战略性的任务。

自习近平主席代表党中央向疫情全面宣战，中国政府迅速建立起联防联控的举国体制。正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所说：“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果断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举措迎击疫情”。习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提出了“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以及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对所有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集中隔离救治的要求。全国紧急动员。呈现出强大的整体动员能力。

正是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要求，我国2020年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在战略上明确了我国抗疫是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阻击战、总体战。武汉封城，阻断了疫情在全国蔓延，赢得了大后方，使得全国本土成为驰援武汉的强大力量。在全国的支援中，九天，推出17种快速测试试剂盒；十天雷神山方舱医院建成；从1月24日除夕之夜第一批医疗队抵达武汉，到4月15日最后一批医疗队离鄂离汉，已有340多支医疗队、超过4万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口罩、呼吸机等各种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质源源不断运达武汉。2月9日武汉向“应收尽收”发起总攻，1.7万余党员干部下沉武汉社区大排查。2月20日，武汉新增治愈病例首次超过新增确诊病例，逐渐从一床难求到床等人。基本可以满足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隔尽隔要求。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国人众志成城，成效显著。十五天，确诊和疑似增量就出现拐点。十六天确诊和疑似总量就出现拐点。一个月，23个省确诊数量是零，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接受习总书记会见时说，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

国效率。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3月27日孙春兰副总理强调，当前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

全国一盘棋战略的实施，赢得了复工复产先机。全国除湖北外能够在武汉封城第15天复工复产。即2月8日在全国新增重症病例大幅下降（7日新增重症病例为1280例，8日下降至87例）的情况下，国务院发布复工复产的通知，要求全国除湖北外各地根据各地情况有序复工复产。各地纷纷将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2月中旬最先最积极复工的是浙江省。浙江各地上演的通过包专机、包专列、包专车等方式免费接外地员工复工的“抢人”大战频频登上热搜。深圳2月8日当日收到粤海街道（该街道系华为、大疆、中兴通讯的发源地）复工申请800多份。中国船舶集团2月10日复工复产。复工后截至3月底共交付33艘船舶。

我国全国一盘棋抗疫的强大能力，不仅有效遏制了国内的疫情扩散，同时，也延缓了疫情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为世界各国抗疫争取了时间，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帮助，表现出责任担当。

另一方面，抗疫大考所提供的经验推动着我国疫情防控制度日臻完善。正如习总书记在2月14日的讲话中所说，要改革完善四个方面的体系和制度，即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三、抗疫大考充分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具有能够使全面依法治国贯穿国家治理全过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真正造福人民的优势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抗疫大考考出了我国国家治理能够将依法治国贯穿于抗疫和复工复产全过程并充分发挥法治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在抗疫最吃紧之时，党中央发出依法防控要求。2月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指出：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

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等，明确了党中央要加强对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国的领导。警醒着国人强化对依法防疫和依法治国的认识。

我国从抗疫部署到抗疫实施都依法有序进行，为有效统筹社会力量抗疫，平衡社会利益，规范社会行为提供了法治保障。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政府依法要求个人报告与重点疫区人员接触史，要求出入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等；又如，疫情期间囤积居奇，卖出天价口罩、牟取暴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依法从重处罚。正是依法抗疫，真正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真正形成了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奋力抗疫的局面。

提升政府行政部门依法行政能力是发挥法治绩效的重要因素。此次疫情防控展现了地方政府的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善做善成，同时也在抗疫实践中锻造了各行政部门依法作为的行政能力。例如深圳司法部门编制了重点领域行政执法工作指引，让重要的执法场景都有了操作“模板”。在复工复产中，深圳每天都有大量的企业遇到劳动用工合同、物业租赁和商业合同纠纷等问题，不利于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深圳派出由400名律师组成的75个服务团，进驻全市75个街道、662个社区，帮助梳理哪些诉求合法、哪些诉求不合法，依法推动复工复产。抗疫和复工复产过程，极大提升了政府行政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从而提升了法治绩效，推动了复工复产。

抗疫大考推动着我国依法防疫、依法治国的进一步发展。针对抗疫中暴露出的法治“短板”，党中央有清醒认识。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并提出九个“要”：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要加大对危害疫情

防控行为执法司法力度；要加强治安管理、市场监管等执法工作；要依法规范捐赠、受赠行为；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要加强对相关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及时处理，定分止争；要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要强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务。抗疫大考必将成为推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契机，进而推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获得空前发展。

总之，制度的发明，是用来抗击灾难，造福人民。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这个人类面临的重大灾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放眼世界，中国最先遭受新冠肺炎之灾，最先摸索抗疫经验提供给世界，但无论是

在新冠肺炎确诊数量，死亡人数、死亡率等指标看，还是从复工复产的速度、有序性看，中国抗疫的成效都是最好的。抗疫大考的意义就在于，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进一步自我反思、自我修正，完善我国国家治理。

参考文献

李君如. 人民日报人民要论：深刻認識疫情防控這次大考[N]. 人民日报. 2020-04-23(09).

颜晓峰. 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N]. 解放军报, 2020-3-13.

【责任编辑：温开照】

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对策

吴玉英

(湛江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湛江 524032)

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国家治理体系是指按照一定的治理理念确立起来、使国家能够顺利运行的体制机制。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统筹各个领域治理主体、处理各种主体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水平与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全面准确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的含义，实现管理思维向治理思维的转变，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20)04-0103-06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紧紧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深化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回答，从制度层面和治理维度思考和回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系统制度保证和奠定坚实治理基石。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从君主立宪制到多党制，中国都探索尝试过，想照搬西方政治制度，都没有成功。最终，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短短 70 年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

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为人类制度文明创造了经典范例。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强调，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发展，日益显示其巨大的显著优势。主要是：1、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2、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3、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4、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5、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6、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7、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8、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9、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

显著优势。10、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11、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12、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13、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以上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涵盖广泛，十分厚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体现，也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在治国理政中不懈探索奋斗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结合的成果，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具体表现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制度理论、治理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把权力接受人民监督作为基本理念，把有利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作为构建准则，维护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目的；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带来的发展要求，反映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治理需求；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显著优势成为“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和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成为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依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显著优势，才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新中国成立70年经验的总结与提炼，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就让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更科学丰富清晰。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学者们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纷纷进行解读。学界最普遍、最流行的看法是将国家治理体系等同于国家制度体系。陈金龙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有效控制与管理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衔接的国家制度。^[1]有人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各个领域行使国家权力、治国理政方略的综合体现。^[2]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31日的讲话“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了权威性说明和概括，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3]笔者认为总书记这一表述不仅与上述学术界的说法基本一致，而且能从治理、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一般性概念入手，再推导出国家制度体系，体现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总结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社会的治理而得出科学结论，是基于中国特定的改革环境、改革要求和改革总目标而提出的，抓住了国家治理体系中制度这一关键要素，无疑是极其正确的。

什么是国家治理能力？学界也有不同解读。丁志刚认为，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国家宏观上统筹各个领域治理，特别是运用国家制度和法律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

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5]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界众说纷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指出：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6]这是从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而著名学者俞可平教授则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包括五个标准：（1）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2）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3）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4）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5）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7]

根据上述学界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的阐述，笔者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包含以下含义：

1. 国家治理体系是指按照一定的治理理念确立起来，使国家能够顺利运行的体制机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应包括：（1）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是公共治理，吸引大多数人参与政治过程、政府决策，治理是大家的事。现代化的治理还应当是善治，依据良法治理国家。（2）国家治理权力的更替是平稳有序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就是实现了权力制度化的平稳交接。（3）国家治理组织架构是以现代化治理理念为基础的，是能够解决面临的种种突出问题。现代化的国家以公共服务为目的，

建立国家治理组织体系，以问题为导向，善于解决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以现代技术为基础，充分运用包括现代信息技术在内的各种技术手段提高组织效率。（5）国家治理的效能比较高，而成本相对较低。

（5）国家治理的氛围是风清气正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是廉洁治理。

2. 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统筹各个领域治理主体、处理各种主体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水平与质量。衡量国家治理能力至少包含政治认知力、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四项指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应包括：（1）以制度为基础，正确处理各种重大关系。这里的关系包括：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人民是改革的主体，处理好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建立健全现代财税体制，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2）以治理主体为轴心，实现“四有”的状态。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努力使各个治理主体到位不越位，有为不乱为，实现个人主体创业有利、社会主体积极有位、调控主体主动有度、市场主体竞争有序的经济社会状态。要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以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体系，使市场主体能够在政府的调控中获得最大化的发展空间；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自主创业者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成功。（3）形成一个局面：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伟大事业，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展现多方面显著优势，但还不是尽善尽美的，需要以更大的努力、下更大的功夫去完善，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科学

严密、更有效率活力、更加成熟定型,不断展现更加显著的优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国家治理的含义,实现管理思维向治理思维转变,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一) 全面准确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和国家领导核心以后,代表人民执掌政权、领导人民治理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历史任务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马克思、恩格斯未能进行这方面的实践,其他国家也没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8]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过程,实际上也是探索社会主义中国治国理政之道的发展过程。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关结合,是我国政治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治理”和“国家治理”概念的运用,体现了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治理”和“国家治理”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改革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的治国理政。

从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治理意义上对于“治理”和“国家治理”概念的运用来看,其基本含义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和人民根本利益一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新形势,优化和创新执政体制机制和国家管理体制机制,优化和提升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实现民主与法治的共融、国家与社会的共通、政府与公民的共治,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长治久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十九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进一步凸显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改革目标理性价值。对于其中的“国家治理”概念,

应该历史地、全面地、准确地、深刻地加以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更好发挥制度优势,并且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效能,以解决改革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和难题,优化主体格局、体制机制、流程环节和治理能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治理概念最早使用是在1989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提出了“治理危机”概念,“治理”逐渐地被广泛应用于行政管理之中,也开始夺得学者的眼球。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西方治理理论的创始人罗西瑙对“治理”的理解是政府与其他组织共同努力,利用各种资源来完成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

西方治理理论的产生基础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发展矛盾,具有强烈的西方社会属性,是西方国家自己的内在需要而非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其内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治理”概念和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形成的治国理政理念具有很大区别。全面准确深入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正确把握和区别,注意避免两种认识偏差。

1. 简单运用西方“治理”概念来套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20世纪末,西方学者赋予“治理”含义,主张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主张,并且主张社会自我治理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平等共治,强调弱化政治权力,甚至去除政治权威。有的人简单运用西方“治理”概念来套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忽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的首要内容和前提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视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总体格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其实际运行是一个领导核心,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简单片面地按照西方“治理”概念的含义解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中“国家治理”的含义,认为“治理”不同于“管理”,是多主体、多中心的治理或者社会自治,或者认为“治理”与“管理”一字之差,就是民主政治与非民主政治的区别,如此等等。

(1) 西方的“治理”概念及其理论具有“社会中心主义”治理取向。西方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

是在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发展过程中市场与政府双失灵，因此，其基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取向于“社会中心主义”，西方学者对于“治理”的定义侧重于治理的主体，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和权威，还更加支持和鼓励多元组织的参与，希图达成理性有效的治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治理”和“国家治理”，则取向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党与人民、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积极作用，实现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补的共同治理。

(2) 西方的“治理”概念及其理论具有“多元主义治理”的结构取向。在对于社会治理的设计和论证中，西方治理理论遵循和采取的是“多元主义”政治逻辑，“传统上这样的民间社会当然应当被看作是免于国家干预和多元主义的与宽容为特征的领域”[9]，主张治理的多中心结构。而中国共产党人主张、贯彻和运行的是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统筹各方的国家治理，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体现“一元主导、多方协同、交互作用”的辩证逻辑。

(3) 西方的“治理”概念及其理论具有“去权威主义”的政治倾向。西方治理理论根本倾向是主张弱化或者取消国家和政府权威的。尽管提及“元治理”的理念，并且提出国家发挥元治理的多方面作用[10]，但是，西方学者观察发现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西方国家权力的权威都明显下降。在西方治理学者看来，政府不应垄断一切合法权力，其他的主体如各种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家庭和公民等也能够自发生成治理权威，从事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应建立健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公共权力作为治理凭借、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的治理机制。

2. 简单认为“治理”的概念只是西方当代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领导人民建立人民共和国、执掌政权、运行治权，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开放，解决了大量问题，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十八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上升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和总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是规定了路线图，新中国70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因此，“治理”的概念并非西方理论的专利。中国共产党人的“治理”有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生含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的体现。

(二) 管理思维向治理思维转变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风险因素不断累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前所未有，因此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这实际上就要求管理思维向治理思维转变。

管理思维向治理思维转变，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管理思维向治理思维转变，就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具体而言就是：首先，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其次，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

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

(三)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又要下大力气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

1. 切实强化制度意识,深刻认识提高制度执行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制度执行力方面也有显著提高。但是目前在实践过程中,一些领域依然存在着制度执行力不足的问题,严重影响治理效能。制度一经制定,就要严格执行。再好的制度,如果不抓落实,就会形同虚设,其效果一定大打折扣。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自觉维护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坚决防止制度成为摆设。要善于运用制度治理国家,更好地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2. 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引领全社会增强制度意识,自觉维护制度权威。”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提高制度执行力。由于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必然会给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标杆、作出示范、当好表率。因此必须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决不留“暗门”、不开“天窗”,防止“破窗效应”。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求党员干部、下级、别人做到的,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做到。要增强斗争精神,敢于坚持原则、大胆抓大胆管,坚决同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作

斗争,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

3. 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严格监督是保证制度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的关键。首先,要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明确各项制度执行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形成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其次,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做到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再次,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严肃查处把制度当摆设、破坏制度、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确保各项制度落地生根。

参考文献

- [1] 陈金龙.治国理政基本理念的重大突破[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11-22-A07.
- [2]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如何认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谈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N]. 光明日报, 2013-11-28-01.
- [3][5]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 人民日报, 2014-01-01-02.
- [4] 丁志刚. 论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5.(3):63.
- [6] 江必新.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 光明日报, 2013-11-15.
- [7] 俞可平. 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思考[J]. 党政干部参考, 2014.(1).
- [8] 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1115/c1004-23559387.html>.
- [9]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A]. [英]大卫·威廉姆斯、汤姆·杰克逊: 治理、世界银行与自由主义理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68.
- [10]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A]. [英]鲍勃·杰索普. 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 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80.

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改革开放的路径探析

毕亚林

(广东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广东 广州 510610)

摘要: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的社会群体, 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实践者、受益者, 新时代改革开放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新时代改革开放, 应该提高思想认识, 积极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建言献策; 立足专业优势, 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发挥作用; 回馈服务社会, 为实现伟大事业注入强劲动力。紧紧地围绕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大局, 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 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20)04-0109-04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的社会群体, 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实践者、受益者。2013 年,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并列提出, 并于 2015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独立把它作为统一战线的工作成员, 2017 年 2 月, 召开了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 把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作为全党的重要工作之一。新时代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改革开放提供了宽广的舞台。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蔓延,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如律师, 面对新时代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如何立足本职工作, 做好角色定位, 发挥应有作用, 更好地围绕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大局, 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应有的贡献,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本文试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探析。

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实践者、受益者

1978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 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 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开展, 我国所有制形式、社会治理方式、社会分工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为中国各阶层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一群体也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应运而生。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 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一直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产生发展, 在改革开放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的四十年历程中,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是见证者、实践和受益者。我出生于 1971 年, 1994 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 即从首都北京来到了改革开放的热土广东, 如今, 我已经在律师行业工作了 26 年。一路走来, 自己从一名普通律师到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从律所主任到行业协会领导, 从统战对象转变成统战力量, 我亲身经历了我国法律体系从不足到完善, 从“无法可循”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再到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 见证了律师执业权利得到不断发展, 大批律师下村居、进企业,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亲身实践, 日益成为建设中国

收稿日期: 2020-07-22

作者简介: 毕亚林 (1971—), 男, 汉族, 内蒙古人, 广东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秘书长、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 律师参与社会治理、营商环境优化等。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的发展历程,受益于此,我个人的事业不断进步、家庭条件不断改善。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相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亲历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受益于改革开放而不断发展进步,为改革开放事业在各自的专业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新时代改革开放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一) 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参与平台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出现的社会群体,他们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在巩固共同思想基础、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等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改革开放给予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广泛的政治参与平台。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单独列为统战工作对象。在中共中央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律师也被划分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内,这标志着律师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法律服务从业者,而且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我本人而言,也从统战对象成为了统战力量。我先后担任了广州市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及律师行业分会会长等职务。通过在政协、新阶联和行业协会这些平台,我为广州市和广东省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并得到了重视;为新阶联和律师行业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贡献了力量。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可以看出,正是改革开放为律师队伍搭建了广泛参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平台。改革开放四十年,律师队伍已经发展成为党和国家可以信赖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提供了专业领域的成长舞台

新时代改革开放给予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专业领域的成长舞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律师队伍的地位和作用,对律师工作和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律师队伍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切实加强律师工作和律师队伍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202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民法典》出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等法律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作用,多方面推进民法典实施工作。为了更好地落实习总书记这一要求,律师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研究《民法典》。2020年6月,在《民法典》出台后,我做客广东卫视《财经郎眼》“《民法典》来了”专题节目录制,与节目主持人王牧笛、主嘉宾郎咸平畅谈《民法典》的相关热点问题。从国家政策到法律条文,从经济社会发展到民生事业保障,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民法典》制定的背景、目的、意义及相关热点问题。节目6月15日在广东卫视播出,同步在爱奇艺视频上线播放,收视率在全国名列前茅。通过这些活动,律师界为广泛宣传学习《民法典》发挥了专业作用。改革开放,必然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又为律师搭建了发挥律师专业才干的舞台。所以有党中央正确的领导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爱,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律师队伍将不断发展壮大,律师的作用将更有效发挥,律师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专业领域成长舞台将更加广阔。同样的道理,在其他的专业领域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专业领域成长舞台将更加广阔。

(三) 提供了回馈服务社会的平台

新时代改革开放给予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多回馈服务社会的平台。一大批新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志愿、公益事业,特别是在行业发展、脱贫攻坚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承担社会责任。新阶层人士时刻牢记“扶危济困”的使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专业特长回馈、服务社会。党的十八大,尤其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以来,法治建设驶入“快车道”。在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帮助下,给予我行业协会这个工作平台,让我有机会为行业发展扮演角色、发挥作用,如:创办了青年律师大讲堂并进而形成全国律师界的著名品牌;策划2018年中国(广州)律师文化节,对行业影响深远;策划并主持了《全国法律服务创新论坛》;主持了《推动“一带一路”、“自贸区”

建设，加强粤港澳法律服务业合作论坛》；策划了2018年首个“宪法宣传周”万名律师宣誓活动等一系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律师行业工作。此外，我本人曾先后多次远赴西藏、四川甘孜、汶川等贫困地区捐资助学、开展普法讲座。通过这些，为普法宣传和全面依法治国贡献特长。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着手组织召开了筹款拍卖会，捐赠给汶川映秀镇灾区的孩子们，还多次随省委统战部、省知联会到韶关、潮州以及广东各地参加精准扶贫以及助学助教活动，为扶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作用。

在组织的培养和帮助下，我先后被评为全省优秀律师、全国优秀律师，2018年1月在中央电视台获司法部、新华网授予的“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律师）”荣誉称号。这一切，都来自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和部署。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路径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冲击了全球产业链和各国经济的稳定，全球贸易需求萎缩。同时，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矛盾，不断抨击中国，造成一系列严重影响，“去中国化”呼声越来越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别是律师服务新时代改革开放，应该立足本职工作，发挥专业优势，发挥应有专业作用，更好地围绕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大局，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提高思想认识，积极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建言献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之所以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那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的社会制度在人类重大挑战面前再次印证了其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人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救人民于水火的精神，被百姓广为传扬。作为律师，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而行，切实发挥好专业优势，积极思考我国的法治实践，认真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理念，真正把思想认识高度统一到党的领导下，并积极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建言献策，这样才无愧于新时代律师的身份。我曾提出《关于建立全生命周期线上服务平台的提案》的提案，如今，随着抗击疫情的发展，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已经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既定任务；曾提出《关于引导成立县或乡镇一级民宿协会的提案》，建议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在县或乡镇引导成立民宿协会，当这次疫情突如其来，可能会有利于“重灾区”的民宿从业者抱团取暖，挺过寒冬；提出了《关于建议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联合会的提案》，促成在广州召开的世界律师大会期间成立了“一带一路”律师联盟。我关注的问题，一段时间后都成为中央重大决策的聚焦所在，不是有特异功能，只因为“走心”。作为一名新的社会主义阶层人士，自己的所做一切表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言献策时应当不局限于法律或各自专业领域，不局限于服务一池一地，而要提高思想认识，紧密围绕中央重大决策和重要部署，从“谋一域”到“谋全局”，充分履职，做好参政议政工作，形成合力，才能为服务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

（二）立足专业优势，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发挥作用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已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个经济体之一，在满分100分中得分77.9分，比上一年提高4.26分；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比上一年提升15位。这离不开近年来党和政府对优

化营商环境所做出的多方努力。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逆全球化”浪潮以及中美贸易、外交等领域摩擦的大背景下，改善营商环境仍然是作为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和吸引外商外资的重要举措，任重道远。营商环境的好与坏，春江水暖鸭先知，律师就是体检师，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律师都是营商环境的最主要评价主体。广州市律师协会于2017年就成立了广州律政营商环境研究院，已举办了“广州律师看营商环境”系列论坛”以及多个国家的境外投资分享会活动，为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提供有针对性、能落地的参考建议和法律服务。今年，世界银行已将广州列为2020年营商环境评价的参评城市，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广州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为充分发挥研究智库咨政建言的积极作用，优化广州营商环境工作部署，广州市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专业律师库。我作为第一批专家参与到后续工作中，对标世界银行12个评价指标提出优化建议，充分发挥广州律师的专业优势，为优化广州市营商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事实充分证明，作为律师，一要承担起责任。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二要发挥好作用。充分发挥律师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与司法机关协调配合，切实保障司法公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三要服务于大局。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大局，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言献策。

（三）回馈服务社会，为实现伟大事业注入强劲动力

2020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虽然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猝不及防地打乱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但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部署，中央督导组加强指导督导，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统筹协调，各地区各部门履职尽责，社会各方面全力支持，开展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举全国之力共同抗疫，及时控制住了疫情。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我响应号召，组织全所律师第一时间捐款捐物，驰援疫情防控；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组织策划“访百家园区、助中小企业”法律服务暖企活动；应邀出席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复工复产以及健康生活和生态保护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进行解读；主持省律协新闻发布会，发布律师行业疫情防控及服务复工复产复市的工作情况。面对突如其来的困难挑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就应当积极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扮演角色发挥作用，用实际行动诠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责任担当，立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优势和专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开展扶贫济困、法律服务、专业咨询等社会公益服务活动。充分发挥运用各种网络媒体、活动平台等资源，主动正面发声，举办各类宣传展示活动，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我们有独特政治和制度优势、雄厚经济基础、巨大市场潜力，亿万人民勤劳智慧，我们只要直面挑战，坚定发展信心，牢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增强发展动力，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当前的难关一定能闯过，中国的发展必将充满希望。因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闻鸡起舞、日夜兼程、风雨无阻，为实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大步迈进！

【责任编辑：余伟】